大劫掠

第二卷——埃及远征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历史小说



内容简介

《大劫掠》第二卷——埃及远征（1798—1801）

《大劫掠》是一部以拿破仑掠夺行径为主题的四卷本历史系列小说，本书为其第二部，讲述其中最为壮观的一次大掠夺——埃及远征。

1798年5月19日，三百艘战舰从土伦起航。舰上载有一支四万人的大军和一百六十七名学者。他们的目的地是机密，而他们的使命，只对公众保密。

贝托莱在私人笔记中称这次行动为“征集行动”，波拿巴则称之为“科学远征”。这是同一现实的两个名称，小说一步一步地追随着它——从攻占马耳他，到尼罗河畔，再到巴黎的工坊，《埃及志》诞生于此。

透过德农的笔记本、若马尔的经纬仪、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标本瓶，以及贝托莱的沉默，启蒙式掠夺的内在机制得以显现：学术之举的美，与它所掩盖的掠夺之暴力。而在字里行间的边缘，哈桑·伊本·优素福——译员、见证者、记忆——记下了学者们从不书写的东西。

旅程的尽头，一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带走一件物品与带走它的影像，究竟有何区别？罗塞塔石碑在伦敦，拓片在巴黎，而埃及，依旧留在它的河岸。

作者简介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已出版《被盗的房间》《遗嘱是伪造的》和《掠夺》。他是荣休高等教师资格教授，法国文人协会（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会员。作为一名醉心于艺术收藏史的法学家，他多年潜心研究国家对艺术品的侵占问题。他现任“国际归还”（International Restitutions）非政府组织主席，并就此课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

ISBN 9782488999748

《大劫掠》

历史小说，共四卷

Robert Casanovas
casanovas@hotmail.com

法定送存：2026 年 4 月——数字电子书及纸质版

© 2026 Casanovas。保留所有权利

ISBN：978-2-488999-74-8
www.international-restitutions.org

封面：罗塞塔石碑的等大复制品，置于光学剧场之中，现藏维夫商博良博物馆（法国伊泽尔省）

2022 年 7 月 17 日——朱利安·佩亚尔



中文版

第二卷

1798—1801 年——埃及远征

定稿版，修订勘误本

同一作者作品：

《被盗的房间》（历史小说）

《遗嘱是伪造的》（历史小说）

《掠夺》（历史小说）

《大劫掠》——第一卷——体系的诞生（历史小说）

声明

本书是以真实研究为基础的历史虚构作品。书中提及的作品确有其物，其中大多数是在 1794 年至 1813 年间法国的征服战争中被掠走的。

书中大多数人物确有其人。

事件的进程再现了真实且经过考证的史实。

出于叙事的需要，书中部分人物、场景和对话系虚构而成。

本书原版以法文写成，后来被翻译成多种外语。这些译本中或许存在语言上的错误、误译或不够准确之处。

目录

第二卷

第一章 ：东方整装

第二章 ：溯尼罗河而上

第三章 ：学者的时代

第四章 ：溃败与归途

大劫掠

历史小说，共四卷

第二卷——埃及远征（1798—1801）

第一章 ：东方整装

I - 从土伦到马耳他

1798 年 5 月 19 日清晨，克劳德-路易·贝托莱在土伦码头上拾起一截涂了柏油的缆绳，凑到鼻前。四周，三百多艘舰船正在起航，锁链声与号令声响成一片。

缆绳散发着斯堪的纳维亚松木焦油的气味，混着地中海的盐味，还有一种更柔和的植物树脂，他想了好一阵才辨认出来——大概是希俄斯的乳香脂。他把它放回口袋，打算上船后再分析。码头在脚下震颤。这气味让他想起了*美丽之国*。

1796 年，波拿巴曾派他与加斯帕尔·蒙日前往意大利。任务是在意大利诸侯的收藏中，找出值得送往卢浮宫的东西。他们走遍了米兰、博洛尼亚、罗马的宫殿，记下作品的标题与尺寸。画作随后装进木箱运走，一幅幅分别装框，裹以毯子。有些运抵时已受损。有些则完好无损。

这次远征将重复在意大利所做的事，只是规模更大。波拿巴称之为科学远征，贝托莱在私人笔记里则称之为——也更为确切——征集行动。

不同之处在于埃及。意大利有藏家、有市场、有价格。埃及有的是封闭了三千年的陵墓。

在一百二十门炮的旗舰“东方号”甲板上，波拿巴注视着舰队缓缓启动。目的地何在，士兵们并不知晓。

舰船正在调度，蒙日在笔记本的封面上涂写着方程式。他没有看码头，也不看任何无法计算的东西。铅芯在纸板上沙沙作响。

更下面，在C层下甲板，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在两个滑轮之间拉直一根细绳，测量一条走廊的长度。他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首届学员，年方二十，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法国。细绳显示三米六十二。他数了数走廊沿途的肋骨，把测得的长度与肋骨间距相比，由此推算出船身的长度，误差不过几米。没有人向他要过这个数。

约瑟夫·傅里叶，三十岁的数学家，在上层甲板的一间舱室里安顿下来，随身带着一摞关于代数方程的论文，整个航程中却一页也不会翻开。让他决定登船的，是眼前有一整个文明可供丈量。至于实地科学，他毫无经验。

多米尼克-维旺·德农，作家兼外交官，登上了护卫舰“朱诺号”，该舰与另外两艘护卫舰一道为舰队开路。他久久凝视着空荡荡的地平线。

在狭小的舱室里，他自登船以来第三次整理器材。先是素描本，按开本分类。炭笔装在皮套里。鹅毛笔，黑墨水与深褐墨水，粗细不一的画笔则卷在帆布卷中。这个顺序他烂熟于心，每件工具各得其位，如同语法学家熟知自己的语言，而重新排一遍，让他觉得手里攥住了点什么。埃及在他脑海中依旧没有形状。他的器材，却有。万一其余一切都出了岔子，至少他的炭笔还井井有条。

波拿巴用一封十行的信招募了他。您将描绘*那些古迹*。这就够了。他没有问去哪里，没有问何时，也没有问是什么条件，便接受了。

舰队花了好几个钟头才驶出港湾。岸上，当第一批船帆绕过岬角时，手帕仍在挥动。德农望着海岸渐渐远去。

“您害怕吗？”护卫舰“朱诺号”上的一名军官问他。

“怕？不，先生。是迫不及待。这完全是两回事。”

舰船驶向外海之际，他画下了晨光中的海岸与岛屿。多年以后，这幅速写将出现在他的《上下埃及游记》初版的插图之中。

从土伦到埃及相隔六周航程，中途在马耳他停靠。舰队横渡地中海，保持着相对的航行静默，避开纳尔逊，靠的是运气，也靠纪律。

最初几天，海面平静。学者们涌上甲板，带着仪器，记录风向。若马尔通过数绳结来计算舰队的航速。博物学家们用网捕捞标本。德农的素描本渐渐画满了鼓满的风帆，幽暗的船身，水面上变幻的光。他画海不如画古迹那般得心应手，但仍在尝试。

波拿巴则整日读书。他带上船的是一座精心挑选的行军图书馆。亚历山大的战役，恺撒的评述，波利比乌斯的历史，阿拉伯旅行家们关于埃及的记述。他读得很快，折起书页，用密密的字迹在页边做批注。一天早晨，蒙日撞见他又一次重读沃尔内的叙利亚与埃及旅行记，此书出版于十一年前。

“沃尔内太悲观了，”波拿巴头也不抬地说，“他只看见了衰败。我们将看见源头。”

波拿巴合上书，放在膝头。蒙日熟知他这一点。波拿巴读书不是为了被人驳倒，而是为了给自己早已想做的事找先例。蒙日没有坚持。

“东方号”的图书馆形同一座机构。波拿巴把它办成了一所漂浮的小型学院，每晚有朗读会，也有关于埃及古代

史的讨论。大舱室的桌旁聚集着主要的学者和爱好文学的军官。人们读希罗多德，论修昔底德，往往到很晚才谈到罗马覆灭的原因。波拿巴主持会议，时常发言，其历史修养令研究院的教授们惊讶。

“文明为何消亡，我无所谓。它们为何长存，这才是我想弄明白的。埃及延续了三千年。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屹立三千年之久？”

傅里叶提出了一个假设，关乎尼罗河泛滥的规律与收成的可预测性。他喜欢历史例证，因为它们赋予抽象的观念以时间的分量。数千年规律的泛滥，抵得上一个单靠数学无法给出的论证。他在其中看到一个文明，远在他向学生讲授的代数出现之前，就已解决了灌溉、建筑、天文的难题。他谈这些，用数字多过用言辞。贝托莱谈到了权力集中于中央行政机构。当晚受邀登上“东方号”的德农坦言自己一无所知，只指望古迹来告诉他答案。

波拿巴向贝托莱俯过身去。

“在意大利，我们与诸侯谈判。这里没有诸侯。只有无人认领的陵墓和古迹。我们将要拿走的东西，早已没有在世的主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差别。”

“没有在世的主人，将军，从来不等于没有主人。”

贝托莱说得很轻，而波拿巴已经重新拿起了书。自威尼斯以来，自米兰以来，波拿巴就明白，正确的词与有效的词并不总是同一个。这就是远征的代价，他在登上“东方号”时就已接受了它。他又盯着那盏冒着烟的灯焰看了一会儿。

第十天，天气变了。一阵西北风迫使舰队改变航向。船只略有分散，随后在海军上将布吕埃斯的号令下重新集结。士兵病倒了。好几位学者也病倒了，其中有蒙日，他在铺位上躺了两天，脸色苍白，手边放着一只脸盆，

多年来头一回连书也翻不开。他并不抱怨。他等着身体肯重新干活，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种沉默并不是平静。

德农在甲板上继续画他的素描，丝毫不受晕船之苦。大海呈现出一种他在绘画中从未见过的蓝。一种强烈的、近乎咄咄逼人的蓝，与克劳德·洛兰的海景画毫无相似之处。要表现这种蓝，必须另找一种画海的方式。他不知道有谁这样做过。

关于目的地的问题，长久得不到答案。

波拿巴已向军官们分发了密封的指令，只许在海上拆阅。士兵们纷纷猜测。耳边传来各式各样的名字。英国、葡萄牙、爱尔兰、安的列斯群岛、马耳他、印度。有些消息更灵通的人低声说出“埃及”，但这个名字显得如此遥远，如此不可思议，几乎没有人敢相信。

数日之后，波拿巴让高级军官们明白了目的地何在，而对全军的公告要到 6 月 22 日、过了马耳他之后才会正式宣布。埃及。地中海的非洲海岸。尼罗河、金字塔、沙漠、底比斯与孟菲斯的废墟。风声很快在学者中间传开。贝托莱立刻想到了尼罗河的水和埃及的泡碱。蒙日脸色依旧苍白，说他最希望的是能找到饮用水。若马尔什么也没问。他更愿意事先知道自己将要看到什么，便把自己关进舱室，花了两个小时重读他关于古代灌溉系统的笔记。

德农从背包里取出希罗多德。书自己翻开了，正是谈到金字塔的那一页。他浏览着莫伊里斯湖、哈瓦拉迷宫，以及这位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旅行家笔下的吉萨金字塔。希罗多德与此刻相隔两千三百年。而金字塔依然矗立在那里。德农合上书，没有做记号。

舰队在与西西里海岸保持着谨慎距离、沿岸驶过之后，转向东南。太阳升得更早，落得更晚，暑热渐增。对许多从未离开过法国北部的士兵来说，这片海已经是已知世界的边缘。他们凭靠在滚烫的舷墙上眺望地平线，好奇中带着不安。

第十八天夜里，是整个航程中最澄澈的一夜。空气里仍留着白日的暑热，带着焦油和盐的气味。天空无云。下弦月刚刚升起，在水面上洒下冷冽而分明的光。护卫舰的白帆像湿润的纸一样闪亮。战列舰的黑色船体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清晰的影子。几乎听不见浪声——只有桅杆缓慢的吱嘎声，搜寻风向的船帆发出的沉闷拍打声——还有，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说不清是人声还是夜鸟的啼叫。

午夜时分，一艘小艇从“东方号”驶来，靠上了“朱诺号”。波拿巴养成了夜间巡视的习惯，独自一人，或几乎独自一人，趁军官们熟睡之时，有时也登上前卫的护卫舰。他走到德农身旁，倚着舷墙，许久没有说话。

“您夜里画得比白天好。”

“夜晚抹去了无用的细节。只剩下形体。这更诚实。那边……”他在找词，“那边没有什么新东西，一切都已被看过。精确地画过吗？没有。希罗多德描述金字塔，却没有测绘过它们。斯特拉波提到它们，却不理解它们。我呢，我想带回一些图像，让人无法说它们是粗略的。”

波拿巴没有回答。这种思路，他是理解的。远处，左舷方向，能辨出一道暗色的线，可能是西西里海岸，也可能是低低的云层。两人谁也没有去问值班军官那是什么。

就在这同一个夜晚，在向西数日航程之外，纳尔逊的舰队正在搜寻法国舰队，却不知它在何处。倘若风向不同，德农将在笔记本里带走的一切，都会随着舰船一同沉没。

6 月 9 日，经过三周的航行，法国舰船抵达了瓦莱塔港外。

马耳他岛自 1530 年起由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统治，以号称坚不可摧的要塞扼守着地中海东部的入口。

波拿巴召集他的主要将领和学者，来到城墙前。

“这些城墙在 1565 年抵挡过四万土耳其人。但今天守卫它们的骑士们年老、分裂，又没有钱。我们不需要围城。只需登陆即可。”

路易·德塞将军，一位有着苦行者面容的军官，统率着军队的一个师，此时插话了。

“将军，骑士团内部的这些分歧，您的情报可靠吗？”

“分成了互相敌对的派系。大团长软弱无能。他们不会抵抗。我们很快就能进城。”

蒙日觉得有必要提个问题。

“将军……马耳他并未与法国交战。骑士团是主权实体，数百年来一直为各国所承认。教宗，天主教各国……您将给出什么理由？”

“蒙日，我亲爱的朋友，你是数学家。去算一算，如果英国人封锁我们的航线，我们在埃及能坚持多久。马耳他，就是那把锁。至于外交上的理由，那不归你管。我的副官会处理。”

蒙日不再作声。他明白了界限在哪里。

登陆在岛上数处同时展开，守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抵抗持续了两天。马耳他在 6 月 12 日宣告投降。

清点结果显示出数量惊人的贵金属，足以支撑数月的战事。6月14日得以登岛的德农，穿过宝库大厅，委员们正在那里逐箱清点。

骑士团的财富首先是钱币，由银锭、金币、礼拜用的金银器构成。据贝托莱估计，价值数百万法郎。

但让他驻足的却在别处。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圣器室里，士兵们正在摘下画作。中殿的穹顶——马蒂亚·普雷蒂于1661 年至 1666 年间直接画在石头上的、关于施洗约翰生平的巨幅组画——无法拿走。太大，也太固定。只好留下。但架上画是可以拿走的。

他认出了几幅画布，有骑士团大团长们的肖像，还有一幅那不勒斯画派的巨幅*《拉撒路复活》*，正被毫无顾忌地卷起。

德农也看到了那些没有被拿走的东西。在大教堂的祈祷室里，悬挂着*《圣施洗约翰被斩首》*，卡拉瓦乔最大的一幅画，高三米六十，宽五米二十，一场黑与红的风暴。刽子手朝无头的尸体俯下身去，鲜血在地上汇成一摊。画家在这血泊中写下了自己的签名，*f. Michelangelo*。这是他唯一签过名的画。

一名士兵走上前去，估量能否把它摘下来。德农把手按在他的胳膊上。

“这一幅不能走。它是为这面墙画的。上了船，它会死的。”

士兵看了德农一会儿，又看看那幅画，耸耸肩，到别处去了。画留了下来。

他在笔记本里记下尺寸、主题、签名，然后在画前停留良久，没有再写。这幅画有一种罕见的特质：它反过来审视观看的人。俯身向着死者的刽子手，或是那个转过头去的狱卒，似乎在询问观看这一幕的人——而你，你带走什么？

骑士团医院的金银器——餐桌上的水盆、烛台、圣体盒——被全部没收。马耳他的医院有大理石地面、挂毯，还有据说在欧洲独一无二的银器。它们将被熔成银条。来这里就医的病人今后只能用锡碗进食。

每一次征服都为下一次提供资金——始终是同一套机制，他一边看着一座烛台在人们手中传递，一边想。

此外还有《印度壁毯》，一套在戈布兰工场织造的挂毯，其图样取自拿骚-西根亲王约翰·毛里茨从巴西带回的绘画——大象、鹦鹉、热带要塞、宫廷场景，色彩依然鲜艳。法国国王曾赠给骑士团的东西，这一次法国军队将留在原处。--

他记下尺寸。最大的几幅，高约两米五十，宽约五米。羊毛与丝线织成。它们本可以卷起来。却没有卷。士兵们或是没来得及，或是不懂它们的价值。

“把挂毯留下，”德农对负责监督清点的军士说，“它们来自法国，路易十四把它们赠给了骑士团。”

外面，人们正把箱子装上小艇。黄金、白银、指定的画作。骑士团的图书馆，数千册拉丁文、法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的书，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在书架上。没有地方。没有时间。革命的士兵洗劫得很快。学者们则捡拾剩下的。

那里有摇篮本、中世纪手稿、自十二世纪起积累的航海与制图论著。士兵们不知道拿这些书怎么办。一名中士问这些值不值钱。德农回答说值，有一些值。中士说他没有箱子。德农找来两只，亲手把最古老的手稿放了进去。约一百册，凭直觉挑选，没有目录，没有别的标准，只看羊皮纸显得有多古老。其余的留在了书架上。

它们将留在那里。法国人离开后，骑士团的图书馆将成为马耳他的公共图书馆。

“佛兰德斯曾是有条不紊的，意大利是博学的，马耳他是仓促的。每场战役都依可支配的时间与在场的人手来劫掠。埃及将是另一回事。不是一座三天之内就能掏空的城市，而是一个要花上数月去穿越的国家。那里的劫掠将是缓慢的。”贝托莱把这些话写进了观察笔记，当时他正望着装满货物的小艇驶向舰船。

舰队于 6 月 19 日晚起锚。德农站在甲板上，望着瓦莱塔渐渐远去。一座淡黄色石头砌成的城市，城墙一直延伸到海边，还有巴洛克式的钟楼。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再见到马耳他。货舱里，箱子与黄金、银器堆在一起。在他的笔记本里，有要塞、大教堂和港口的素描。

黄金可以重新熔铸。卷在货舱里的画，不会有人把它们送回来。

II - 从亚历山大到尼罗河

法国人一路数度避开纳尔逊，7 月 1 日，瞭望哨报告望见了埃及低矮的海岸。一股炽热的沙土与盐的气味。蒙日天一亮就已站在甲板上。

“亚历山大。欧几里得，埃拉托色尼，托勒密。七十万卷藏书被焚毁。看看它还剩下什么！”波拿巴高声说道。

蒙日细细打量着海岸。

“我原以为……总之，是别的样子，将军。这只是一座破败的小镇。神庙呢，宫殿呢？大图书馆呢？”

波拿巴笑了。

“消失了。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只剩下石头。这就是我们来此的缘故。”

登陆在傍晚开始，涌浪很大。小艇把士兵放在浅滩上。他们跳进水里，在温热的黑暗中蹚水走上海滩。气味比

房屋先一步抵达他们。盐，被晒热的石头，鱼，还有一座古老城市的烟火，它全然没料到会遭人突袭。

学者们在次日傍晚登陆，那时城市已经被攻占。亚历山大并不是他们读到的模样。一万居民，狭窄的街道，日渐剥落的土坯房。

德农第一次踏上埃及的土地，他环顾四周，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

“难道真是这样吗？废墟和破屋？”

庞培柱矗立在五百米外，孤零零地立在沙色的天空下。二十七米高的阿斯旺红花岗岩，立于方石砌成的基座之上。它与庞培毫无关系。它是公元 297 年前后为纪念皇帝戴克里先而建，当时他刚镇压了亚历山大城的一场叛乱。

柱身是整块的巨石，高二十点五米，重近三百吨，十五个世纪前便已打磨光滑，如今在灰尘之下摸上去依然平滑。顶端的科林斯柱头掉了几片莨苕叶，但仍清晰可辨。若马尔用他的仪器测量了它。底部直径二米七十一；上部三分之二处，约二米五十。柱身略呈收分。工匠们算准了视错觉，使柱身在地面上看去显得笔直。十五个世纪之后，这个计算依然成立。

基座上，散落的石块带着象形文字铭文的残片，很可能是从更早的法老神庙上拆来的。罗马人劫掠神庙来造自己的建筑，阿拉伯人劫掠罗马人的建筑，奥斯曼人劫掠阿拉伯人的建筑。庞培柱本身就立在曾在别处用过的石头上。

德农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画下这根石柱。正面，四分之三侧面，从北面看的侧影。这座古迹将留在原地，注定要为驶入港口的船只充当标志。他的画将加入*《埃及志》*的图版，前往巴黎、伦敦、维也纳。

亚历山大令人失望，叠压的世纪太多了。学者们已经把目光投向尼罗河。

攻占这座城市，法军付出了约一百五十名法军伤亡的代价。克莱贝尔头部受伤，幸而活了下来。波拿巴把司令部设在奥斯曼总督的宫殿里，召集显要人物，并通过一份译成阿拉伯文的告示向他们宣告，法国军队是来把埃及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并惩治那些冒犯法国之友奥斯曼苏丹的人。

“埃及的人民，”告示宣称，“有人会对你们说，我是来摧毁你们的宗教的。不要相信。你们要回答说，我是来归还你们的权利、惩罚篡位者的，而且我比马穆鲁克更尊敬真主、他的先知和《古兰经》。我们也是真正的穆斯林。难道不是我们推翻了那个说必须向穆斯林开战的教宗吗？难道不是我们摧毁了马耳他骑士团吗？”

波拿巴整顿亚历山大的行政之时，学者们开始了最初的工作。德农寻找托勒密时代辉煌的踪迹。找到的很少，只有几块被再度用在砖墙里的石头。

德农第一夜彻夜未眠。街巷里仍在喧响着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夜间生活。阿拉伯语的人声，流浪狗，看不见的院子里喷泉的水声，黎明前从宣礼塔上传来的祈祷召唤。他带着笔记本在窗前坐下，画下他没有看见的东西，让耳朵引导着手。线条犹疑不定。他任其犹疑。

次日清晨，他与若马尔一同走进城里。后者带着经纬仪，在每个路口测量。德农速写着一座座门面，集市上的一张张面孔，一头卧在尘土中的单峰驼，一群孩子，他们望着法国士兵走过，好奇中夹着戒备。两人谁也不会阿拉伯语。他们与居民交流，靠手势，也靠钱币。

“看看这扇门，”德农说，铅笔没有离开那木雕的几何纹样，“这里没有一样东西只属于一个时代。一层又一层，几千年的层次，没有哪一层完全抹去了前一层。”

“这就让测绘变得复杂了，”若马尔说。“一块古老的花岗岩，砌在十八世纪的房屋墙壁里……我该怎么断代？依据石块，还是依据墙？”

“两者都要，我亲爱的朋友。这是难处，也是妙处。”

鱼市向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年轻博物学家——展示了十来种地中海鱼类，这些他还从未在任何标本中见过。他买了好几种，却叫不出名字，小心地用盐把它们包好，让人送到住处，打算晚上解剖。同屋的伙伴们抗议这股气味。他手握解剖刀回答说，无知的气味更糟。

另一边，贝托莱对集市上的染料产生了兴趣。商人们陈列的布料呈现出他不认识的色彩。极深的靛蓝，不带茜草色调的红，泛着藏红花色的黄。贝托莱取下染色纤维的样品，用纸卷起，仔细贴上标签。

波拿巴却无暇闲逛。

要整编守备部队，要与当地当局建立关系，要解决补给问题，要筹备向开罗的进军。他坐在从自己船上搬来的扶手椅里，周围是副官们，接见了当地显要。他们前来时满怀戒备，像是还不知道这些新来者是否会留下的人。

与此同时，军队在做准备。士兵们灌满水壶，给骡子装载，检查弹药。雇来了埃及向导。他们是熟悉沙漠道路和水源的人。他们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望着这番准备。在这条夹于海与沙漠之间的走廊里，他们见过许多军队经过。

波拿巴观察着沙漠。从学者们下榻的宫殿平台上，向南可以看到一条分明的线，城市在那里止步，沙地由此开始。一条笔直的线。一边是房屋、花园、棕榈树，是人类经营已久的存在。另一边，什么也没有。一片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单调旷野，不见一丝阴影，没有一点色彩变化。

7 月 6 日，波拿巴下达了进军令。从海岸到开罗，相距二百二十公里。二者之间横亘着沙漠，而从来没有人向学者们明说这一点。

头一个钟点起就是阴凉处四十度。水井与水井之间没有水。士兵一边走一边死去，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人不是一下子死的。先是停下。跪倒。再没有站起来。队列继续前进。没有人乱了步伐去陪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波拿巴常常和士兵们一样步行，各纵队平行穿越沙漠。学者们不适应，只能勉强跟随。有几位晕倒了。德农边走边画风景。

蒙日踉踉跄跄，倚着一根临时做的手杖。波拿巴见他这副模样，下令把自己储备的水给他。

“喝吧，蒙日，”波拿巴把水壶递给他，说道，“喝吧。你得活着走完这段路。”

蒙日喝了几口带金属味的温水。他险些说出一声谢谢，又忍住了。人们不会像对朋友那样，为一口水去感谢一位将军。他把水壶还了回去。波拿巴已经望向别处。

“所有伟大的事业都有它的考验，”波拿巴接着说，“亚历山大一路走到印度，用了八年。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二十四年。我们会撑住的。”

各纵队在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土地上行进。几丛带刺的灌木。偶尔有一座土坯砌的村庄。费拉们站在自家门口，

默默看着军队走过。这种炎热与士兵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不同。它自地面升起，不亚于自天空降下。水壶渐渐空了。逢着水井，便把水壶灌满。水带着泥土和盐的味道，但没有人抱怨。

第四天，接近中午，一阵低语掠过各纵队。士兵们抬起头。在他们前方，越过颤动的热浪线，地平线上浮现出一道绿色的带子。尼罗河。有人开始奔跑。军官们没有拦阻。他们也跑了起来。

最先的几列人马到达河岸，人们连背囊也没卸，便跪倒在水中。他们喝水，洗脸，一动不动地立在水流里，仿佛不肯出来。在他们身后，各纵队仍在不断抵达，扬起的尘云落在水面上。

德农带着炭笔在河岸上坐下。眼前是七月阳光下波光闪烁的宽阔水面，数公里宽、浓绿欲滴的肥沃地带，再往后，沙漠就在灌溉停止的地方开始。

“看啊，若马尔，”德农对坐到他身旁歇息的年轻工程地理学家说，“这才是真正的埃及。”

“尤其是那条线，”若马尔说，手搭在额前遮着阳光。“棕榈树，庄稼，然后是沙漠。离河岸只有几公里。简直像用墨线弹出来的。”

一切都取决于这条河。埃及不过是沙之大陆上一条水的走廊。

饮用水现在有了。军队恢复了元气，学者们也重拾了仪器。若马尔展开他的刻度尺。蒙日在零散的纸页上画着方程。德农打开他的速写本。工程师们研究灌溉系统。水车、沙杜夫吊杆、分水渠。尼罗河的水靠牛力或人力，被提升到高出几米的田地里，所用的技术自法老时代以来毫无变化，至今仍在使用。植物学家们采集枣椰树、埃及无花果、莲花、纸莎草，还有欧洲人闻所未闻的芳

香植物。若弗鲁瓦把鸟类制成标本——朱鹭、苍鹭——装满了一箱又一箱。尼罗河的动物向他敞开，有河岸上的鳄鱼，已变得罕见的河马，成千上万的候鸟。

“朱鹭，”若弗鲁瓦朝贝托莱喊道，用下巴指了指它们，“埃及人把它们做成木乃伊。还把它奉为托特神。智慧，文字。一种每天早晨都能在尼罗河边看到的鸟。”

“我亲爱的若弗鲁瓦，把一只鸟当神来崇拜，在我看来是迷信的极致。启蒙运动已经纠正了这一点，我想。”

若弗鲁瓦没有回答。他心想，崇拜朱鹭，或许并非纯粹的迷信，而是在某一特定文明里，对自然的严谨观察所采取的形式。埃及人注意到，朱鹭随尼罗河的泛滥而出现。他们把它变成了神。十八世纪的博物学家注意到同样的事，并把它变成了方程，那是同一种关注的另一种语言。他把这个比较留在心里，又回到他的鸟儿身边。

德农从第一个月起就开始购买了。他没有对同事们提起。傅里叶、蒙日、贝托莱没有就此作出判断——是科学采集，还是个人占有——也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大声说出来。

后来，在军队于 7 月 24 日进入开罗之后的几个月里，萨卡拉有了一处集市，法国士兵一表明他们肯买东西，集市便开了起来。邻近村庄的费拉带来他们在田里和墓中发现的东西。*沙布提俑*数以十计，圣甲虫数以百计，还有纸莎草残片、护身符、绿锈斑斑的托勒密钱币。德农总在清晨前来，趁暑热还没把行走变成苦差。他在临时的摊位之间缓缓踱步，灯芯草席铺在地上，东西就摆在上面。他蹲下。掂量。端详。让他停步的，未必总是最古老或最引人注目的东西。一尊彩绘木质的*沙布提俑*，十五厘米高的随葬像，双臂交叉在胸前，作奥西里斯的姿态，面容庄严，假发是蓝色的，上面细细描着金线。那张脸有着宫廷肖像般沉静的精准。曾有人端详过它，

曾有人希望它在来世被认出。这尊*沙布提俑*曾在一间封闭的墓室里陪伴一位亡者三十个世纪。如今它就在这里，在萨卡拉的一张灯芯草席上，在太阳底下。这尊*沙布提俑*被一块破布裹起，德农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挎包。

把它摆在那里的费拉说了一句话。德农没听懂。他转向委员会派给他的翻译哈桑。哈桑听着，看了看自己的脚，然后低声译了出来。

“他说，这是他祖先的坟墓。”

那天晚上，哈桑独自回到营地。他沿着渐渐散去的集市走去，摊贩们带着各自的皮亚斯特消失在傍晚的尘土里。他在费拉摆放物品的地方停住了。草席还在那里。沙地上的一处凹陷，标出了*沙布提俑*曾经躺过的位置。他当翻译已有四年，译过商人、公证人、奥斯曼军官，如今又译法国学者。他懂得，翻译就是在永远无法完全重合的词语之间做选择。费拉的那句话——他祖先的坟墓——他译得准确无误。他没有译出来的，是语气。

接下来的几天，德农又做了几次收购。

圣甲虫。一枚蓝色釉砂的，刻着第十八王朝第六位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王名圈，刻在底面上，精细得他要用放大镜才能核实。棋盘格、圣甲虫、日轮。三千二百年过去，线条完好无损。第二枚是黑色皂石的，刻画一只鞘翅纤毫毕现的甲虫。埃及人观察过圣甲虫把粪球推向太阳，从中看到了神凯布利在黎明推动太阳。他们把它放进坟墓，放在亡者的心口上，以确保重生。

护身符。绿松石色釉砂的乌加特之眼，荷鲁斯之眼，在搏斗中被赛特夺走，后来又被重新拼合。三厘米，一颗彩绘的瞳孔，用化妆艺术的线条模仿隼的羽毛。一尊青金石的朱鹭头托特，书吏们佩戴它，好让手中的芦苇笔

下笔不差。一尊深红色红玉髓的塞赫迈特。人们佩戴它，使战争与瘟疫不近其身。

德农还买了两只雪花石膏的卡诺卜罐——一只盖子是胡狼头，另一只是狒狒头——守护着亡者的内脏。高十六厘米，半透明的雪花石膏透出蜜色的光。几片写满僧侣体文字的纸莎草残片，买下时并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它们说了什么，东方学家们要到多年以后才会知晓。那是*《亡灵书》*的咒文，是通往彼世的护佑祷词。工程师西莫内尔在底比斯买到、后来被称作卡德纸莎草的一卷类似的纸莎草，载有《亡灵书》三十八章或咒文的片段。

卡德纸莎草日后将进入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号为*埃及文1至19号*。

但在萨卡拉的这个早晨，这一切他还一无所知。让他停下脚步的，他就买下。集市渐渐散了。暑气渐升。明天还会有别的草席，别的物品，别的交易，而这些交易的字句，他不可能尽数记下。

一天早晨，天刚破晓，若弗鲁瓦手里有十二页笔记和一个信念。尼罗河鳄与南美洲的凯门鳄，骨骼结构相近到不可能出于偶然。这种解剖学上的趋同，跨越数千公里和一片大洋，提出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生物学无法回答的问题。

若弗鲁瓦还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个想法与巴黎所教授的东西太过抵触。

十一月，在萨卡拉，若弗鲁瓦将请德农带他看浮雕中的动物形象。他们将花半天时间，把画中的朱鹭与活的朱鹭作比较。画与鸟将如出一辙，仿佛三千年什么也没有改变。德农将把两者并排画下来——活的与画中死去的——却不知道哪一个更像原型。

III - 金字塔战役

7月21日，军队望见了金字塔。

三角形的轮廓，从十来公里外便在地平线上显现。士兵们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没有人下过命令。波拿巴骑在马上，一言不发地望着它们。

然后他转过身来，面向自己的部下。

“士兵们，四十个世纪，正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俯视着你们。”

他向将领们示意，声音没有压低。

“邦将军，左翼师。德塞将军，右翼师。不要动。让他们来。”

接着，声音更低，只对他自己说，面向着金字塔。

“既然如此，就该打赢。”

学者们被送到步兵方阵内部，与行李和伤员待在一起。他们挤在骡子和弹药车之间，只到最后几排士兵的肩头。蒙日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从他所在之处，只能看见与人等高的东西。越靠越紧的双脚，双手握着的步枪，脖颈上的汗。从南面升起的尘土。马穆鲁克骑兵正在逼近，仍然看不见。左边一个士兵用阿尔萨斯语低声喃喃。蒙日听不懂。语气已经足够。自离开土伦以来，他头一回自问，一个几何学家在这里做什么，夹在两头骡子之间，而一支骑兵正在冲锋。

轰鸣先于马蹄声到来，那是脚底之下大地的一阵震颤。随后最前排开火，黑烟遮蔽了一切。排枪一轮接一轮，节奏均匀。间歇里，传来叫喊声。那是从马上坠落的人发出的。

蒙日在方阵内部看不到的，骑在马上的军官们却看得见。穆拉德贝伊把他的兵力部署在南面，位于濒临尼罗河、

筑有工事的安巴巴村与金字塔之间的平原上。六千名马穆鲁克骑兵，也许七千，聚成起伏的阵型，形状不断变化，却从不凝固。没有线。没有固定的行列。一支如水般铺展在不平整表面上的骑兵。阿拉伯马比法国的坐骑矮小，五十骑一群、一百骑一群地奔驰，听从一位看不见的首领的信号变换方向。在他们身后，赭色的尘土升起，直到遮没天空。

波拿巴把各师编成五个大方阵。三万八千名从土伦登船的人中，有两万五千人排成六列纵深，刺刀向外，军官与行李在方阵内部。这是军事学校所教授的理论队形，按理说绝不会在骑兵冲锋下溃散。军中没有人见过六千骑兵同时冲锋。

第一波冲锋来自东南。约一千名骑兵，从马穆鲁克大部队中分出，直扑德塞的方阵。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武士贵族阶层，而非一支军队，每个骑手都为自己的荣耀而战，全无统一的号令。他们佩着弯刀，腰间别着手枪，肩上斜挎着卡宾枪。有的穿着在阳光下闪亮的锁子甲。有的穿着绣花的丝袍。

他们全速冲锋了三百米。德塞的方阵在等待。二百五十米。军官们高喊着守住队列。二百米。步枪举了起来。一百五十米。波拿巴在中央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地望着。一百米。步兵能分辨出冲锋骑手面孔的距离。七十五米。开火的命令。

第一轮齐射正面击中了冲锋的队伍。子弹先打中马匹，它们比人更宽大，然后是骑手，他们向前或向一侧翻倒。到了五十米，冲锋放慢了。不是骤然停住。而是逐渐瓦解。马匹拒绝朝刺刀前进。几名落单的骑手冲到了方阵跟前。他们用弯刀砍向交叉的步枪，却无法突破六列的纵深。第二轮齐射在咫尺之内将他们放倒。

幸存者撤了回去。但接着又有新的冲锋。穆拉德贝伊一波接一波地投入骑兵中队，希望在法军阵形中找到一道缺口。每一波都在步枪前撞得粉碎。一个小时过去，方阵依然屹立。法军阵地前的地面上，布满了死马和受伤的骑手。火药的烟雾凝滞在静止的空气里，形成一片灰色的雾，遮住了背景中的金字塔。

德农仍在盲画。一个个后背，步枪，烟，高出人头的一角金字塔。面前那个阿尔萨斯士兵的后颈，一支支举起又落下的步枪，呛人的浓烟。外面刚刚发生的一切——冲锋，击碎马穆鲁克中队的齐射，法军骑兵的反击——他都无缘看到。他留下的只有烟、热、汗，和声响。

战斗已持续一个多小时，波拿巴命邦师和维亚尔师猛攻尼罗河畔安巴巴的壕沟营地。步兵纵队端着刺刀推进，与其说是为了追击敌人，不如说是要给它一记旨在打散其凝聚力的猛击。夹在纵队与河流之间的马穆鲁克们向后退去。有的在骑马渡河时淹死。有的在河岸上被追赶的法军步兵击倒。

穆拉德贝伊明白，战斗已经输了。他的骑兵单看个个出色，面对一支纪律严明、寸步不让的步兵，却无计可施。他下令全线撤退。战斗开始不到两个小时，幸存的马穆鲁克就向南疾驰，把战场留给了法国人。他们身后留下了数千具尸体。法军的伤亡不到三百人。

德农画下了金字塔，前景是死者。凯旋的画作，以后自会有人订制。

军队重新开拔。这时，金字塔回来了。不是早晨出现时的样子，尘土中遥远的轮廓，而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随着靠近，它们变大的方式与寻常的透视毫无关系，并且不再能与任何已知之物相比。在二百米处，德农明白

了，自己一生都在想象以人为尺度的建筑。这些金字塔，却是按建造者心中“何物当永存”这一观念的尺度建成的。它们庞大，庞大得肆无忌惮。欧洲没有任何建筑能与之相比。

年轻的综合理工学院出身的若马尔取出测量仪器，开始最初的测绘。他当晚记下的数字——底边长度、各面倾角、估算高度——不过是一份草稿，他将在 1799 年测绘吉萨金字塔时，按部就班地重新核对。

德农端详着金字塔，又看看在它们脚下扎营的军队。这些古迹重达数百万吨。它们哪儿也去不了。但它们所包含的物品则是另一回事。墓里找到的小雕像，纸莎草，釉砂圣甲虫，这一切都装得进一只行军箱。

夜幕很快降临在吉萨高原上。士兵们点起营火。火焰橘红色的光，把石块的底部映得泛红。若马尔已在毯子上躺下，德农却久久地站着，眼睛望向天空。

过了午夜，他拿起炭条，走近大金字塔。哨兵没有拦他。他们已被告知，这个带着笔记本的平民到处走动，不会惹麻烦。他沿着底部走，直到找到一个月亮正好照在西面的角落。石块比人还高。他爬上两三块，在第四块上坐了下来。

石头依然是温热的。不是空气中弥散的那种热。那是石头自身的、由内而生的热，仿佛这一大团石灰岩吸收了白日的阳光，在夜里缓缓释放。手掌平放在上面。他头顶上有一百三十多米的石头，隐没在黑暗里。他只能看见最初几层石块升向黑暗。

德农试着画。月光足以分辨各层石块之间的接缝，手工凿成的表面那细微的不平整，缝隙里深深的阴影。金字塔切割天空处划出的地平线，一层层石块如阶梯般向上。这比白天的画简单，笔记本前没有烟。

凌晨一点左右，若马尔在那里找到了他。他攀上旁边的石块，端详笔记本里的速写，又看了看金字塔，再看了看笔记本。德农终于开口了。

“一场打赢的战役，而一千年后……穆拉德贝伊向南逃去，谁会知道？看看它。它见过一百场像我们这样的战役。它不数。”

“我们的笔记本会写下来，”若马尔说。“严格说来，这与记住它并不是一回事。”

“笔记本。还有金字塔。这就是胜利所留下的东西，我亲爱的朋友。”

若马尔没有立刻回答。他用目光寻找顶端，却看不见。

“我今晚算过，大金字塔大约包含二百三十万块石头。如果工人们每天干十个小时，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持续二十年，就得大约每两分钟安放一块，不间断。没有停顿。没有差错。重复两百万次。让我不安的是，这个计算行得通。他们做到了他们打算做的一切，分毫不差。”

远处，士兵们的营火在平原上闪烁。东北方向的某处，开罗正在沉睡。

德农最后一次端详那幅速写。金字塔的线条映着夜空，简单，绝对。他从未画过如此难以画坏的东西。

若马尔站起身，拍掉裤子上的尘土，向营地走回去。

次日清晨，若马尔与蒙日、德农一同进入大金字塔。他们走的是九世纪时哈里发马蒙强行凿开的通道。那是砌体中的一条隧道，窄得必须弯着腰前进，手里举着冒烟的火把。前一天的暑热已离开高原。石头是冰凉的。

在上行通道里，他们遇见一名往回走的士兵。一个年轻人，也许十八岁，左手举着火把，右手攥着。他贴着石壁让开，好让他们通过。若马尔瞥见了那只右手握着的

东西。一枚蓝色釉砂圣甲虫，有核桃那么大，是在一个侧壁的壁龛里找到的。士兵看着他。若马尔也看着。两人谁也没有说话。日后，德农会在自己的行李里带走一些小雕像。在士兵的口袋与学者们的箱子之间，若马尔已隐隐预感，不过是程度之别。士兵朝出口走去，右手依然攥着。

大走廊让他们猛然止步。长四十七米，高八米半，打磨光滑的石灰岩墙壁以叠涩向上收拢至顶端。通道以二十六度的倾角通向国王墓室。火把高举，光线照不到顶，只看得见两面墙壁在黑暗中彼此靠拢。

“瞧瞧这个，”蒙日仰着头望向墙壁说，“罗马人造拱顶，埃及人造叠涩——同一个问题，朋友们，同一个问题！而他们互不相识。”

“相差几千年而已，”德农回答。“这条走廊比罗马的万神殿早了两千七百年。”

蒙日一边数着步子一边前行。他带了一根有刻度的绳子，在身后放开，每次转弯都记下确切的长度。德农拿着水准器。

在国王墓室里，他们停下歇息。空石棺占据着墓室的西半部。一只整块石头凿成的石槽，没有盖，没有铭文，没有装饰。不知何时，有人砸坏了它的东北角。盗墓者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东西。

若马尔测量了这间墓室的长、宽、高。长十点五米，宽五点二米，高五点八米。数字记下后，他核对了一遍，又记了一次。然后他计算长宽比。接近二比一。接近双正方形。

“看。差不多是二比一。偶然，我可不太相信。一种比例的几何学，我们正在重新发现它……他们没有把它写下来。他们把它建了出来。”

蒙日坐在空石棺的边缘，借着火把的光画着这间屋子。这具石棺曾盛放过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有。或许它一直是空的。很可能这间墓室本身才是坟墓，而不是那只石箱。没有人知道。墙上没有一个象形文字可供说明。即便有，他们也读不懂。

两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地面。清晨的阳光照在吉萨高原上。蒙日在一块石灰岩上坐下，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想着下面的那间屋子。下面绝对的寂静，纯粹的黑暗，还有那具空石棺——它在那儿等了几个世纪，等着有人来把手放上去。他再睁开眼睛时，阳光刺得他皱起了脸。

若马尔打开笔记本。在国王墓室的数字下面，他用不那么紧凑的笔迹添了三句话。“进入一座金字塔，就像进入一个我们既不懂开头也不懂结尾的句子。意义就在那里，有条理，很精确。但我们缺少那门语言。”

下午，趁德农还在收尾东面的测绘，若马尔向高原南边走远了。他希望在走近之前先远远地看一看狮身人面像。他在三百米外停下，凝望。

头颅从地平线上的沙中升起，剪影映在被暑热烤白的天空上。比例令人困惑。对一个人而言太大，对一座纪念碑而言太小，介于两者之间，不属于他所知的任何类别。他精确地描下了轮廓。四条线。鼻子残损后留下的断口。奈姆斯头巾的边缘。围住面庞的条纹头饰。投在沙上的影子。

走近时，细节渐渐增多。淡黄色的石灰岩，被几千年挟沙的风磨蚀。地质层理在岩石中清晰可见。狮身人面像是从天然的崖壁上凿出的。工匠们顺着石头的纹层雕刻，如同雕刻家顺着木头的纹理。耳朵半已磨损，却仍保有形状。眼睛如今是两个凹坑，但浮凸的眉毛表明，当初是有意把它们凿深的。

若马尔坐在沙地上，就在头像脚下，坐进它在傍晚投下的狭窄阴影里。这是此时高原上唯一凉爽的地方。从下往上画那张脸，是一个从未有画家表现过的角度，是坐在纪念碑脚下仰望的人的角度。

“该回营地了，公民，”保护分队的一名士兵过来对他说。若马尔没有回头，只抬了抬手，仍旧没有动。士兵耸了耸肩走开了。光线还够二十来分钟。

他想着狮身人面像守护的东西。或是应当守护的东西。古埃及人，后人才会知道，称它为荷尔-埃姆-阿赫特，地平线上的荷鲁斯。那位隼神，同时也是初升的太阳。这张脸朝向东方，不偏不倚地朝向东方，朝向日出时的太阳——一种天文学的计算，其精确，连他自己的仪器也只能加以证实。

这里的一切都是有意为之。没有什么东西是仅仅为了装饰而装饰。每一个比例，每一个朝向，每一种选用的材料，都遵循着建造者心中的一套逻辑；他们不觉得有必要说明，因为后继者同样清楚。后来后继者消失了，逻辑也随之消失，只剩下石头，精确而沉默，在一位二十岁的工程师的铅笔之下。

待到光线不够用了，他站起身，再一次望着那张脸。缺失的鼻子并未减损它的神情——如果那算得上一种神情的话。至于宁静，他不敢断言。他抖掉衣摆上的沙子，踏上回营地的路。

7月24日，开罗的攻占出乎意料地迅速。城门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便打开了，当地当局宁可谈判，也不愿与一支刚刚见识过其火力的军队交锋。波拿巴率领部队进入埃及首都，穿过一条条小巷，居民们谨慎地待在屋里。

面对开罗，所有士兵无不惊叹。在沙漠里熬了数日，又沿尼罗河行军之后，眼前竟是一座有三十万居民的城市。熙熙攘攘的集市，数不清的清真寺，棕榈与橘树的园林，喷泉。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最奇异的城市。

入城当晚，若弗鲁瓦走遍了汗·哈利利一带。边走边画，随手记录。这座城市在他看来是一个完整而连贯的世界，依照某种逻辑组织起来，而他要过几个月才会掌握其中的钥匙。

自十四世纪起，汗·哈利利就是开罗的商业中心。一座有顶的小巷迷宫，金匠、织工、香料商、书商、铜器与黄铜器制造者挤在其中。他在那里游荡了一个钟头，笔记本摊开着，却无法把画定下来，因为人流从不停歇。面孔，布料，货物。一切接踵而来，快得抓不住。

一位卖阿拉伯书法的老商人注意到他，示意他进店。若弗鲁瓦接受了。老人在他面前铺开一张张写满符号的纸，他读不懂，却一眼认出其中的审美价值。弯曲的线条，变音点排布之精准，既像绘画，又像书写。他以一笔不大的钱买下了三张。商人又送给他第四张，权当欢迎。

这个举动触动了他，就在亚历山大的枪声之后，在街头那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戒备之中。这里面毫无对法国的好感。倒不如说是某种待客之道，一如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的样子，早于法国人，早于奥斯曼人，甚至早于阿拉伯人。老人已经回去摆弄他的芦苇笔了。

若马尔更务实，立刻关注起这座城市的规模。三十万居民，超过巴黎人口的一半，却挤在小得多的地方，街巷狭窄，仅容两头驴并行。他记下了街道的宽度、建筑立面的大致高度，以及建筑占地与内院面积之比。这些数据日后将用于他的人口估算。

波拿巴看开罗，则把它看作一道行政难题。三十万居民，需要靠两万五千名疲惫不堪的士兵去统治，力量对比并不乐观。他需要本地盟友，需要间接的行政管理，需要一种借来的正统性。进城当晚，他就开始办公，而他的士兵们已累得瘫倒在地。

蒙日和贝托莱在一座废弃宫殿的庭院里碰了面，喝着埃及咖啡，端咖啡的仆人是后勤部门当天早晨刚雇来的。

“好啦，我们到了！”蒙日举起杯子说。“六个星期的海上航行，马耳他，沙漠，一场战役……还有这咖啡，尝尝这咖啡，浓得像酱汁。就在马穆鲁克的宫殿里！”

“最要紧的还剩下，”贝托莱说，没有去碰自己的那杯。

“是什么？”

“弄明白我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国家……其余的——征服——那是容易的部分，蒙日。”

蒙日放下杯子，打量着庭院。一棵棕榈，石砌的水池，墙头之上的星空。五十二年来，他一直相信科学能够打开世界。它确实打开了，可这种打开竟会令人畏惧，他从未料到。开罗仍未入睡。附近的街巷里，军队正安顿下来过夜。此起彼伏的喝令声，马匹的嘶鸣，木箱落地的闷响。

IV - 阿布基尔海战

8 月 1 日，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袭击了法国舰队。战斗持续了一夜。拂晓时，十三艘战列舰中有十一艘被击沉或俘获。旗舰东方号已经爆炸。

自 7 月初起，法国舰队就排成一线停泊在阿布基尔浅湾，等待布吕埃斯海军上将的命令。十三艘战舰并排下锚，右舷朝海，左舷朝陆。这是舰队停泊时的经典布阵，借

海岸作依托，护住一侧。布吕埃斯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亚历山大港水太浅。他以为纳尔逊只能从正面进攻。

但纳尔逊看出了这种布阵的弱点。海湾既然深得足以容下十三艘战舰，也就深得足以让船只从这些战舰与海岸之间穿过。法国人只防住了外海一面，把左舷暴露在外，自以为没有人敢闯进浅水区。纳尔逊敢。

进攻在十八点三十分打响，当时太阳正沉向地平线。十三艘七十四门炮的战舰和五十门炮的利安德号驶入锚地，但卡洛登号在浅滩搁浅，未能参战。其中五艘在福利舰长的主动带领下，从法军战线与海岸之间穿过，其余的从外海发起攻击。法国人陷入两面夹击，左舷的火炮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从未想过要朝这一侧作战。

战斗在渐浓的暮色中展开。法军战线最前列的几艘战舰猝不及防，许多水手还散在岸上，来不及召回，战舰便被压垮了。勇士号、征服者号、斯巴达人号遭到英军火炮的近距离轰击。到二十点，已是漆黑一片。人们只能借着炮火的闪光、受损甲板上蹿起的火焰，以及地中海上升起的月光厮杀。

东方号是一艘一百二十门炮的旗舰，位于法军战线的中央。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舰，1791 年建于土伦。布吕埃斯在舰上指挥，身负重伤却拒绝离开岗位，直到一发炮弹将他击毙。二十一点，艉楼上起了火，那里散放着油漆罐和油桶，火势蔓延到下层甲板，又烧向弹药舱。水手们试图扑灭，但水泵早已在先前的炮击中被毁。

二十二点，东方号爆炸。二十多公里外的亚历山大都看得见爆炸。一道火柱冲上夜空，高达一百米。爆炸声在整个海岸线上回荡。长达十分钟，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没有再开火。燃烧的残骸重又落入海中，水手的尸体被抛

向空中，落在离战舰数百米外的水里。东方号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千名船员中，只救起寥寥几名幸存者。

沉寂过后，战斗重新开始。幸存的法国战舰试图自卫，却已被团团围住，船员伤亡惨重。8 月 2 日拂晓，十一艘法国战舰被毁或被俘，只有两艘设法逃向外海，即威廉·退尔号和慷慨号。它们将逃往马耳他。其余的被击沉，搁浅在海岸上，或落入英国人之手。

阿布基尔海战是纳尔逊最大的一场海上胜利。法军死伤和被俘者达数千人。英国人一艘战舰也没有损失。地中海重新成了他们的海。

没有舰队，法国军队便成了埃及的囚徒，没有援兵，没有补给，无路可归。三万八千名士兵和一百六十七名学者，与世界隔绝了。

消息于 8 月 14 日传到波拿巴那里，他正在从萨利赫耶返回开罗的路上，送信的是克莱贝尔从亚历山大派来的一名参谋军官。一到首都，他就召集了军事会议。

“布吕埃斯把舰队泊在阿布基尔湾，而没有把它安置到亚历山大的安全之处。纳尔逊趁夜进攻。舰队毁了。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卡法雷利，四十二岁，工兵将军，自曼海姆围城战后便装着一条木腿，直率如同一种职业病。他问出了那个人人都到了嘴边的问题。

“波拿巴将军，长远的战略是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留到什么时候？”

波拿巴迟疑了。

“我们控制着尼罗河，卡法雷利。埃及养得活我们的军队。马耳他给了我们足以支撑下去的储备。我们不依赖督政府。继续前进。东方军与法国断了联系，我们如今不得

不成就一番大事。如果不能从海上回去，我们就从陆路回去，穿过叙利亚和土耳其，或者留在这里，直到形势改变。”

“这么说，是囚徒了，”蒙日说，发出一声没能笑开的轻笑。“要囚多久？”

贝托莱更为坚忍，去寻找一个先例。

“亚历山大大帝离开马其顿十一年，蒙日。没有人为他惋惜。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会比我们活得更久。就想着这一点吧。”

会议结束后，卡法雷利在宫殿的走廊里找到傅里叶，伸手按住他的手臂，拦住了他。卡法雷利是军中唯一一个在文职人员面前不做作的将军，也是唯一一个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而无需先征得许可的人。

“您听见波拿巴的话了。他已经下令继续。您怎么想？”

“我想他别无选择。而且他自己也清楚。”

“那我们呢？”

“我们也一样。”

卡法雷利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松开傅里叶，朝他的军官们走去，木腿在石板地上哒哒作响。

整个事业如今系于这样一件事，一位海军上将把船泊在了错误的地方。

舰队覆灭的消息传到学者们耳中，途径各不相同，要看他们在营地里的地位高低。有些人从穿过庭院的参谋军官口中得知，另一些人则是从一个听见士兵谈论此事的埃及仆人那里听来的。

那天晚上，若马尔在回住处之前，绕到哈桑·卡希夫宫殿的北侧附属建筑，藏品就存放在那里。他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手写的清单。

木箱都在那里，那些贴着他亲笔标签的箱子，还有蒙日和贝托莱的官方藏品。西北角靠着后墙，是二十三只没有标签的箱子。没有序列号，没有专员的姓名。普通木料，匆匆钉成，钉子是斜着敲进去的。他试着抬起其中一只，一个人根本抬不动。他的手指伸进木板间的一道缝隙，触到了帆布，布后面有什么坚硬的东西。他没有强行撬开。在今晚之前，从远征之初起，他已经见过它们三次。第一次是在亚历山大，当时没有在意，它们混在别的箱子里。第二次是几天前，他提着灯笼来查看藏品的时候。第三次是昨天。它们一动未动，也没有人来认领。它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在表格、委任状和清单簿之外。它们是这次远征中没有名字的那一部分。

他把这二十三只箱子的存在记在了个人日记里，写在一页的末尾，注明日期，并写道：“来源不明。内容未核实。”他对谁也没有提起。这些箱子终归属于某个人，那人会来认领，或者不会来认领。

第二天下午，若马尔去汗·哈利利的香料市场，看看城里是否已知道这个消息。乍看之下，什么迹象也没有。商贩照常叫卖，买主照常购买，胡椒和肉桂的价格与上周相比毫无变化。

一个他认得面孔的布料商向他招手示意。那人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先指指天，再指指北面的海，接着双手合拢又猛地张开，他让双手张着停了一会儿，掌心空空，悬在成卷的棉布上方。

“他们知道了。”若马尔对他的翻译说。

“从昨晚起就知道了。在市集里，消息比信使还快。他们说法国舰队被消灭了，你们现在成了这里的囚徒。”

“那他们怎么看这件事？”

翻译与商贩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对他说。

“他说，法国人不是第一批被困在埃及的人，马穆鲁克也曾以为自己会一直待下去，等你们走了，尼罗河还会继续流淌。他还说，如果你们想买布，他今天可以给个好价钱。”

若马尔买下了一块靛蓝色的布料。并非出于什么实际用途，而是因为那颜色很美，也因为他想在这一天里做成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另一个问题更让他挂心。他自己的笔记本，德农的素描，若弗鲁瓦的藏品，要怎样才能回到法国？

夜幕降临，消息已在城中彻底传开，学者们聚集在宫殿的内院里。没有人提议过要在那里碰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被同一种不愿独自面对这个消息的需要牵引着。

几分钟后，贝托莱来了，手里拿着一张演算纸。他坐下来，把纸摊在膝头，开门见山地对蒙日说：

“我估算了现有的给养。面粉、油、大米、干肉。只要配给得当，军队不依靠外部补给也能支撑十六个月。我们不会饿死。总归还有这一点。”

“让我操心的不是饥饿，”蒙日说。“而是……”

“我知道。可这是我能计算的。”

傅里叶独自坐在远处的柱廊下，一言不发。凡是言语无法容纳的东西，他都托付给数学。失去舰队是一个多变量的问题——给养、援兵、可能的撤退路线——其方程总是不肯就范。他还是在寻找。这就是他害怕的方式。

“我们的藏品呢？”若弗鲁瓦说。“它们怎么回去？”

没有人立刻回答。这是所有人都在心里问过、却谁也不愿第一个说出口的问题。

“笔记本可以揣在我们的口袋里带走，”若马尔补充道，“测量数据、记录、草图。每人不过几公斤的东西，什么地方都带得过去。”

“那箱子呢？”若弗鲁瓦说。“我的标本。贝托莱的样品。陶器、纸莎草、小雕像。那些沉重的东西。”

贝托莱把演算纸折了起来。

“沉重的东西是脆弱的，这一点必须承认。如果英国人控制了地中海东部，我们想装船运走的一切都可能被截获。”

一只猫穿过石板地面，消失在柱廊下。城中某处，宣礼员开始唱响夜间的召祷。声音悠长，蜿蜒曲折，随着旋律起伏。这旋律若弗鲁瓦自 7 月 1 日以来每个夜晚都听到，却始终觉得陌生。

“波拿巴说过，要是海上……总之，如果走不了海路，我们就取道叙利亚回去，”蒙日说。

“波拿巴什么话都说，”贝托莱答道，“今晚，他说这些话是对的。军队需要有所相信。”

他们在庭院里待了一个钟头，什么也没有决定。

他们先后起身，各自回了房间。本来也无事可做。

若弗鲁瓦在书桌前坐下，写了起来。

“十四个夜晚之前，我们失去了舰队，而我们并不知情。我说‘我们’，因为这个词最准确。这是集体的损失，即使我不在阿布基尔，即使我不是水手。而我随舰队一同失去的，是这样一种确信，即我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将带不回法国，至少不会以我所选择的方式带回去。我的笔记本，我的图版，还有我自亚历山大以来在市场上、向渔夫们收集的七十种鱼类、鸟类和爬行动物。这一切如

今都成了一种军事局势的人质，而我对这局势毫无左右之力。”

他停下笔，重读一遍，划掉了最后一句。太像诉苦。他又重新写起。

“今晚让我挂心的不是恐惧。我不认为我们会死在这里。波拿巴会想出办法，他总能想出办法。让我挂心的是一个更抽象的问题，即如果见证人回不去，见证还有什么用。我画下的鳄鱼、朱鹭、尼罗河的鱼的图版，只有被人看见才有价值。锁在开罗的一只箱子里，它们的价值并不比它们所描绘的动物更多。”

他让墨迹晾干。

他的笔记本和图版加起来约有十公斤重。装在罐子和木箱里的标本约有四十公斤。一个人可以背着十二公斤走一段长途。四十公斤则需要一匹马或一头骡子。可军队的马和骡子，并不是用来供一个文职博物学家运送私人收藏的。

他列出一份清单，写下假如形势所迫，他自己能背得动的东西。首先是笔记本，绝对优先。其次是解剖用具——手术刀、剪刀、镊子——共几公斤。在标本之中，最小也最珍贵的是鸟皮、爬行动物的颅骨、干制的鱼，还有一只木乃伊化的朱鹭。这些都装得进一只皮挎包。

其余的——罐中的大鱼、鳄鱼、哺乳动物的颅骨——都得留下。如果真像波拿巴所说，徒步取道叙利亚，就不可能把罐子放在沙漠中行进者的背上。

这种被迫的取舍，让他领悟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自出发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记录埃及，以便把它带回法国。他能带回去的，与其说取决于他的选择，不如说取决于什么东西在物理上走得动。人们讲述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那些得以回去的东西的历史。

他写下最后一行。

“如果这些笔记本到了你手里而我没有到，那是它们独自走完了这段旅程。这大概是最好的旅行方式。物件比人轻。”

他把信纸折起，塞进第一本笔记本里，夹在土伦那几页之间。然后他吹灭了灯，等待天明。

V - 埃及研究院

阿布基尔海战三周之后，波拿巴于 1798 年 8 月 22 日，也就是攻占开罗二十九天之后，颁布法令创立了埃及研究院。

研究院的官方使命，是从自然、历史、经济各个方面研究这个国家，并回答军事行政部门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问题。研究院设在哈桑·卡希夫宫。波拿巴任副院长，蒙日任院长。每隔五天，学者们便在大厅里落座，继续他们的工作。

蒙日主持了第一次会议。

他曾向工匠的子弟讲授画法几何，那些孩子是一边学认字，一边学圆锥曲线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创办，就是要让才能取代出身。在他看来，埃及与其说是一场征服，不如说是革命后的法国有能力做出君主国永远做不出的事的证明，即在一场军事远征的腹地开展一次科学考察。

他以寥寥数语开了场。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理解，朋友们。不是为了征服——这件事自有别人干得很好。我请求诸位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若弗鲁瓦坐在最后一排，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波拿巴常来。学者们乐于被一位大权在握的人倾听。

“诸位先生，埃及曾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三千年的历史被埋在地下，你们要把它们发掘出来。测量，绘图，采集。还要研究今日的埃及。科学要么造福生者，要么一无是处。”

10 月初，德农自亚历山大起就随军而行，在战役当晚见过金字塔，此时又回来花了好几天，从各个角度描绘它们。若马尔和他一起爬上了大金字塔的顶端。在高及胸口的石块上攀登了半个小时，手掌磨破了皮。从上面望去，西边是沙漠，东边是尼罗河谷，东北是开罗。

“整个埃及尽收眼底，”若马尔低声说。

“是啊……看看东面上的光线。从这里，我就能把四个面的透视都定下来了。”

他们测量了卜塔神庙的遗迹，卜塔是孟菲斯的创世之神。尘土中躺着一尊粉红色花岗岩巨像的残片，一只粗如树干的手腕，几段腿，一颗头颅，后世将把它们归于拉美西斯二世。

这项工作吃力不讨好。雕像碎成了几块，散落在草丛里。要靠累加来重建尺寸，弥补缺失，估算残缺的部分。

近午时分，若马尔躲进头像的阴影里，头像高近两米，温热的花岗岩贴着他的后背。

他端详着那张脸。嘴角微微含笑，这是公元前十三世纪人们为新王国巨像雕出的那种微笑，既不和善，也不凶狠。鼻子已被砸断，多半是中世纪的士兵所为，他们以为毁掉面容便能毁掉一种权力。额上的圣蛇，即象征神圣王权的王家眼镜蛇，已被扯去，只剩下痕迹。奈姆斯头巾完好无损，平行的条纹在尘土下依然清晰。

在腰带上，约在髋部的高度，那里的断腿带走了其余的部分，若马尔发现了一个王名圈。两个拉长的椭圆，由一条连续的线圈起，那是王的名字，当时还没有人能读懂。

这颗头带不走。它重达数吨，是用一整块粉红色花岗岩雕成的，采自阿斯旺的采石场。

一位老人蹲在巨大头像的阴影里，已经看了若马尔好一阵子。也许是看守，也许只是比他先坐在那里、一直没有挪动的人。若马尔给他看自己的笔记本，看那些演算的草图。老人说了话，但若马尔听不懂。接着他拾起一根细枝，在雕像的脚边尘土里画了两条平行线，又斜着画了三道。一幅图。与若马尔的不同，却看得出来，那是一个重物在斜面上移动。他们就这样待了片刻，两个人，两幅草图都在尘土里。一个有仪器，另一个有记忆。若马尔在心里算了算。整尊雕像在倒下之前重八十吨。放在一条船上。尼罗河上的船是人所共知的。扁平、轻便的小船，最多能载八吨。那么，八十吨是怎么在水上运送的呢？

显然不是一条船。而是几条船拼成一座浮筏，捆在一起，雕像放在连接所有船只的粗木梁上。计算表明，至少需要十条标准尺寸的船，紧密地系成一队。

十条船。数百米的缆绳。数百个人。只为把一尊雕像运到一座神庙。

令他惊异的并非那项技术壮举，它虽然艰难，却是做得到的。不，令他惊异的是做这件事的决心。决定把八十吨的巨石沿着九百公里的水路运送，须有一种笃定。笃定结果值得付出这番努力，笃定这尊雕像一千年后依然在，笃定法老想要颂扬的帝国将永世长存。

帝国没有长存。雕像倒卧在尘土中，虽已破碎，却还在，量得出。

若马尔不禁想，古埃及的伟大，是否与其说在于它做成了什么，不如说在于它打算留给那些在很久很久以后才到来的人什么。他在花岗岩的膝头上削尖了铅笔。

德农腋下夹着素描本经过，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您在沉思？”

“我在测量。两者是一回事。”

11月初，贝托莱清点了自7月以来所做的工作。数以百计写满的笔记本，数以千计的标本，关于地质、灌溉、木乃伊制作、农业和语言的论文。三个多月的工作，一本账册就装得下。

自8月底以来，德塞一直在上埃及追击穆拉德贝伊。波拿巴决定派一名绘图员去他那里，考察底比斯的古迹；一个人数更多的委员会要到 1799 年秋天才会随后前往。德农自告奋勇，定于12月初出发。

藏品的问题，已经让所有人为难，而谁也不愿去裁断。学者们采集自然标本，如矿物、动物剥制标本、干制植物，得到了波拿巴的默许，他从中看到了日后在巴黎建立埃及博物馆的基础。古物则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那种默许变得更难以启齿了。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从安巴巴的鱼市回来，带回了八种他从未见过的鱼。

解剖一条陌生的鱼，对他而言是一场对话。切开，观察，记录，再与他记忆中欧洲物种的解剖结构作比较。鱼类的内部结构在不同物种之间惊人地稳定。同样的器官处在同样的位置，只是因生活方式不同而略有变化。底栖

鱼类的眼睛位置与中上层鱼类不同，但其下的基本构造是相似的。

解剖构造在千差万别的物种之间如此恒定，这是他开始隐约窥见、却还说不清的东西。如果物种是分别创造出来的，如主流学说所主张的那样，它们为什么会共有如此精确的构造？答案是它们源自共同的祖先，而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自然史博物馆的教授居维叶会驳斥它。科学院会对它侧目而视。

第四条鱼已在案板上剖开，德农走了进来，鼻子底下已捂着一块手帕。

“还在摆弄您的鱼？您这屋子一股鱼市的味儿。”

“象鼻鱼。尼罗河，非洲的大河。看这儿，尾巴下面——发电器官。亚马孙的鱼也有类似的，是在相隔八千公里、毫无接触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是巧合吗？不。我想，是解剖结构上的约束。”

那天早晨带回的八种鱼中，有一种令他骤然停步。他是从一个渔夫那里买来的，那渔夫不明白这个法国人为什么对这种平常的鱼感兴趣。

鱼被放进观察用的水盆，那是一只盛满尼罗河水的陶盆。鱼长约六十厘米，棕金色，身披鳞片，厚实如相互铰接的小盾。游得很慢，带着爬行动物般的庄重。

让若弗鲁瓦停住的，是它的胸鳍。

不是他二十岁以来解剖过的所有鱼那样扁平而呈放射状的鳍，而是肉质的、分叶的附肢，由一种形似肢体的内部结构支撑着。

他花了一夜观察这条活鱼，随后又将它解剖。鳍的内部结构里有一样东西，像是肱骨，一根居中的长骨，鳍条从它那里伸出。这种鱼，他后来将其命名为 *Polypterus bichir*，

与亚马孙的鱼毫无关系。然而它的鳍却与它们共有同样的基本解剖构造。拂晓时，水盆里的水泛起了淡红。

次日晚上，若弗鲁瓦给居维叶写了信。居维叶留在了巴黎，他觉得这次远征太冒险，太不确定。他们的信件在海上交错，迟到了好几个月。

“亲爱的朋友，”若弗鲁瓦写道，“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样东西，单凭它就足以证明我们此行的价值。一种看起来长着手臂的鱼。当然不是手臂，是鳍。但它的内部构造像是肢体的构造，而且与那些从未有机会杂交的物种完全相同，一模一样。我仍不知该作何想。但这不可能是偶然。”

居维叶好几个月没有就这一点作答。待他作答时，只是说相似并不意味着有共同的起源，上帝完全可能在不同情形下使用了同一种构造。

VI - 开罗起义

自 1798 年 10 月初起，若马尔便开始记这座城市的日志。不是私人日记，他没有那种性情，而是一份记录。其中载有各区估计的人口、建筑密度、巷道宽度、立面高度、市场面积。此外还补充了对人流的观察、各市集的开市时间、水的地理分布，包括喷泉及其水池。

10 月 20 日晚上，也就是起义的前夜，他提着灯笼出门，去丈量艾兹白基耶广场。广场是法国人在城中势力的中心。波拿巴在这里设了总司令部，集市、官方庆典和军队集结也都在这里。开罗居民大多只是匆匆穿过，不愿逗留，目光半垂，脚步急促。

他正测量广场的各个角度，用一根标定过的绳子记下距离，这时发现有一伙人坐在喷泉边，看着他干活。

其中一人站起来，走了过来。他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若马尔听不懂。接着他指了指测量绳，又说了一句。若马尔猜想那是在问他做什么。

他给对方看了自己画的广场局部平面图。那人仔细端详，把笔记本翻过来，又举到一臂远处。然后他对同伴们说了一句。他们笑了。那笑声并不嘲弄，倒更像是惊讶。

若马尔始终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他认为，他们是在图上认出了自己的广场。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让他们看到自己城市的俯瞰图。又或许他们笑，是因为这个拿着绳子的年轻法国人想要测量一样根本无需测量的东西。

1798 年 10 月 21 日，开罗居民潜藏的敌意爆发了。导火索是一项新的房产税。开罗卫戍司令迪皮伊将军被人群杀死。

10 月 21 日黎明，数以千计的暴动者手持军刀、长矛和棍棒，涌入开罗的街头。落单的士兵被屠杀，被斩首。起义的街区怒火已酝酿了三个星期，此刻纷纷筑起路障。

波拿巴当时在旧开罗，上午得知起义的消息。人群拦住了通往城里的各道城门，他只得绕道，从布拉克门才进了城。他命令所有可用的部队逐个街区夺回这座城市。

“这场叛乱必须毫不迟疑地镇压下去，”他对将军们喊道，“只要我们露出一丝软弱，天黑之前就会被消灭。对任何敌对的聚集，不必警告，直接开火。”

炮兵轰击了起义的街区。土坯房屋在尘云中坍塌。步兵在街巷里搜剿。爱资哈尔清真寺被攻入，这一亵渎令整个埃及的穆斯林民众震惊不已。

镇压持续了三天。波拿巴下令处决所有被活捉的起义首领。一连数夜，他们在开罗城堡被斩首，尸体被抛入尼罗河。

德农没有等到镇压结束就出了门。他的埃及仆人惊慌失措，劝他回去，他没有理会。

在他所住街区的各条大路上，他看到成群的武装男子。燃烧的店铺。烟的气味，以及烟底下另一种气味，他认得出，却没有说出名字。一名法国士兵倒在小巷里，已经死了。女人们在窗口尖叫。一个孩子在奔跑。法国军队猝不及防，组织反应花了不少时间。

“看在老天的份上，回去吧！”一名军官看见他拿着素描本，喊道，“这不是画画的时候。”

“恰恰相反，现在正是时候。五十年后，如果没有人记下来，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一个钟头后，他终于回去了，在二楼的窗前观看后来的情形。法国士兵在一条小巷里包围了一伙起义者。一座清真寺打开大门，收容逃难的人。

德农关上窗。街上，枪声仍在继续。在几百米外的研究院里，其他学者以另一种方式度过着同一天。

没有人命令学者们留在研究院里。战斗仓促之间，波拿巴无暇顾及他们的行动，也无此必要。两百米外有法国士兵遭到屠杀，每个街区都有手持武器的暴动者，从黎明起枪声就没有停过，这些已足以把他们困在屋内。

傅里叶带着他的笔记本在研究院的大厅里坐下，演算他的方程。他想的是热在物体中如何传播，虽然尚未形成理论。热依精确而不变的规律传播，暴乱却不遵循这样的规律。这又是偏爱物理学的一条理由。

午夜前后，若马尔提着灯笼来与他会合。

凌晨三点左右，贝托莱未经通报就走了进来。他坐下，看着另外两人干了一会儿活。

“您在算什么？”他问傅里叶。

“热在非均匀介质中的传播方式。方程我还没有得出。”

“有用。左边那栋楼从今天早晨起一直在烧。运气好的话，您的思考能预测我们这栋天亮前会不会被波及。”

“继续工作，”他走出去时补充了一句，“这仍是唯一能把我们在此的存在与……唉，与一场寻常的占领区分开来的东西。”

他们沉默地工作到清晨，各人埋头于各自的演算，而城市在窗外燃烧着。若马尔不得不两次剪去灯笼的灯芯。

蒙日则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自阿布基尔之后，已没有正常的邮路。他还是写了。信里写了什么，永远无人知晓。他把信仔细封好，此后一直揣在上衣里，直到十个月后离开埃及。

10 月 24 日，学者们小心翼翼地走出研究院。三天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直闭门设障，听着外面的枪声。好几个街区只剩下冒烟的废墟。

德农走进满目疮痍的街道，开始作画。

至少，他试着去画。眼前是一座坍塌的房屋，墙面被炮弹轰飞，烧焦的木梁横在街上，尘土里有一只孩子的鞋。他描出了尚存部分的屋脊线。在吉萨，他从各个角度画过金字塔。在马耳他，他画过被运走的和被留下的艺术品。德农一向认为，绘画就是见证，而见证是中立的。铅笔没有立场。曾经存在的东西被固定下来，仅此而已。

可这座房子，是法国士兵毁掉的，是他随行的这支军队的炮兵毁掉的。他吃饭、行走、工作都要依靠这支军队。他画下这些废墟，所留下的将是一份镇压的文献，而他在此地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为这场镇压作了背书。

德农还是画了。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本能。画页渐渐填满。合上画册时，他说不清这一举动是必要的还是

可耻的，或者两者兼是。他的双手沾满灰烬，一直到手腕。

小巷更深处，一扇雕花木门被从铰链上扯下，倒在地上。一间市集的店铺被洗劫一空，货架翻倒，一只铜箱敞开着，空空如也。德农想起哈桑·卡希夫的宫殿，想起那些填写清单的专员。同一个动作，只是少了标准与分辨。在这里叫抢劫，在那里叫采集。他用脚把铜箱的盖子合上了。

哈桑走在德农前面开路。在伊本·图伦清真寺附近，他们发现两名法国士兵正在搬空一间织工的店铺。布匹一包一包从门里运出，堆在一辆木头独轮车上。丝绸，染色棉布，留着节庆时用的白麻布。其中一名士兵正把一台织机从墙上的支架上摘下来。

店主站在里间的门框里，是一个穿黑衣的女人。她望着，一言不发。没有哀求，也没有喊叫，只有一双眼睛，跟着每一个包裹移动。士兵推着车从她身旁经过，她恰好后退了一步，不多也不少。

哈桑留在街上。无须翻译。德农看了他片刻，哈桑看着那个注视着士兵的女人，而德农明白了，这位中间人也看得见，而看见却无力作为，会在一张脸上留下一种特别的颜色。他没有记任何笔记。

当天晚上，哈桑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在科普特人聚居的街区，军队在那里为他租了一间房。他既不站在士兵一边，也不站在起义者一边。他站在语言一边。他是译者，立在一条自己无法跨越的界线两侧。法语的命令被翻译，阿拉伯语的哀求被翻译。有些日子，他已不知道自己用哪种语言在思考。今晚，他什么语言也没有想。

德农画下了被搬空的店铺。墙上曾挂过布匹的钉子，地上织机放了多年而留下的较深的印痕，门框里那个注视

着的黑衣女人。画得很快，没有说明，没有日期。画完时，士兵们已推着车走了。女人回到店里，关上了里面的门。

镇压结束后，波拿巴召集了幸存的显贵和没有积极参与起义的乌里玛，向他们明确说明今后再有任何叛乱企图将招致的可怕后果。

“你们看到了所发生的事。你们的街区被毁。你们的首领被处决。爱资哈尔遭到炮击。如果你们再次造反，我就把整座城市夷为平地。”

“这场起义暴露出我们处境根本上的不可能，”蒙日在镇压之后的会议上对波拿巴说，“我们不能永远只靠军事力量统治这个国家。民众对我们怀有敌意，只要我们还以外来占领者的身份待在这里，这种敌意就会持续下去。”

那次会议结束得很晚。第二天早晨，波拿巴召见蒙日。在艾兹白基耶广场附近一座被征用房屋的内院里，远离军官们。那里有咖啡和两只凳子。波拿巴站着。

“您说过，我们不能单靠武力来统治。好吧。您有什么建议？”

蒙日没有想到在这一点上会被征询意见。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要有制度。不要宣言，要制度！依照人所共知的规则运作的法庭，学校，还有——这是最重要的——保护费拉不受专断之害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就是大革命在法国所做的事，只是放在这里做。”

“需要多久？”

“至少一代人的时间。”

“我们没有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或许只有两年。”

“那么您就无法统治这个国家，不是真正地统治。您可以占领它。这是两回事。”

波拿巴久久地注视着他。

“占领就够了。对于我想做的事来说。”

蒙日没有问波拿巴想做什么。

当晚，蒙日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波拿巴知道他并没有在统治。占领是被管理的。这个区别他不太在意，我却很在意。我仍不知道，埃及人在不在意。”

镇压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一种脆弱的常态重新建立起来。市场重新开张。清真寺再次迎来信众，唯有爱资哈尔依然关闭。法国士兵恢复了巡逻。学者们带着笔记本和仪器，重新在城里出入。

起义之后，学者们对自己身在开罗有了不同的体会。与民众和平共处的幻想已经破灭。他们继续工作，出入市集，与几位开罗的显贵保持往来。但一种潜伏的暴力随时可能再度涌现。

在开罗人眼中，德农依然是他一向的样子。一个法国人，因而是占领者，因而是潜在的敌人。

大多数店铺已重新开张。工匠们在干活。

在爱资哈尔后面的一条小巷里，德农发现一所古兰经学校，学生们正在重新上课。孩子们围成一圈坐在一位老先生身边，老先生大声朗读，让他们跟着重复。他经过时，老先生抬起眼睛看了看他，然后继续朗读，神情丝毫未变。

孩子们的声音背诵着一篇他们多半依旧不懂的文字，用的是一种他们的父母或许已不再识读的语言。长期在近东和北非商埠工作的东方学家旺蒂尔·德·帕拉迪曾对他说，传承先于理解。词语先进入身体，意义随后才来。这个

举动，却是被理解的。功课从中断的那一节经文接着往下读。

这座城市将以自己的方式愈合，按照法国人无法掌控、也不会完全理解的节奏。孩子们则不等占领者打完仗，便照常背诵他们的功课。

VII - 狮身人面像与墓地

11 月，德农组织了一次前往狮身人面像的考察。他们在黎明前出发，为的是赶上清晨的斜射光。只有这样的光才能让石头的细节凸显出来。

狮身人面像起初只是一团庞然的影。比沙更暗，比夜更密。接着光从东方来了，头部浮现出来，鼻子已不见，双眼凹陷。这座纪念碑长七十三米，高二十米，仍被埋到肩膀。石灰岩的表面显现出各种层次。风磨光之处呈灰米色，沙子层层堆积的凹处颜色更深。裂缝爬满前额，自头顶斜向太阳穴，有的宽达数指，有的几乎看不出来。石头并不均匀。较软的石灰岩层与较硬的相间，形成一道道横线，在面孔上划出纹路。脸颊上仍留有工具的痕迹，是一下下凿刀的击打塑出了那些曲线，留下规整的小面，侵蚀尚未将它们抹去。沙子沿着两侧向上堆积，形成一道缓坡，风不停地将它重塑，一粒一粒。

右眼久久地吸引着德农的注意。石灰岩被凿成凹陷，眼球被掏空，为的是造出一个已不存在的目光，上眼睑在风化之下依然可辨。曾有人想让这颗头颅注视，而且要它注视某个方向。

头朝着东方，朝着太阳升起的那个确切的点。

“这不是一尊雕像，”德农低声说，“这是……怎么说呢，一件仪器。一座山丘那么大的日晷，面孔就是晷针。您看它在春分时望向哪里。说真的，这是几何，而非虔诚。

沃尔内会跟我们大谈宽鼻子、厚嘴唇……我不下断语。但凿出这张脸的人，是懂得测量的。”

完成这处遗址的记录之后，考察队前往萨卡拉。这片墓地在沙漠中绵延数公里，是古王国的公墓，阶梯金字塔是迄今所建最古老的金字塔，六级台阶拔地而起，高六十二米。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两天。德农作画。若马尔测量。若弗鲁瓦细察浮雕，想从中读出文字没有说的东西。马斯塔巴的墙壁有些地方仍保留着彩绘。埃及蓝——工匠经烧制而成的铜钙颜料——留存在避光的凹处。男性身体用赭红，女性身体用黄色，这些绘画的惯例在数公里的墓室墙壁上不断重复。象形文字先刻成阴文，再上色，每个符号都在石头里凿深几毫米，然后才涂上颜色。抄写员沿这些竖列自右向左书写，他们的错误有时依然看得见，就在某个符号被抹掉，又略微错位地重刻。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层层叠叠的栏带展开。上方是高贵的活动，如接见、典礼、供奉；下方是田间劳作、屠宰、烘焙。若弗鲁瓦蹲在一幅渔夫拉网的壁板前，那些鱼可以按种类辨认出来。尼罗河鲈、罗非鱼、鳐鱼。

若弗鲁瓦却只看见动物。

“朱鹭。鳄鱼。河马……还有那边，狮子。鸵鸟。好几种如今在埃及已不见踪影——法老时代，它们还生活在那里。气候变了。或者是狩猎的缘故。”

他们举着火把下到竖井里。沙漠之下二十米，三十米。下行靠的是岩石上凿出的台阶，参差不齐，被数千年的往来磨得光滑。井壁随着下降而逐渐收拢，头顶的日光圆圈越来越小，最后只成了黑暗中的一个白点。空气变得浓稠。火把的火焰在地表与这些深室之间仍在流动的微弱气流里摇曳。气味混杂着硝石、矿物的尘土和一股动物的腥臊。井壁保留着开凿的痕迹，竖直的凿击，一

道道平行的条带向下延伸。开凿这些竖井要花上数月，也许数年。一队队工人在黑暗中劳作，一筐一筐地把碎石运上去。墓室并不大，至多三米乘四米，刚够放石棺和供品。低矮的顶迫使人低下头，火把的烟全积聚在那里。陶器碎片散落在地，是盗墓者留下的残渣。墙壁上布满象形文字和壁画，死者的旅程刻画在岩石上。

在萨卡拉的几次探查之间，德农回到开罗住了几天。他在科普特人街区认识几家织工作坊，经常去走动。

技术既简单又古老。一台手动织机，两片交替的综片，梭子在经线之间穿行。织机的声响充满作坊，筘打紧纬线时有节律的啪嗒声，织工踩动踏板时综片的吱嘎声。羊毛即使洗过也还带着油脂的气味，那股腥膻与靠墙一排罐子里晾着的植物染料混在一起。绞纱挂在天花板的梁上，按颜色分类。靛蓝的深蓝，茜草的胭脂红，番泻叶的黄绿。角落里，一个学徒在准备媒染浴，把明矾溶在热水里，好让颜色固着在纤维上。这道工序未曾改变。浸入媒染剂，拧干，浸入染料，用尼罗河水漂洗。与法老时代一模一样的动作。羊毛与亚麻织成几何图案，菱形、人字形、端头十字、风格化的花卉纹样。

德农曾拿一件当代科普特织物，与萨卡拉壁画的摹本作对照，那是古王国显贵们的陵墓。菱形套在圆圈里的图案完全相同，羊毛与亚麻混合的织法也一样，布幅宽度同样约六十厘米。

壁画与织物相隔四千年，而布幅的宽度却连一指也没有变过。

他买了好几件。一些科普特织物的残片，其中几块边缘还留有狩猎或捕鱼的图案。僵直的剪影，分明的侧面，埃及民间艺术那种程式化的风格，历经基督教与阿拉伯

征服而几乎原封未动。织工把它们叠好，包进了一块布里。

还有陶器。双耳罐、窄颈瓶、高足杯，用同样的尼罗河黏土仿制，在同样的窑里烧成。被问起时，制陶匠耸了耸肩。他父亲就是这样拉坯的，他父亲的父亲也是。

贝托莱从萨卡拉得到了四具人类木乃伊。

他感兴趣的不是尸体，那是医学去研究的事。他感兴趣的是防腐树脂的化学。那些浸透亚麻裹布的黑色发亮的物质，是一套有机物质的组合，他想弄清它们的成分。

回到开罗后，他把刮下的样品熔化，又把另一些溶在酒精里，分析蒸气，记录熔点。工作台上排列着各种仪器。威尼斯玻璃的蒸馏器，水银温度计，罩在钟形罩下的精密天平。他在摆成方形的四支蜡烛的光线下工作，那光稳定，在他测量时不会颤动。树脂样品按木乃伊分类，用拉丁文贴上标签，装在蜡封的瓶子里。有些是深黑色，有些是红褐色，还有些近乎透明。他用刮刀取一小块，放入坩埚，缓缓加热，同时记下材料在什么温度改变状态。树脂先软化，然后熔化，继而冒烟，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烧木头和沥青的气味。蒸气被收集到一根冷却的管子里，凝成油状的小滴。黄连木树脂、动物脂肪、蜂蜡、泡碱、犹地亚沥青。组合因木乃伊而异，逻辑却始终如一。凡是使物腐烂的东西，在其中都无法存活。

凌晨三点，他从登记册上抬起眼，望向横陈在桌上的四具尸体。

这些人死于数千年前。他们的名字或许就刻在棺木的铭文上。留下来的，是他们保存完好的躯体。

这种恒久之中有某种东西令他不安。并非形而上学的不安，贝托莱是唯物主义者，而是科学上的不安。这些防腐师解决了一个有机化学的问题，靠观察，靠试验，靠

技艺世代相传。这比任何理论早了四千多年。他削尖了鹅毛笔。

他在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埃及的防腐技术构成了一套经验化学知识，精密程度非同寻常，对其作系统研究，或许能提供有关某些保存特性的信息，而这些特性我们至今了解得还很不够。”

在萨卡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与德农一同探查了圣兽墓地的周边，据说卜塔的阿比斯神牛就安息在那里。瓦砾中可见花岗岩碎块。他们在一块黑色花岗岩的碎片前停了下来。

德农写下了这几行字。“古时的盗墓者留下了这些石块。我们与他们相似，正在于此。他们拿走他们以为是财宝的东西，我们拿走我们以为是知识的东西。两千年后，如果有人提着灯笼下到这里，他会看见那些盖子仍然是破裂的。他会像我此刻一样自问，在一条幽暗的甬道里，盗墓者与学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

脚边，散落在尘土里的碎片中，有一块上头仍刻着两个阴刻的象形符号，一只鸟，一道折线。他捡起那块碎片，塞进了口袋。

那天夜里，德农正走回他们过夜的马斯塔巴时，萨卡拉的市集仍在黑暗中继续。只有两盏灯笼，放在摊位之间的沙地上。邻近村庄的费拉蹲在席子后面等候。士兵们三三两两地来，没带武器。他们掂量，讨价还价，揣着用上衣裹好的东西离去。夜里的空气在白天的炎热之后显得清凉。沙子还留着一点暖意，但沙漠的风已经带来深夜的寒气。交谈都压低了声音，讨价还价用的是蹩脚的阿拉伯语，或者干脆打手势。一个士兵掂着一只圣甲虫，凑近灯笼，查看底面刻的象形文字。另一个在为一

件釉砂护身符议价，那是一尊小小的绿松石色阿努比斯像，长着胡狼的头。

贝托莱也在那里，坐在一张从亚历山大一路带来的折叠椅上。他面前是一张小小的野战桌，上面摊着委员会的表格，哈桑拿着灯，把物件一件件递给他看。贝托莱逐一检视，在登记册上记下编号、拉丁文描述、在古迹中的位置和保存状况。今晚共六件，其中三枚王室圣甲虫，一块埃及无花果木的书吏调色板，一尊花岗岩小像，一只连盖的雪花石膏卡诺卜罐。他写下“颈部有黑色树脂的痕迹。”随后他停下笔，抬起头望向哈桑。

“这只罐子里装的是什么，盖子是胡狼的那只？”

“胃。”哈桑说。

“啊。这个我也记下来。”

贝托莱曾要萨卡拉的人给他弄些动物木乃伊来。1799 年 2 月初，在开罗，费拉们给他送来了六具。两只圣朱鹭，两只猫，一条幼鳄，一只鼬鼠。他把它们安置在研究院分给他当实验室的大房间里。

他分析了亚麻裹布，布上浸着一种褐色物质，经鉴定是沥青掺植物树脂。体腔填充物也取了样，有泡碱、岩盐、矿物粉末。最让他费神的是泡碱。含水碳酸钠，天然存在于开罗以西沙漠的湖泊中。一月间，他曾与安德烈奥西将军去那里做过五天的考察。那是纳特龙湖。一片片白色的湖滨，湖边天然结晶出这种碱性粉末，埃及人采集这种粉末，用来保存逝者的遗体。

在分析泡碱溶解于湖中咸水的过程时，他观察到了意想不到的现象。海盐与碳酸钙之间的反应，可以随温度和浓度而逆转。当时的化学家认为反应总是朝一个方向进行，较强的酸驱逐较弱的酸。贝托莱开始意识到这是错的，那其实是平衡。

巴黎将收到这些笔记。还需要四年，以及 1803 年的*《化学静力学论》*，才能从中得出完整的理论。

至于动物木乃伊，则向贝托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这些做成木乃伊的朱鹭，和今天的朱鹭一模一样，”若弗鲁瓦说，“您还记得我们在尼罗河边说过的话吗？说埃及人崇拜它们，是因为他们观察自然？瞧。三千年间毫无变化。”

“应该说是完全相同。”贝托莱纠正道。

“居维叶就是这么说的。物种自创世以来就是固定的。木乃伊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

“那拉马克呢？”

“拉马克说，三千年太短，看不出什么变化来，需要的是无比漫长的时间。”

贝托莱双手捧起一具朱鹭木乃伊。那只鸟身躯僵直，保存得完好无损，透过裹尸布条，羽毛依然依稀可辨。

“两个人谁也无法证明这一点，”贝托莱一边放下木乃伊一边说，“那得活得太久才行。”

11 月那次逗留期间，他们在萨卡拉整整待了两夜，睡在一座马斯塔巴的废墟里，以便天一亮就能守在现场。阶梯金字塔矗立在这片肃穆的葬地中央。

“这座金字塔比吉萨的那几座早了一个世纪，”若马尔说，他曾尽可能地把学者们手头关于王朝年表的零星资料相互印证。“大致如此。在这里，他们还在寻找形制。在吉萨，他们找到了。”

层层叠起的台阶有几分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山岳台，仿佛两个文明各自独立地走到了同一个念头，层层堆叠，以升向天空。

德农把第二夜用来抄录一座高官马斯塔巴里的场景。这些浮雕再现了日常生活的种种活动——捕鱼、狩猎、农事、屠宰、酿造啤酒——其精确既有益于委员会的博物学家，也有益于艺术家。

从萨卡拉回开罗的路上，德农在黄昏时绕道去了尼罗河畔。这个钟点的光线与别时不同，橙红而浓稠，在石头上几乎是厚厚的一层。他坐在水边一块石灰岩上，试图逆光描绘河流。这很难。光线变得太快了。

若马尔在他身旁坐下，等他画完。德农作画时，没人同他说话。

“我又想起那个世纪，”德农收起铅笔后，若马尔说。“一边是尝试，一边是完美。一百年。怎么能进步得这样快？”

“我不确定问题是不是出在速度上。我想，埃及人对时间有另一种想法。对我们来说，一个世纪很长；对他们来说，那也许只是学会一样东西所需的时间。”

他们在黑暗中返回开罗，由宣礼塔的灯火引路。沙漠里的野狗在远处吠叫。科普特区的某条小巷深处，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时辰。

VIII - 科学论争

11 月 16 日的会议上，蒙日与傅里叶针锋相对。蒙日要的是体积和角度，傅里叶要的是背景和含义。波拿巴任研究院副院长，出席了会议，并裁决说两人都有道理，等于没有裁决。

“真正的科学，朋友们，就是测量，”蒙日双手平放在桌上，开场说道，“一座金字塔的尺寸，它的体积，它的比

例，这才是美的！围绕它的那些神话……就留给诗人吧。描述与意义是两门学问。我们来此是为了前一门。”

“金字塔不仅仅是等待计算的体积，蒙日，”傅里叶眼睛没有离开手中的稿纸，答道，“它们是王家陵墓，是对永生的信仰之举。如果您只留下尺寸，那您描述的是箱子，而不是箱中之物。而且您有可能……因为数过了，就以为自己理解了。”

波拿巴抬起手。

“两位都有道理，”波拿巴轮流看着蒙日和傅里叶说，“这部著作将兼容二者。蒙日的测量。至于意义，傅里叶会找到的。”

同一次会议上，贝托莱宣读了第一篇关于埃及沙漠泡碱化学的论文。他分析了从开罗商人那里买来的样品，确定了它们的准确成分。

“泡碱？不过是多种盐的混合物罢了。碳酸盐、碳酸氢盐、氯化钠。在这种粉末里放七十天，水分就被吸尽，尸体干燥而不腐烂。极其简单，极其有效。恐怕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随后，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报告了他对活朱鹭和朱鹭木乃伊的观察。这些木乃伊成千上万地出土于萨卡拉附近的圣兽墓地。

“只有一种朱鹭。我把木乃伊同活的鸟作了比较。那就是同一种黑白相间的圣朱鹭，我们今天在尼罗河岸边仍能看到。三千年过去，没有一处特征变了。如果物种会变，我们也不会在这样的尺度上看到。”

随后是让-约瑟夫·马塞尔的报告，他是东方学家，也是开罗国家印刷所的所长，报告谈的是阿拉伯文字印刷的进

展。《埃及信使报》如今用法文印行，只有公告用阿拉伯文印刷。

“我们已有能力以令人满意的印刷质量排印古典阿拉伯文，”他宣布，“公告、法令、告示，民众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读到我们。”

傅里叶随后发言，介绍了一项关于埃及沙漠气温分布的研究，这个题目源于他在行军途中的观察。他对非均匀介质中热流的分析，预示了他日后在法国开展的热学研究。大家听得格外专注，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曾亲身承受过这一现象。

“沙漠的热……不只是空气的温度，”傅里叶解释道，“那是热流。是地面、空气与暴露其中的物体之间的交换。我相信——不，我希望——总有一天人们能够预测它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传播。”

波拿巴本人关心的与其说是热，不如说是这样一幅景象，出身背景迥然不同的人——数学家、化学家、博物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竟能围绕同一个对象，也就是埃及，彼此交谈。

“这对我们了解古埃及人有什么帮助？”他问。

“直接来说，没有，”傅里叶承认。他停顿片刻，寻找下文。“但他们的环境，有。它是如何运转的。要弄明白他们为什么以某种方式建造房屋，按某些轴线安置神庙，把陵墓挖到某种深度，就必须理解他们所承受的热力条件。”

波拿巴向发言者们表示祝贺，并催促他们继续深入。

“太好了，”他向全场说道，“很快就是上埃及。底比斯，那些神庙。德农将开路。”

傅里叶在哈桑·卡希夫宫的走廊里拦住了德农，腋下夹着一叠测绘稿，是委员会自抵达开罗以来绘制的测绘稿。大金字塔的测量图、狮身人面像的平面图、萨卡拉陵墓的剖面图，共八十三张。

“这些测绘稿，”傅里叶说，“您打算带走吗？”

“这正是这次远征的目的，”德农说。“*《埃及志》*不会在这里完成。”

“我说的是实物。您在萨卡拉集市上买的那些小雕像，行李里的那些护身符。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理解埃及，不是为了把它的遗存搬空。”

德农看着傅里叶手里那叠测绘稿。尺寸，平面图，角度，这一切都会留在此地，留在石头之中，任何在他们之后前来测量的人都可以得到。而他在萨卡拉集市上买下的那尊彩绘木雕像，双臂交叉于胸前，是奥西里斯的姿势，三十年后，谁也别想在这里再找到它。它会在巴黎，或者就此失落。

“我们两人的区别就在这里，傅里叶，您认为理解就足够了。我却认为有些东西必须被看见才能被理解，而要被看见，它们就必须远行。”

傅里叶收回那叠稿子，朝自己的房间走去，那间房在二楼走廊上，隔着两扇门。德农独自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他很晚才躺下，睡在起义以来他在宫中所住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以为收在行李里的那尊彩绘木质*沙布提俑*，竟立在工作台上，摆在显眼处，脸朝着他。想必是傅里叶夜里进来过。方程出不来的时候，他习惯在不合常理的钟点在宫中走动。可是在地上，就在桌子前面，有一粒沙子。只有一粒，在抛光的地砖上清晰可见。仿佛傅里叶想让他明白，这沙子来自某个地方。

又或许，那不过就是一粒沙子。对傅里叶这个人，你永远分不清是意图在先，还是举动在先，抑或恰好相反。那尊*沙布提俑*在他桌上放了一整天。

1798 年 11 月的这次会议，在正式议程之外，还迎来了旺蒂尔·德·帕拉迪的一场非正式报告。他是远征军的首席译员，说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流利得如同母语者，白天为波拿巴翻译，夜里编写一部阿拉伯语-法语词典，而这部词典他永远也无法完成。他将于 1799 年 5 月死于叙利亚圣让-达克的痢疾。

他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发了言。

“我想向研究院提出一点观察。说是一点看法，更确切些。我们来埃及将近五个月了，有一件事，我渐渐有所察觉。今天埃及人所说的阿拉伯语，与《古兰经》的古典阿拉伯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不是方言之别，而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彼此的距离，就像西塞罗的拉丁语与莫里哀的法语。三角洲的一个费拉听不懂他所诵读的古兰经文。他只是照着音念诵，并不领会其意。”

“这意味着什么？”蒙日问。

“这意味着，埃及的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是……怎么说呢……一种宗教，信徒并不理解原初形式的圣典。信仰是凭乌里玛的权威、口头传统和仪式传承下来的，而不是通过直接阅读经文。这与路德之前天主教会里的拉丁语相去不远。”

波拿巴一直听着，没有插话，这时提了一个问题。

“那么乌里玛本人，他们懂古典文本吗？”

“最博学的人懂。其余的人也只是背诵。这是一条传承的链条，每一环传下去的是自己所接受的东西，而不一定是自己所理解的东西。”

德农把这番观察记进了笔记本。这番话与他在起义之后于古兰经学校的小巷里所见的情景相印证。孩子们念诵着一些句子，多半仍不知其义，然而那声音与节奏在他们身上已经是一种知识。他想到了自己的画，金字塔是在读懂之前就临摹下来的，狮身人面像是在黎明时画下的，那时他还没有量出它的意义。他也是从线条开始的。他在旺蒂尔那句话下划了两道线。

“换句话说，”傅里叶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人们先传下来，靠背诵。意义随后才来。或者永远不来。这与我们对象形文字所做的事相去不远，不是吗？我们抄录着自己并不理解的符号……我们之后的人，或许会读懂它们。”

“只有一点不同，”旺蒂尔·德·帕拉迪说，“象形文字已经没有活着的使用者了。古典阿拉伯语还有。在乌里玛与费拉之间，在文本与仪式之间，这门语言存活着，以不同于它被创造时的方式。”他收拢了自己的稿页。

那天晚上，会议结束得很晚。灯已烧得很低。学者们走进研究院的庭院，十一月的空气终于有了凉意，这是他们抵达埃及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寒冷。德农在院中停了一会儿，抬眼望去。开罗上空的星辰。与六个月前土伦上空的是同一批，只是北极星在地平线上降低了。

会后，波拿巴与贝托莱一同离开研究院。他们在宫中花园里走了一阵，碎石在靴下沙沙作响。波拿巴先开了口。

“蒙日有一次对我说，科学追求的是真，与有用与否无关。您相信这话吗？”

贝托莱思索起来。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里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我认为这两者的界限，没有他说的那么分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真实的。若马尔的测量，木乃伊的化学分析，德农的素描。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也是有用的，对法国

有用，对欧洲认识埃及有用，对您在政治上也有用。真与用并不相互排斥，它们结伴而行，很少走向同一个方向，但终究是结伴而行。”他迟疑了一下，又补充道：

“我唯一不肯说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无害。这不是事实，而蒙日和我一样清楚。”

波拿巴没有马上回答。

“傅里叶今晚对我说，他关于方程的研究没有任何眼前的军事用途。他似乎还为此自豪。”

“他说得对。二十年后，他的研究会有他今天想象不到的用途。科学走在前面。走在前面多远……事先永远无法知道。”

“这么说，是一名斥候。他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哪一支军队勘察地形。”

“正是如此。”

他们在庭院的水池边停下脚步。水纹丝不动。

“继续工作吧，”波拿巴说，“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会比这次远征活得更久。这是我眼下唯一的把握。”

贝托莱回到实验室，继续他的分析。

那天晚上回去之前，他对波拿巴说过一句话。语调几乎毫无起伏，像化学家在谈论沉淀物的颜色。

“1796 年在意大利，运往卢浮宫的东西是我们挑选的。蒙日挑，我确认。我们有时间，有清单，有专员。在这里，这些统统没有。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定是仓促的。装进箱子里的，就是能走的；其余的，就留下。不必再对自己说别的。”

1796 年在意大利，带走东西的是法国。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还会是法国。贝托莱冲洗了一支试管，又冲洗了一支。

凌晨三点，德农重新点亮灯，又拿起了他的笔记本。

书页缓缓翻过，他并没有真正在重读。画一幅幅掠过。土伦港湾里舰队的风帆，“朱诺号”甲板上望见的瓦莱塔港，亚历山大的庞培柱，沙漠中士兵的背影，暮色中的金字塔，远远望去。

他还有另一份清单，从未写下。那是他做过却没有记录的事。他画下了无法带走的古迹，看见士兵们一声不吭地把圣甲虫塞进口袋，看见一个费拉望着自己的沙布提俑被带走，并宁可不去记下那人说了什么。这份清单比那二百四十三幅画还要长，没有尽头。

他停在了旅程中的第一幅速写上。

画的是波拿巴。右侧面像，在土伦码头上被晨光照亮，那是登船前的几分钟。他画得很快，将军浑然不觉。寥寥十来笔炭条。瘦削的侧脸，高高的前额，下巴向前探出，那姿态像是一个正望着尚未存在之物的人。

他拿过一张空白的纸，凭记忆画波拿巴。画的是八月中旬在开罗、阿布基尔的消息传来次日他所见到的样子。同样的侧面，同样的基本轮廓。但那已不是同一个人。他用炭笔寻找差别，用拇指擦去，重新再画。

不是皱纹。三个月不会让一个二十九岁的人变老。也不是消瘦，波拿巴向来就瘦。也许是在脖颈的紧绷里，或是下颌咬紧的方式里。土伦的那个人望着某样尚不存在的东西，阿布基尔之后的这个人望着某样他已经失去的东西。

德农把两张纸并排放在工作台上。

两幅画很相似。一个匆匆的观察者看不出差别。同样的侧面，同样的姿态，同样是画家的手笔。但一幅接着一幅看，它们说的已经不是同一件事了。

这是自土伦以来，他第一次在波拿巴不在场时画他。此前，他画的将军速写都是文献。统帅的姿态，权威的手势，在转瞬即逝之前必须定格的历史场景。这幅夜间的速写却是另一回事。一幅没有取得模特同意、没有任何见证的肖像，取自记忆，而非眼前之景。

他把两张纸先后夹进同一本笔记本里。先是土伦，然后是阿布基尔。

这些笔记本里所装的东西，值得什么吗？这个问题现在在他看来，不像起初那样不言自明。在土伦登上“朱诺号”时，他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何在此。为了记录一次历史性的远征，为了赶在其他欧洲人之前看见埃及，为了给法国带回一个尚属未知的世界的图像。那个计划简单而清楚。

六个月后，他已不再确定。他见过沙漠里士兵们的困苦，见过亚历山大的居民望着法军时那种认命的神情，那是见过太多军队因而不再动容的人的神情；见过开罗的起义和对它的镇压。他以对待金字塔与浮雕同样的专注，把这一切都画了下来。他的这些画，难道不是，纵然违背他的本意，既是一场占领的物证，又是一次发现的档案吗？

那一夜，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的*《上下埃及游记》*日后也不会解决它。

他合上笔记本，吹灭灯，躺进黑暗里。窗外开罗上空的星辰，与希罗多德在尼罗河畔所见的是同一批，与法老时代的天文学家用来为纪念建筑定向的是同一批，与法国水手们自土伦出海横渡时所观测的也是同一批。这让

他稍感安慰。埃及的天空以同样的漠然照亮金字塔，也照亮营地。德农闭上了眼睛。明天他还要作画。

第二章：溯尼罗河而上

I - 丹德拉

1798 年 12 月 16 日晚，德塞的师离开贝尼·苏韦夫，向南进发。三千名步兵，两百名骑兵，以及有待征服的整个上埃及。德农于 12 月初从开罗动身去与他们会合，也在随行之列，带着他的笔记本。

12 月初，德塞取道首都，而后返回贝尼·苏韦夫，波拿巴接见了他。

“两项使命。消灭穆拉德贝伊。向学者们开放上埃及。要把他们当作合作者对待。他们带回来的东西，与您的胜利同样重要。”

德塞三十岁，头脑务实，对古物没有特别的嗜好。他听得懂命令，这就够了。

“我会像保护我的士兵一样保护这些人。不过穆拉德贝伊不会给我们喘息之机，请您提醒他们。要持续几个月，也许一直追到阿斯旺。学者们得忍受。”

德农离开开罗去与师会合之前，学院那次会议过去几天后，波拿巴曾把他留了片刻。他打开行军桌的抽屉，取出一份折起的文件，就是土伦之前给德农看过的那份四页清单，此后又有补充。

“这就是必须回到法国的东西，是法国理应从这次远征带回的东西。”

德农浏览了开头几行。一个个类别，一条条描述。可搬运的方尖碑，品质非凡的浮雕残块，有记载的纸莎草文书，王室圣甲虫，晚期埃及的青铜器，可辨认身份的显贵木乃伊。每一类都附有估价说明和去处，卢浮宫、国家图书馆、法兰西研究院。

“我们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做的，”波拿巴接着说，“蒙日和贝托莱熟悉这套办法。他们带着表格带回来的东西，归卢浮宫。士兵们塞进背包的东西，我无法阻止。您用笔记本记录下来的，则以另一种形式留在法国。三个层次，三种不同的正当性。”

“如果这些层次混在一起呢？”

“它们总是会混在一起。所以第一个层次必须无可指摘。如果委员会工作严谨，其余的相比之下就变得可以容忍。这是文艺复兴以来一切国家征集的逻辑。法国不劫掠，它挑选、记录、保存。劫掠的是士兵。这个区别是真实的，哪怕令人不安。”

“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呢？”

“只要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就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如果我们输了，这场争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德农把清单收进挎包。一道挑选的命令，而非劫掠的命令。他本希望这点区别便已足够。波拿巴的时间有限，已经把办公室的门推开等着，于是德农走了出去，没有说出他本想说的话。

出发当晚，队伍绵延一里格，沿着尼罗河西岸踏上南去的路。这个钟点空气已经寒冷，是一种干燥无雾的冷。队列扬起的尘土远远可见。炮兵沿着耕地的边缘前进。骑兵的马匹觉出了启程，嘶鸣不已。费拉们站在民居的平屋顶上，一动不动地看着队伍经过。

德农与德塞并骑而行。

“波科克，诺登……您读过他们吗，将军？不过是些大致的描述，不准确的图画。这一次，我们要丈量。”

“您的热情我很欣赏。不过您想离开队伍的时候，请先告诉我。穆拉德贝伊还没有死心。”

德农叹了口气。

“明白，将军。我会画得快些。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接下来的几天，尽管是冬天，行军才过第二个钟头，热气就升了上来。沿河的绿带只有几百米宽，再往外，沙漠便开始了，来得突然，又彻底。士兵们默默行进，手里攥着水壶。德农边走边画——飞快的速写，村庄的轮廓，一棵棕榈，一道石灰岩崖壁的侧影——不停步，也不乱了步伐。马穆鲁克不断袭扰，又随即消失，从不打一场决定性的会战。再往南，在古称利科波利斯的艾斯尤特，他考察了开凿在俯瞰全城的崖壁中的陵墓，墓壁上布满象形文字和纹饰，那份精细是他在别处从未见过的。

色彩依然鲜明。赭红，埃及熔块的蓝，孔雀石的绿，雌黄的黄。沙漠把它们周围的空气烘得干燥。他想起了巴黎的那些画，被清漆熏黑，被几个世纪的潮气磨灭了光彩。

德塞允许他停留几个钟头，再继续行军，他便在这段时间里画下了其中好几幅场景。他的速写很快。他已学会在十分钟内抓住要义，躯体的僵直，以及他们所做之事的生动。

就这样，在队伍扎营的时候，他从一座岩窟墓走到另一座。

歇脚时他也画，晚上在帐篷里，借着火把的光，把笔记本搁在膝头继续画。军官们起初把他当作累赘。

“您这位学者比我的新兵还经得住，”有一天，德塞指着部队休整时坐在一块岩石上的德农，对一名副官说。

“那是因为他有事可做，”副官答道。

1799 年 1 月 25 日，德农是最早见到丹德拉的学者之一，他把它写作廷蒂拉。这座神庙，他将认定为伊西斯神庙，矗立在沙漠边缘、利比亚山脉脚下，在上埃及干燥的空气里，远远便能望见它庞大的身影。

“您看，”德农对贝利亚尔说，后者已在他身旁勒住了马。越过一座半埋在瓦砾下的巨大门楼，神庙显现出来。

德塞一个钟头前还不耐烦地回绝过休整的请求，此刻一言不发。没有人下令停步。军官和士兵们自己离开了大路。队伍停留到傍晚。营地设在邻近的丹德拉村，离神庙四分之三里格。费拉们站在自家门槛上望着，不上前来。他们见过别的队伍经过。这一支带着的却是些拿测量仪器和笔记本的人，这并不更叫人放心。

德农第一个走了进去。在门槛处，他数出二十四根柱子，高约十五米，柱头上伊西斯的面孔——这是他后来给它起的名字——朝着四个方向。他取出笔记本，又合上了。从哪里开始？在欧洲的城市里，他一向知道。面对金字塔，面对孤零零的石柱，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出现。而这里，整个大厅处在同一种逻辑之中，任何入手点都会是武断的。最后，他着手画最近的那根柱子。

“了不起，”贝利亚尔在他身后低声说，“这些衣褶……”

德农一直画到最后一缕天光。参谋部的地理工程师若马尔，在这几个钟头许可的范围内丈量。他记下尺寸、角度、朝向。每根柱子十五米，接缝细得连一片刀刃都勉强插得进去。天花板压在柱子上。四壁满是浮雕。在大厅的另一头，德农的双手已被炭笔染得乌黑。

“没有我们这些现代工具，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若马尔低声问。

“靠时间，靠人力，靠一种能数十年如一日持续用力的组织，”贝利亚尔答道，“这座神庙花了好几代人才建成。他们把这项工程父子相传，如同一份神圣的遗产。”

“还有星辰，他们对星辰的了解，比我们至今所了解的还要深，”若马尔接着说，一边指着被烟熏黑的天花板，上面隐约可辨天象的图形，“您看。这个穹顶就是古埃及夜空的星图。”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若马尔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记进他的测绘记录。晚上，他在帐篷里把它写进了自己的私人日记。

先头营的三名士兵，整个下午都泡在神庙的侧厅里。他们并不当值。回来时，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尊蓝色釉砂小像。一只蹲坐的猫，耳朵竖立，眼睛镶着黑色玻璃。他把它拿给同伴们看，他们笑了起来。

若马尔看着他们走过。那只釉砂猫已有两三千年。它是作为还愿的供品，由一位名字没有流传下来的工匠放进神庙的，为的是一桩人们连内容都已遗忘的祈祷。不出三年，它就会在马赛。这条链条很短，不留任何痕迹。若马尔想到了重力，它总是让轻的东西向下坠落。而在这里，下，就是北方。

同一天，在神庙的大庭院里，科学与艺术委员会中随师行动的数学家瓦瑟公民正在忙碌。

他下午依照波拿巴清单上的类别挑出了六件东西。两只圣甲虫，一件金护身符，一尊塞赫迈特小像，都符合清单上的标准。但有两件与众不同。一件是埃及无花果木的书吏调色板，芦苇笔还插在各自的芦苇套里；木材几乎从来留存不下来，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珍品。另一件是雪花石膏的卡诺卜罐，隼首盖子完好无损，代表肠道

的守护神凯布塞努夫。六件东西在石头上一字排开，编了号，贴了标签。

若马尔从庭院入口走近。瓦瑟在日光下填写他的表格，不慌不忙，也不遮掩。他与士兵们的全部区别，就在这张纸上。

“瓦瑟公民，”若马尔说，“这几件东西……堪称一流。”

“确实。这块调色板没有已知的同类。芦苇笔完好无损。埃及无花果木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它被亚麻布包裹着，那块布是我在神龛一个侧间里发现的。两千五百年，在理想的条件下保存。”

他没有抬眼，继续写着。那是科学家的笔迹，精确，简省，毫无修饰。

“卡诺卜罐会引起化学家们的兴趣，他们可以用它分析木乃伊防腐用的树脂，”他接着说，“我从内层的树脂上取了一块碎片。这份取样的编号，您可以在委员会登记册上找到，参见一百一十四-B。”

他把第六个编号记在表格上，签了名，撕下存根，递给若马尔。

“委员会目录，正式征集部分。如果您想为自己所在部门的档案留一份副本的话。”

若马尔接过那张纸。形式无可挑剔。他把它对折，塞进了自己的挎包。

村里有个人来看若马尔测量。委员会在开罗雇来的译员哈桑留在一旁。片刻之后，那人走了。

他在日落前又来了，靠着一根柱子坐下，看着若马尔工作了一个钟头。随后他离开，不多时又带着一只盛满清凉水的小陶罐出现。他把它放在若马尔的仪器旁边。

若马尔喝了。水很凉，带着一点矿物质的味道。他用阿拉伯语说了谢谢，那是他学会的寥寥几个词之一。通过哈桑，他们交谈了几句。

那人知道这些柱子的名字。不是学者们赋予此地神祇的那些名字——伊西斯、奥西里斯、荷鲁斯——而是世代父传子的阿拉伯语名字。东北角的那根柱子，村里叫它“涨水时流血的柱子”，因为石灰岩上有一道裂缝，尼罗河涨水时，有时会渗出含铁的红色水流。中央那根叫“声音之柱”，因为用张开的手掌在某个高度拍击它，它会发出一种低沉的声响，传遍整座大厅。

若马尔把这两个名字记了下来。他知道它们不会出现在*《埃及志》*里。它们没有可以测量的价值。但它们说出了他自己的测量所说不出的东西，也就是这座神庙长久以来一直栖居在村子的记忆里。它不是一处废墟。它是一位邻居。

四个月后，也就是五月，德农还要回到丹德拉。那时他将离开师部驻扎的盖纳，带着三十人的护卫队、一支蜡烛和他的笔记本。他终于想画一画上层礼拜堂里的黄道带，在一月的暮色里，他只是匆匆瞥见过。

奥西里斯礼拜堂在神庙的屋顶上，是一间小厅，要由墙壁厚度中开凿的楼梯上去。天花板很低。蜡烛投下的橙黄光亮远远不够。他躺在冰凉的石头上。头顶上，刻在砂岩里的，是天空的星图，一个圆盘，嵌刻在边长两米半的石块中。中央是拱极星座。大熊座化作一条公牛的前腿，还有一位手持鱼叉的河马女神。圆周上是希腊黄道十二宫，与埃及的图像交织在一起，白羊，金牛，还有宝瓶，被表现为泛滥之神哈比，手持两只瓶子，尼罗河自瓶中流出。

这块天花板无法原样搬走。数吨重的砂岩嵌在穹顶里。动身前，在盖纳，德农已把这个难题提给了若马尔，他是参谋部里最富创造力的头脑。若马尔一月间看黄道带，用的是技师而非艺术家的眼光。

“可以办到，”他一边展开德农的草图一边说，“但不能用我们现有的东西。需要淬火钢齿的锯子，螺旋千斤顶，生石灰，一座二十米高的起重木架。至少六周的工期，要二十个人。还要一艘专门改装的船来运这块石头。几吨重，普通的船舱不够用。”

“结果值得这番努力吗？”

若马尔又看了看草图，目光沿着圆盘，从一个星座移到另一个星座。

“这是我所见过的、对古代天空最完整的表现。是的，值得付出这番努力。但不是现在。也许三十年后，要是有人带着器材和时间回来的话。”

德农把这次谈话记入了一份呈交科学参谋部的备忘录。这是第一份提到有可能取下丹德拉黄道带的正式文件。这份备忘录将被送往开罗，在一只箱子里沉睡，等待军队所没有的条件。

他仰面躺着画了两个钟头。蜡烛熄了，他又点了一支。等他下来的时候，夜色已降，士兵们已不耐烦地等了一个钟头。

“您拿到想要的东西了吗？”一名少尉问他。

“一幅初稿。恐怕有些地方不准。要做真正的测绘，得靠别人的手。”

德农向科学参谋部指出，有必要派工程师来补全他的工作。两位年轻的综合理工学院出身者，若卢瓦和德维利

耶，隶属总工程师吉拉尔的使团，其中前者此时已在上埃及，他们将用精密仪器完成测绘。

但这才只是第一个晚上。这一天，1月25日，若马尔要解决一个征用口粮的问题。他去找军士长奥贝尔，此人掌管先头营的军需。他在离主营地稍远的一顶帐篷里找到了他，奥贝尔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前有一盏灯和一本册子。

奥贝尔拿着一份分成三栏的清单，栏目为物品，连队，士兵。行距很密。若马尔站在原地，不动声色地读着，并记住了这几行。“蓝石小像，第二连，拉辛。浮雕残块，第三连，迪普莱西。釉砂圣甲虫，第一连，马兰。彩绘陶罐，第四连，勒菲弗。”清单上有八十多行。

奥贝尔抬起头来。他似乎并不意外自己被人看着。

“学者公民，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额外口粮……是给测量杂役用的。不急。”

若马尔没有问起那份清单。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一份非正式的清点，没有谁下令，也没有谁禁止，由一名士官记录在案，他察觉自己营里有东西在流转，便决意弄个明白，以防万一。如果日后有人追问，奥贝尔答得上来。而如果没有人问——这更有可能——这份清单就留在他的册子里。

他三言两语解决了口粮的事，转身走了。

那天夜里，若马尔没有整理他的测量数据，而是着手做另一件事。

他从自己确知的事实开始。军士长奥贝尔的清单上，仅第二连一个连，一天之内就有二十三件物品。每个营有四个连，仅先头营的清单就有八十多行。两个步兵营轮

流驻留在这处神庙里。再加上军官们，他们的取法不同。更讲挑选，数量较少，但件件价值更高。再加上瓦瑟的正式征集。六件有记录的，或许还有别的没有正式记录的。

他做了一个估算。保守的假设，每个连在停留的这个下午取走二十件。四个连。两个营。这样，仅这一座神庙，至少就是一百六十件。再加上向居民的购买，以及军官们悄悄收集的，就接近两百件了。

两百件东西离开丹德拉。他端详着这个数字，又望向神庙。它在明朗的夜色中清晰可见，离营地步行有四十五分钟的路程。神庙无比庞大，这两百件不过是它仍藏之物的一小部分。但正确的算法，是在多少座神庙里停留了多少次，再乘以两百。

丹德拉与阿斯旺之间，至少有十二处重要遗址。他把这几行字写在页底。“全程估计总数，数量级两千五百件。区间下限。无法核实。”

随后，他停在了自己刚写下的字上。两千五百。在纸页上，这个数字没有分量。可它指的却是两千五百件东西，它们已在埃及的神庙或陵墓里待了许多世纪，半年之内便将不复在此。

装骡子的时候，他用目光寻找那个手里拿着釉砂猫的士兵。在成千上万张面孔中，他没有找到。那个人是存在的。那只猫是存在的。就在这两千五百之中的某处。

离开丹德拉之前，若马尔去找了瓦瑟。

瓦瑟正在监督人钉他的箱子。他停了下来，指间还夹着一枚钉子。

“瓦瑟公民。我做了个估算。关于取走物品的数量，这座神庙的，以及接下来整个远征的。”

他把笔记本翻到计算的那一页递过去。瓦瑟读了。他花时间核对了各项假设，在心里把算术重做了一遍。

“您的低位区间是合理的，”他终于说，“军官那一块略有低估。”

“您不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吗？”

瓦瑟把笔记本还给了他。

“我觉得这个数字准确，或者接近实情。对谁有问题？对委员会？没有，我们的征集都有记录。对军队？那要由德塞来判断。对这座神庙？无疑是的。但希腊人在这里取过，罗马人也取过。我们不是第一批，而埃及依然在这里。”

“这不是理由。”

“是的，这不是理由。但这是一种背景。而在这种背景下，需要确定的是，我们所做的，也就是委员会所做的，是否站得住脚。我认为站得住。至于其他，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

“您是数学家。数学家不会说一个计算站得住脚，他只会说它准不准确。”

“我们的账是准确的，”瓦瑟答道，已经回到了他的箱子旁，“档案，描述，给卢浮宫的物品。”

“这是波拿巴要求的。换了我，我不会这样要求。”

次日黎明，德塞示意动身。若马尔收起测量仪器。德农久久地回望着神庙。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和平时期重返这个国家，”若马尔说，“光是这座神庙，就值得研究半年。”

若马尔不会再回到这里。德农也要到五月才会路过，不过短短几天。他们的画会留下。

通往底比斯的路沿着尼罗河延伸了两天。晚上在营地里，军官们开始谈论他们即将看到的神庙。卡尔纳克。卢克索。这些名字在一堆篝火与另一堆篝火之间传递，那是人们听了一辈子的名字。

II - 底比斯

1月27日傍晚，德塞的师来到底比斯废墟前。军队自行停了下来。这天晚上，德农只来得及在马背上作画。其余的要等到天亮。

若马尔走下河岸，便再没有挪动，目光落在尼罗河对岸落日余晖中黝黑的塔门上。

次日，他们乘征用的小船渡过尼罗河，见到了卡尔纳克，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阿蒙-拉神庙的多柱厅有一百三十四根巨柱，居中的十二根高达二十一米。若马尔跨过门槛，怔在原地好几分钟。这座大厅占地约五千二百平方米，是古代世界最大的有顶空间之一。

“我永远画不出这个，”德农低声说，“谁也画不出。”

在卡尔纳克度过第一天之后的那个夜里，若马尔提着灯笼坐在神庙的庭院里，开始整理那些数据。这座大厅并非只为一位法老的荣耀而造得如此宏大。它得容纳一场游行、一群人、一场仪式。每一处尺寸都对应着声学、光照和礼仪上的某种要求。

他的笔记只有寥寥数语。“这座大厅比例的规整表明，当时存在一套历经数代传承、精确无误的度量体系。大厅的长度约为宽度的两倍。中央各柱之间的间距等于柱身的直径。这些比例绝非偶然。”

外面，沙漠的某处，一只胡狼在嚎叫。柱群上方的星辰格外明亮。

随后，就在他转动经纬仪、测记一颗参照星的方位角时，他领悟了一件他原本无意去领悟的事。这种领悟并非在一番论证之后才出现。它来得很突然，近乎眩晕，就像一个冗长的计算得出了一个整数，人还没有验算，便已知道它是对的。

神庙的主轴线——连接入口与最深处圣殿的那条轴线——朝向东偏南二十六度。他把计算核对了两遍。二十六度。这个数字从早晨起就在他的测绘记录里，被他不假思索地记下，与别的数据无异。可此刻，在黑暗中，头顶是满天星辰，他明白了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那是底比斯纬度上冬至日日出的方位角。

他一动不动，好几秒钟。据他所知，还没有人表述过这一结果，他想先确认自己没有弄错，再落笔写下。

这座神庙同时也是一架天文仪器，其朝向经过设定，使一年中白昼最短的那天清晨，初升太阳的光线能够进入圣殿，沿着轴线一路推进，直抵宏大的多柱厅。

他在日记里急切地写下一篇长达数页的笔记，详述计算、测量与结论。他打算由第一班邮差把它寄往开罗，交给傅里叶。傅里叶是委员会里最严谨的数学家，他有能力验证。一个月后回信到了，只有寥寥两行。“您的计算无误。请记下，以备出版。”

凌晨两点，若马尔回到营地，距他离开帐篷已过去五个小时。他卷起笔记本的纸页时，双手微微发颤，却不是因为寒冷。通常，他的发现都是印证某个假说。而这一夜，生平第一次，假说是从测量本身中生出来的，他并未刻意寻求。他穿着靴子就睡了。

德农用一整天踏遍卡尔纳克建筑群，一连十个小时，深知留给他的时间所剩无几。四十米高的塔门上刻着法老

时代战争的浮雕。粉红花岗岩的方尖碑笔直耸立，是自南面两百公里外的阿斯旺运来的整块巨石。其中一座由第十八王朝的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所立，高二十九米半。碑面上布满纵向排列、刻工精细的象形文字，无人能够释读。

到处都是，柱身上、墙壁上、石棺上。德农整排整排地抄录，铅笔很慢，一个字也读不出——谁也读不出。

在卡尔纳克的大庭院里，德农站在一排浮雕前，上面刻的是作为贡品献上的动物。狮子，长颈鹿，猴子，羚羊。他以绘图者的精确逐一抄录这些物种，并标出如今埃及已不复存在的那些。

“您瞧瞧这头狮子，”他对路过的若卢瓦说，“这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狮的头骨——侧面轮廓更平，鬃毛更长，简直像一幅肖像。要么是雕刻师弄错了，要么古埃及的狮子是一个独立的种群。我押后者。”

若卢瓦看了看浮雕，又看了看德农，继续赶路。德农并不指望回答。他已在页边添上了第二道鬃毛。

另一个夜晚，若马尔正在整理他在卡尔纳克的测量结果，忽然听见了声响。

沉闷而有节奏的敲击声，还有重物在石板上拖曳的刮擦声——是工地的声响，不是战斗的声响。他拿起灯笼。

大厅里，三名士兵借着两支火把的光在干活。他们清空了一个壁龛，里面存放着雕像的碎块——神像的头、手、半身像——此刻正在石板上分成两堆，值得搬走的放在一边，太重的放在另一边。其中一人双手捧着一颗黑色花岗岩的隼首，大概是荷鲁斯，眼睛嵌着某种深色的物质，火把的光下辨认不出是什么。他翻转着它，试图掂出分量。

若马尔没有越过大厅的入口。委员会成员的权威足以让他禁止未经许可的搬运。他本可以出面干预。他没有这样做。他们有三个人，而德塞的各营里有三千人，一个孤身提灯的人拦不住任何事，何况他也不喜欢做原则性的姿态。他把灯芯拧低，退入黑暗之中。

下午，在建筑群北面的庭院里，若卢瓦有了一个发现。散落在瓦砾之间的第十二王朝浮雕残块，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尺度更小，更显亲切，国王的形象不那么庄严刻板，而更有人情味。其中一位国王的脸上带着倦意，那是任何一位鼎盛王朝的法老都不会容许出现在自己纪念碑上的神情。

“您看这双眼睛，”若卢瓦对已经画了一个小时的德农说，“我从没见过一位法老这样……疲惫。”他沉默了片刻。“权力的倦怠。”

德农停下了笔。若卢瓦说得对。他把这张脸从头重画，眼睑更沉重了些。

1 月 29 日，部队重新南下，在三公里外的卢克索停驻两夜。出发时，德农和若马尔获准带着一支护卫队留在后面，随后再强行军赶上。那里有阿蒙霍特普三世与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连接两座神庙的狮身人面像大道，早已被黄沙和建在其上的村庄房屋掩埋。

德农勾画了那条自入口庭院通往内殿圣所的大柱廊。十四根纸莎草式立柱，高十九米，造型优雅，见证了第十八王朝的审美趣味之精致。墙壁上刻着奥佩特节的游行浮雕，描绘阿蒙神像每年乘圣船从卡尔纳克运往卢克索的情景。他把这一场景抄绘了好几页。

入口塔门上还有另一些浮雕，表现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人之间的卡迭石之战。浮雕宽六十五米，自地面起覆盖到十米高处，场面雕刻得极富动感。这场战役的结局本

有争议，拉美西斯险些被合围，之后才得以突围。塔门上展现的只有凯旋，刻在无人会来更正的高度。

塔门前矗立着两座方尖碑。后来，穆罕默德·阿里于 1830 年把其中一座赠给了法国，正是这两座中的一座。那一座将在 1833 年乘一艘专门设计的船驶抵巴黎，并于 1836 年竖立在协和广场。1799 年的德农注视着它，却不知道它最终会落脚在那里。他记下了它的尺寸、铭文，以及在四个面上反复出现的王名圈。

德塞带着队伍前卫经过，在方尖碑前停了下来。他仰起头望向第一座碑的尖顶，它高悬在他头顶二十五米之上，随后又转向身旁作画的德农。

“这些竖着的石柱，能把它们运走吗？”

“是方尖碑，将军。花岗岩的。每座大约两百三十吨。”

“有河在下面，再加上杠杆，埃及人不就办到了吗。”

“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了。而且他们是借着洪水，把碑从南方顺流运到北方的。要把它们运回法国，就得装上一艘专门建造的船。我们在地中海的任何船只都做不到。”

德塞又看了一眼方尖碑。

“总会有人想出办法的，只是不会马上。”

他转身回参谋部去了。

在卢克索神庙的侧厅里，盗掘者早在他们之前就动过手，德农在那里找到了匆忙的掘宝人所遗漏的东西。青铜小雕像的残片，脚，手，还有一张完整的奥西里斯鎏金青铜面像，高十五厘米。那张脸带着晚期埃及青铜像特有的安详。杏仁形的眼睛微微上斜，嘴唇薄，戴着编结的假胡须。金属是用失蜡法浇铸，再经凿刀加工而成。眉毛和眼眶的轮廓镶着细金，瞳孔用黑色玻璃制成。

这一类青铜像自公元前7世纪起便成批量地生产。成千上万尊还愿的小像，由信徒献入神庙，换取神明的庇佑。这些物件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它们是献给神的礼物，是神庙的财产。盗掘者清空库房时，取走的是阿蒙的东西，而阿蒙并没有向任何人索还。

德农拾起奥西里斯的面像，翻过来。背面用凿刀刻着一行象形文字，大概是献祭者的名字。他抄下那些符号，随后把这件东西收进挎包。收的时候，他想到了波拿巴的清单。一张奥西里斯鎏金青铜面像，无疑属于第一类。他本应申报，好让它送往开罗，并入由傅里叶掌管登记册的官方收藏。他没有这么做。自从丹德拉以来，他为委员会取走的和为自己取走的之间的界线，已渐渐模糊。他个人的清单里已有三十来条记录。这些物件在半年前，还不存在于欧洲人的藏品名录之中。

这和偷窃不是一回事。他几乎说服了自己。

那天晚上，若马尔又在神庙正面前待了一个小时。卡尔纳克的建造延续了两千年，每一位法老都添上一座塔门、一条大道、一间殿堂。两千年的持续营造，风格没有断裂，计划也从未动摇。埃及完成了欧洲从未解决的一件事，一项建筑工程得以跨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而无人决定过它的终点。

而此刻，士兵们却把这项工程的碎块装进了行囊，塞在饭盒和换洗衬衣之间，大概并无破坏者的用心。那些运往巴黎，或进入军官们私人收藏的碎片，脱离了这个整体，成了稀罕玩意，成了纪念品。

若马尔在回去之前记下了这一点。“卡尔纳克是一个体系。每一个构件在整体中都有它的位置。挪走一个构件并不会毁掉卡尔纳克，却毁掉了这个构件作为体系一部分的

存在。它在别处将成为另一种东西——一件器物，一件藏品——而不再是此地某种确定的东西。”

那天晚上离开卢克索时，德农看见神庙入口坐着一位老人。他穿着白色的加拉比亚长袍，望着士兵们把石块搬进院子。他看上去并不愤怒。那是一张看着早已见过之事的脸。

德农停下了脚步。哈桑向那人打了招呼。两人交谈了几句。

“他说他父亲是这座神庙的守护人，祖父也是，曾祖父也是。他不知道已经传了多少代。他说奥斯曼人来过，马穆鲁克人来过，现在法国人也来了。每一回，他们都要拿走石头。”

德农请哈桑翻译他的回答。法国人来此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破坏。哈桑翻译了。那人回敬说，奥斯曼人当年也说他们来是为了别的缘故，结果还是照拿不误。

德农无言以对。他画下了那个老人的背影。白色的加拉比亚长袍，花岗岩石块，以及他身后院子里的士兵。

德农没有看见的，是这一幕背后，官方工作时间结束之后，哈桑都在做些什么。

哈桑是委员会的正式翻译。他是个开罗的埃及人，很快就明白自己的位置让他得以在两个世界里通行无阻。他把学者们的问题译给费拉听。至于费拉们私下议论学者们究竟想要什么，他并不总是照实转译。

若马尔在头一个星期之后就看明白了。哈桑为学者们向当地商贩采购提供便利，并从中分得一份。若马尔估计是百分之十五。无论卖方还是买方，都不知道市场的另一端也同样经过他的手。

在卡尔纳克的一个夜晚，若马尔起身，远远跟在哈桑后面。哈桑穿过主营地，走向高级军官们住的那一片，在一顶帐篷前停下，低声同一名仆人说了几句。仆人进了帐篷，带着两名军官出来，一位上校，一位参谋部的上尉。哈桑打开一只帆布袋。借着油灯的光，他在一块折起的毯子上摆出四件东西。比他白天拿给士官们看的要精美得多。一枚青金石的王室圣甲虫，稀有而沉重。一只半透明雪花石膏的杯子。一尊十厘米高、蓝色釉砂的卜塔小像。一件纯金护身符，是一尊端坐的巴斯特。

军官们查看了这些物件。上校讨价还价。哈桑在价钱上让得那样轻松，足见他一开始就把利润空间算进去了。四件东西易了主。哈桑收起钱，数也不数。

若马尔未被察觉，回到了营地。第二天清晨，他直截了当地质问哈桑，不绕弯子。

“我看见了，”若马尔说，“昨夜。军官们，那块毯子，那四件东西。”

哈桑并不显得窘迫。他等着下文。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是古尔纳的一个人，夜里渡过尼罗河带来的。他知道一些法国人至今还没去过的墓。这些年来，他找到什么就卖什么。”

“那您抽的佣金呢？”

“售价的百分之十。军官比士兵付得多，参谋部的军官又比连队军官付得多。”

“那么白天您卖给学者们的呢？”

“十五，没错。以量补价。他们想卖，您想买……墓不是我挖的。我只是翻译价钱。”

哈桑走开了。他是开罗人，父亲是宗教法庭的抄写员，精通阿拉伯文，法语也足以为这些人效力。他接下这份差事，是因为报酬优厚，也因为法国人和此前的其他人一样，不会久留。

哈桑没有对若马尔说的是，他两天前的拂晓，在学者们起身之前，独自一人走进了卡尔纳克神庙的大厅。

在这次远征之前，他从未见过卡尔纳克。他的祖先并没有建造这一切。对这些象形文字，他手里也没有比德农更多的钥匙。但没有人要求他去释读它们。要他做的，是翻译价钱。

III - 国王谷

1月29日，若马尔第一个渡过尼罗河，前往西岸。他请求天亮之前就出发，好在军队开动之前，独自占有这片遗址。

底比斯的墓地在多山的沙漠中绵延数公里。若马尔是从波科克和诺登的游记里知道它的，但这些叙述并未让他那双制图者的眼睛对眼前的实景有所准备。那是一道石灰岩的山谷，凿在悬崖之中，离河五公里，岩壁上的每一个开口都标志着一座墓的入口。可见的开口有几十个。沙下肯定还有更多。

他爬上一处俯瞰山谷入口的岩石平台。从这个位置，他一览无余。悬崖上的墓口，采石工人踩出的小径，以及古人开采这片岩石的遗痕。法老们放弃了金字塔，改在此处凿墓，据说是为了更隐秘。盗墓者还是找到了它们。几乎所有的墓在古代就已被洗劫一空。留下的只有岩石与角度，这是谁也偷不走的。若马尔把经纬仪的三脚架稳稳支在两块石头之间。

他施行的是他所称的“实地三角测量”。

从一个中心点出发，用经纬仪依次瞄准所有可辨认的标志，记下角度，再根据地面上量得的基线推算距离。那天早晨，他从拂晓起一刻不停地工作。七点左右，一名士兵带着他的口粮来找他。若马尔没有离开目镜，向他道了谢，面包就那样留在石头上。若卢瓦的工作方式则不同。若马尔追求的是角度与距离，而若卢瓦追求的是关系。一个尺寸透露出另一个尺寸的什么，一种比例又泄露了怎样的意图。若卢瓦的笔记本里没有若马尔那样成列的数字，只有加了批注的草图、以分数表示的比例，以及不同遗址之间的比较。二人却出自同一所学校。

更低处，在若马尔的视线之外，古尔纳的向导们领着德农和若卢瓦，从一座墓走到另一座墓。

古尔纳的费拉几代人以来对国王谷的每一个入口了如指掌。他们的村子就建在墓穴之上。房屋坐落在地下墓室上方，孩子们在历代王朝的亡者头顶长大。数百年来，他们悄悄地从这些墓中营生，卖给开罗的商人，卖给少数敢于涉足此地的欧洲旅行者。这门生意规模不大，细水长流，又因怕惹来奥斯曼当局的注意而保持着分寸。

法国人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

学者们想把一切都看个遍，而且立刻就要看。他们要求向导带路，去那些凭自己永远找不到的墓。古尔纳的人为德农和若卢瓦引路时，暴露了他们一向小心翼翼不让当局知道的入口。法国人走过之后，这些墓便被“发现”了，为人所知，并被绘入地图。盗墓者们保持了几百年的隐秘，几天之内便荡然无存。

“我们是在制造我们自己的市场，”若卢瓦说，“一支军队，一堆笔记本……而我们初来时遇见的那种盗掠，因此快了许多。”

“得了，到底也不是我们在盗掠。”德农说。

“我没这么说。可照我们这个速度……他们要花一个世纪才做完的事，只需十年。”

德农和若卢瓦跟着向导们下到墓里。甬道陡峭地向下倾斜，窄得有些地方不得不匍匐前进，手肘磨在石灰岩的粉尘里。空气先是变冷，继而凝滞不动。那是数百年来纹丝未动的空气，似乎在抗拒着闯入者。他们来到一间前室，四壁绘满了壁画，色彩鲜艳得令人惊叹。

若卢瓦猜出了那些日后被称作《阿姆杜阿特》和《门之书》的场景。出发前他读过基歇尔。夜里的每一个时辰对应一道考验，每一道考验对应一位守护神。他画着，却并不明白。他把这些对应关系记在测量数据的页边。

“这些壁画美极了，可我看不懂，”若卢瓦放下灯说，“胡狼头的阿努比斯，这个我认得。展开双翼的伊西斯。可其余的——这些仪式的姿势，这些符号——是一部我们没有钥匙的百科全书。”

一天之内他们参观了七座墓。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拉美西斯三世的墓，布鲁斯三十年前曾到访过。漫长的廊道深陷地下，每一间厅室对应着太阳在冥界夜间旅程中的一个时辰——一部凿在岩石中的丧葬历书。

这座墓里的壁画让德农当场怔住。他见过西斯廷的壁画，见过意大利的拉斐尔。这些画并不逊色。它们只是不同。线条优雅，笔触笃定，只用六种颜色的调色板，却给人一种无所不包的印象。

“巴黎挂着的画，有些笔触还不及它们稳当。”若卢瓦说。

墓室里仍留着红色花岗岩的石棺，上面雕着宗教场景。太重了，古代的盗墓者搬不动。

“看看这些象形文字，”德农的目光没有离开石棺，“每个符号都像出自珠宝匠之手。这是死者应当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

“他们把死亡想成一场旅行。考验，门，守卫……我们的神学家从来没有搞得这么复杂，天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了。”

“会有别人读懂的，”若卢瓦回答，“他们需要我们的摹本来核对。”

这一天的第三座墓在山谷之外，位于古尔纳山丘的山腰，那里安息着平民——一间简朴的墓室，大概是某位中级官员的——德农在地上发现了一卷展开了一部分的纸莎草纸。盗墓者把它留下了，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眼前可换的市价。他小心地将它拾起。纸莎草纸干燥，边缘发脆，但卷芯保存了下来。他把它摊在膝头上展开。

文献高四十厘米，长逾两米。上面布满黑色的象形文字纵列，配着红色和赭色墨水绘成的插图，其中有一架天平，一边的秤盘上放着一根羽毛，另一边是一颗人心；一个人跪在四十二位审判官面前；胡狼头的阿努比斯手握一柄瓦斯权杖。这便是后来被称作《亡灵书》第一百二十五章的内容。称量灵魂，即灵魂的审判。

德农不会读这篇文字，当时也没有人会读，但他认出了那些插图，因为他在别的墙上见过。他小心地把纸莎草纸卷起，用手帕的亚麻布包好。到了巴黎，马塞尔会研究它，而这并不是这卷纸莎草纸被制作出来的用途。德农把包裹塞进了挎包的最底层。

这一天的第四座墓里，德农发现了第二卷纸莎草纸。这一卷比头一卷更大。他俯身去取。

护卫的士兵比他先到。也不完全是比他先到。他们是同时看见那卷纸莎草纸的。但德农还在盘算的时候，士兵

已迈出一步。士兵的手已经压在上面。两人对视了一秒钟。然后德农从士兵手里拿过了纸莎草纸。不是粗暴地夺，但也毫不迟疑。他只说了一句：“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士兵松了手。他实在拿不出什么理由来争。

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是合法的权威，德农有权征取科学文献。

士兵已经离开了墓室。德农独自留在那里，面对着他的火把和空空的壁龛。他所做的事是合法的。他所做的事迅速，果断，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他所做的事和士兵的举动是同一个动作。伸向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手，对价值的瞬间估算，攫取。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个动作由谁做出，便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他没有回头，走出了墓室。他在私人日记里用一行字记下：“抢在士兵之前拿了纸莎草纸。”

至于那个士兵，他也没有空手而归。他回到墓室，捡起了德农留下的东西。三枚碎裂的釉砂护身符，一块镀金的亚麻硬壳残片，一块彩绘石灰岩碎片，上面还能辨出一只荷鲁斯之眼。都是些次等的物件，德农认为不配放进自己的挎包。士兵把它们塞进了自己的挎包，吹着口哨走了下去。

中午，若马尔从他的岩石平台上下来，找到了德农。

“您那座墓在我测定为悬崖顶点的那个位置以东一百三十二米处。”

“那有用吗？”德农问道，一边擦着沾满石灰岩粉尘的双手。

“等到有人想系统地发掘这座山谷时，我的地图会告诉他从哪里开始。眼下，没有人知道沙下还藏着多少座墓。”

他望着若马尔笔记本里那一列列数字，却看不懂那些演算。

“您已经在为我们之后的人着想了。”

“我从一开始就在为他们着想。我们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完。但我们可以做到，让后来的人能从我们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走。”

回到营地，占据若马尔心思的不是国王谷的那些墓，而是盗掠。

他看见四种不同的逻辑同时在起作用。古尔纳的向导们开发着学者们让他们揭示出来的墓穴，一门古老的生意在新的需求之下骤然加速。士兵们能扛多少就捡多少，毫无组织，毫无标准。军官们悄悄地、用干净的钱购买。专员们则凭借权威、方法与文献记录来取走。还有他自己，带着他的测量。还有德农，带着他的笔记本和挎包。

这四种方式产生同一个结果。曾经在埃及的东西，不再在埃及了。令他不安的并不是数量，而是在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缺乏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委员会受命收集科学标本，可这一授权从未有人界定过。它没有说明什么可以拿。它只是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科学，而科学自会裁决。

他在日记里写道：“收藏与盗掠的区别，是去向的区别，而非行为的区别。我们为巴黎而收藏，他们为自己而盗掠。国王谷分不出这两者的不同。”他把日记塞到行囊底下，对谁也没有提起。

在悬崖脚下的平原上，德塞在拉美西斯二世倒塌的巨像前停住了脚步。那张安详的面孔望着天空。胸前刻着宣示他头衔的铭文：宇宙之主，两地之主。

“这位拉美西斯曾统率数以万计的人，”德塞望着倒下的巨像说，“他建造的纪念碑，本是为了永恒。可如今他躺在沙里，鼻子也断了。”

若卢瓦放下测量链，以工程师的眼光审视着这座雕像。

“这花岗岩来自南面两百公里外的阿斯旺。他们开采出整块毛料，借着洪水漂到底比斯，再在这里雕琢。是山来到了神庙。”

1月30日，天亮之前，若马尔和德农就守在门农巨像前，等待太阳升起。第一缕阳光触到了石头。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座巨像已有近十六个世纪不再歌唱。两人对视了一眼。

“它不再歌唱了，”若马尔补充道，“据说是一位罗马皇帝下令修缮它之后，它就沉默了。多半是石头在清晨骤然的热气下膨胀，使裂缝发生了震动。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

“多半如此。可是听见它的朝圣者并没有您那套热学解释。对他们来说，雕像是在说话。您拿着温度计去，试试把这个从他们心里拿走。”

德塞在清晨时分来看了巨像，端详了一会儿那些毫无表情的面孔。

“令人印象深刻，”他说，“马穆鲁克人更让我操心。纵队今晚拔营。你们完事之后，赶上我们。”说完他便离开了。

德塞走后，若马尔仍留在门农巨像前。十八米高的石英岩坐像立在平原上，周围没有神庙，看不到任何建筑背景，四周空无一物，却在五公里外就能望见。士兵们和古尔纳的商人搬不走的，正是这个，而它只有在那里，在那一片特定的景观之中，才有意义。

那些可以携带的物件，从被取走的那一刻起，便切断了这种联系。国王谷一座墓里的一尊釉砂*沙布提俑*，是在它应在的位置上。它被制作出来，就是为了在那里，陪伴那一位特定的亡者，走那一段特定的旅程。

然后他收起笔记本，拿起仪器，向营地走去。在他身后，巨像依旧望着东方。

IV - 阿斯旺

德塞却没有等待。1月30日傍晚，他就下令拔营。留在后面的德农与若马尔、若卢瓦一道，只得合上他在底比斯的画夹，强行军追赶纵队，他们于 31 日追上了。德维利耶要到后来才会走上这条路。

纵队继续南行，前往两百公里外的阿斯旺。地貌渐渐收窄。

越往南走，居民也在变化。肤色更深的努比亚人逐渐取代了阿拉伯费拉。作物也不同了。杜拉，一种非洲高粱，取代了小麦。房屋变得更低矮，用土坯砌成，正面不开窗。法国军队穿行在一片自罗马人以来再没有任何欧洲军队到达过的地区。

村子里的居民站在平屋顶上，看着纵队经过。他们没有逃跑。他们只是观望。上埃及的费拉数百年来早已学会等军队过去。他们知道抵抗要付出什么代价，合作又值多少，因此两者一概不给。若卢瓦没有下马，把这一区别记在了笔记本里。

纵队从一开始就在带走东西。若卢瓦是通过观察驮畜才渐渐明白这一点的。离开底比斯时，骡子驮的是口粮、宿营器材和弹药箱。两天之后，同样的骡子驮上了额外的货物。帆布袋，临时拼钉的木箱，被超载地绑在驮鞍上。那是士兵们夜晚在宿营地里亲手做的。

一天下午，若卢瓦在一头载得格外沉重的骡子旁停了下来。帆布袋没有扎紧。露出一角雕刻过的石灰岩，是一块浮雕残片，大约六十厘米乘四十厘米，表现一个行进中的人像的下半部分。长袍的下摆，双脚，权杖的底端。他认出了风格。托勒密时代的，很可能是遗址上的再利用构件。

牵骡子的士兵察觉到他的目光。他不慌不忙地把袋子扎紧，又上路了。

“埃及正在骡背上向北走，”若卢瓦在宿营地里对德农说。

“埃及的一部分。最轻的那一部分。”

“也是最便于携带的那一部分。决定什么走、什么留的，就是这个。不是价值，不是历史意义，而是重量。”

骑马走在他们身旁的若马尔思索了片刻。

“这就是说，巴黎将要看到的埃及历史，将是那些重量不到二十公斤之物的历史。其余的一切都会留在这里。”

那天夜里，若马尔坐在尼罗河边，望着河水。他下意识地估量了河道的宽度。三百米，凭眼力。水流和缓。

尼罗河向北流去。他们带走的东西也一样。军队有自己的补给线、河运船队，以及载着报告、信件顺流驶往开罗的船只。这些同样的船上载着委员会的正式箱子和军官们的私下包裹，而绑在驮畜身上的袋子则沿河岸随行。

四千年来，尼罗河一直是运输的通道。法老们曾借它的水，把阿斯旺的花岗岩运往底比斯。罗马人曾顺着水流，把方尖碑运往亚历山大。如今，法国人把几个世纪留在上埃及的东西运往开罗，有船的时候走水路，其余时候靠骡背驮运。

自开罗出发以来，军队已在十来处遗址驻留过。每一次停驻都产生它那一份物件。凡能搬动的东西，都在向北

滑去，被巴黎的市场、私人收藏、中央艺术博物馆所吸引。没有哪一个人该独负其责。只有一道坡，物件顺着坡往下滑。

2月1日，在康翁波停驻过夜。

若卢瓦还没下马，就已辨认出那座神庙。它几乎被沙子整个埋住了。

他在停驻的那个傍晚，又到次日拂晓，都在神庙已清出的部分拉着测量链。浮雕异常清晰——埃及艺术保持其视觉语言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欧洲流派都更为长久——而沙子已没到他的脚踝。

“墙上的这些器械，”若卢瓦在内殿的一道浮雕前停下来说，“手术刀，镊子，探针。埃及的医生是做外科手术的。没有一位古代作家这样精确地提到过这一点。”

德农把那些器械一件件抄进笔记本，记下尺寸和可能的用途。

营里的军医——一位名叫布吕扬的，曾就读于巴黎外科学校——来看德农的摹本。他默默端详那些图样，良久不语。

“这把弯曲的手术刀，”他终于指着墙上的一件器械说，“我们用它做深部腹腔切口。弯度使它能滑到脏器下面而不会刺穿。我原以为……人家教我的是，这是近十年才有的发明。”

“这些带橄榄头的探针，”德农说，铅笔指向墙壁，“您认得吗？”

“用于尿道导管插入。同样的形状，同样的大小。金属不同——是青铜，不是钢——但器械是一样的。这里有人独自碰上了同一个解剖学上的难题，比我们早了两千年。”

他又在那些图样前待了一个小时，逐件辨认器械，讲解它们的用法。德农把讲解记在草图的页边，字迹越写越密。

“您明天早上该来，”德农说，“后面的厅里还有别的医学浮雕。”

第二天早上，布吕扬与德农一同走遍神庙的内厅，外科医生辨认器械、口述用法，德农则边画边抄。这项只用了一个傍晚加一个上午的工作，将一直留在德农的画夹里。《埃及志》中的康翁波图版，要到后来才由若卢瓦和德维利耶绘制。

与此同时，若卢瓦仍在测量。埋住神庙的沙子，也保全了它。每一次测量都在向他证实这一点。休息时，他向德塞谈起了这件事。

“如果我们真想保护这座神庙，”若卢瓦说，“就该让它保持原样。什么也不清理，什么也不碰。沙子保护它，比我们做得更好。”

“您是建议我什么也不做？”德塞说，语气里带着一丝笑意。

“我建议您……”若卢瓦斟酌着措辞，“……想一想，我们在这里的存在，对我们前来研究的对象，不一定是件好事。”

德塞没有回答。他有一支军队要养活，有一场战争要结束，目光已经转向马匹那边。

若卢瓦留意着从神庙里流出去的东西。从内厅里钻出来、袋子沉甸甸的士兵；向专程赶来的埃德福商人买东西的军官；还有德农本人，经哈桑居间谈判之后，买下了两件。

在丹德拉、在底比斯都是如此，到了阿斯旺也将如此。士兵们取走，本地商人供货，中间人牵线，学者们购买，而没有人质疑他们的这一权利。

两个入口，两座多柱厅，两间圣所。这座神庙供奉两位神——索贝克与哈罗埃里斯——布局严格对称，而手执测量链的若卢瓦发现两条轴线稍有错开，这足以安放两位平等的神明，而不让其中一位排在另一位前面。

“简直像站在罗马的一座凯旋门下，”德农指着囚徒跪在得胜法老面前的那几层浮雕，对若马尔说。

“要表明谁赢了，或许本就没有一百种办法。”

离开康翁波那天的早晨，德农看见两名士官正用大锤砸开圣所内壁上的一块浮雕。那块石板上刻着外科手术器械，与布吕扬辨认过的相似。一个人就能扛走。

“住手。”德农说。

“我们有许可。拉谢兹上尉说可以。”

德农去找德塞。德塞传唤拉谢兹上尉。后者没有否认。他在底比斯、在丹德拉见过别的军官也这样做。他不知道这是禁止的。

“这些古迹属于委员会。没有我的书面命令，你们什么也不许碰。”

拉谢兹退下了。石板的底部已经断裂，大锤的几下敲击早已造成了破坏，无法再把它安回原处。德农用双手托住它，平放在地上。这并没有好多少，但总比任它摔落要好些。

拉谢兹走后，在纵队开拔之前，德农走向一直待在稍远处的德塞。

“这种事常有吗？”

“比我知道的还要频繁。一个行军了两个月的士兵，看见一块块刻满难以理解的符号的石头，就拿他搬得动的。我没法盯着每一座神庙。”

“那么，您无法监管的东西，和委员会正式收集的东西，二者的区别，您如何表述？”

“你们有表格。你们的专员有委任状。士兵们有袋子。这不是一回事。”

他看着德农。

“我知道这不够。您也知道。但我能给您的区分，就只有这个。”

他朝自己的马走了几步，随即停下，转身望向神庙。

“这一座。昨夜我独自走了进去。在黑暗中，对着那些柱子，待了二十分钟。我不知道自己领会了什么。但我不会忘记。”他拿起缰绳。“阿斯旺见。”

纵队开拔时，德农回去看那块断裂的石板。它已经不见了。有人——不是拉谢兹，这位受了处分的军官正受到监视——还是把它带走了。他向德塞写了一份书面陈述。德塞不予立案，不了了之。没有证人，没有姓名，没有证据。那块石板，此刻就在康翁波与阿斯旺之间某个人的行李里。

这一天，离康翁波一小时路程处，若卢瓦拨转马头，朝一座离大路五十米远就能望见的砂岩小礼拜堂而去。先头营经过时，它已被部分清出了沙子。

墙壁还立着。木头屋顶已经塌了。里面，三面墙上的壁画清晰可见。行进的队列，乘船的神明，象形文字的铭文分两层横排延伸。壁龛里原先供着小雕像，如今空空如也。地面上散落着釉砂碎片，那是原先的小像在被人从底座上硬扯下来时折断的残片。

先头营的士兵天亮时来过，动作很快，毫不犹豫。若卢瓦从沙地上新鲜的靴印，以及被掏空的壁龛边缘仍泛白的灰浆推断出这一点。

他开始在笔记本里描述那些壁画。只有它们没有被动过，位置太高，不容易够到。随后有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在上层横排，第三块嵌板的右侧，有一段草体铭文，共四行。他一个符号一个符号地抄下来，精确得近乎偏执，在白日的酷热中花了四十五分钟。

这将是唯一存世的摹本。这座礼拜堂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坍塌。而那本笔记本却将留在档案中。

若卢瓦把笔记本塞进挎包，小跑着去追赶纵队。

过了康翁波，前往阿斯旺的行进几乎没有留出歇脚的时间。若卢瓦在马背上能画什么就画什么，速写着从大路上瞥见的神庙的轮廓。这些匆匆的草图带着实测图并不总具备的生动。某一特定时刻的光线，一座古迹与它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

“您画画像个行军的士兵，”一位年轻军官看着若卢瓦作画，说道，“不停歇。”

“神庙不会等我的，”若卢瓦笔不离纸地回答。

2 月 2 日，远征军抵达阿斯旺。第一瀑布使南向的航行无法进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埃及天然的边界。德塞安营扎寨，让学者们自去勘察。

“请给我几天时间去菲莱，”德农说，“诺登六十多年前画过它——说句私房话，画得不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在阿斯旺，动身去菲莱之前，古董市场是若卢瓦出征以来见过的最为活跃的。军队即将北返的消息已传遍当地的各个村庄。卖家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们天一亮就在营地周边摆开，带着袋子和小匣。这已不再是某一个中

间人的隐秘买卖，而是一场热闹的交易，价格随买家和卖家而异。

若卢瓦观察了一个小时的交易。他看见一件件东西在人们手中传递，有彩绘木质的*沙布提俑*，表现荷鲁斯、伊西斯、阿努比斯的釉砂小像，各种大小的圣甲虫，石质护身符，一块大概出自某口棺材的镀金亚麻硬壳残片，两尊带有古旧包浆的青铜小像，若干只方解石雪花石膏花瓶，其中一件还带着盖子。

价钱很高。比丹德拉或底比斯的都高。卖家们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法国人走后，就得等下一回有人经过。

物件在一只手与另一只手之间传递，伴着清点皮亚斯特的声响。

V - 菲莱

2 月，德农乘一艘三角帆船前往菲莱，哈桑随行。穿越瀑布时用篙撑船，在露出水面的岩石与漩涡之间行进，努比亚的船夫在每一处通道到来之前都高声呼喊。随后小岛浮现。长四百米，宽一百五十米，几乎整个被托勒密时代的神庙占满。

“天哪，”德农低声说。

“整个仪式都在这里，”德农画完一间侧厅的速写，说道，“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供品。如果把旁边的文字释读出来……就会知道每一个的含义。”

“还有那一座，”他用铅笔指着岛屿尽头那座带柱的小亭，补充道，“大神庙压得人透不过气。那一座却令人信服。”

图拉真亭——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亭上的浮雕表现的是这位罗马皇帝以法老的形象出现——是岛上最轻盈的建筑。十四根带花卉柱头的立柱，托着一道细砂岩的

檐部。内部装饰表现的是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皇帝在主持传统的法老仪式，摆出与前辈们相同的姿势。石块的尺寸不大，几个人就能搬动。浮雕却非同寻常。

德农在亭前站了很久。拆下几块带装饰的石块，是办得到的。护卫就在这里，士兵们能搬，哈桑可以同船夫们谈妥运到阿斯旺的事。这会是合法的，他的挎包里有委员会的表格。没有一块石头重过几百公斤。

但他决定不这样做。

并非出于道德原则。有了自丹德拉以来所取走的一切，他已不再容许自己以这种美德自居。他只是不愿意，等别人来到菲莱时，它也和其他遗址一样。这种建筑上的轻盈，这种合乎人的尺度的优雅之中，有某种东西要求保持完整。没有了那些石块，这座亭子就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一座亭子，柱廊与天空之间的一场对话——而只是废墟中的一处废墟。

自离开开罗以来，这是他头一回有意识地做出这样的抉择，一一说出理由，一一权衡轻重。当晚他把此事写进了日记，只因这个举动在他看来太不寻常。“菲莱。小亭。决定不取。并非出于顾忌。只是不愿毁掉触动我的东西。”

菲莱周围的岩石上刻着古代朝圣者的铭文。姓名、日期、祷词。德农抄录了其中几处，并记下它们的位置和保存状况，随后又抄录了其余的，连最难辨认的也不放过，连那些被尼罗河洪水冲蚀去一半的也不放过。阳光把石头晒得发烫，他只好把笔记本搁在膝头。

“这些，我比神庙更喜欢，”哈桑说，“寻常的朝圣者。他们来向伊西斯祈祷，就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不是为了流传后世，而是为了……曾经来过。”

“就像我们的笔记本，”德农说，“我们到过这里，我们见过这些。只不过我们把这叫作科学。”

“我们不也是在做科学吗？”

德农抽出片刻，吹去页面上的沙子。

“是的。而我们同时也留下了另一种性质的痕迹。在空空的壁龛里，在骡背上的箱子里。那些痕迹……任何报告里都找不到。”

2月25日，德农随纵队骑马离开阿斯旺。行李和箱子由船只顺流运送，六十名骑兵沿河岸护送。德塞追击穆拉德贝伊去了，把纵队交给了贝利亚尔。德农离开罗还有近九百公里，要到夏天才会再见到它。哈桑随他同行，担任翻译。部队沿着上行的路线反方向返回。

到赫尔蒙提斯走了九天。纵队沿河而下，每日约二十公里，途经村庄便停下来取水补给。阴凉处近三十度。行军从黎明走到正午，四点钟之后再继续上路，其间在帐篷下歇息，而苍蝇让人无法入睡。

在一个没人知道名字的村庄附近，一名士兵在行军途中倒下了。中暑。人们把他抬到一棵棕榈树的阴影下。军医长让他喝水，又用尼罗河水浸湿他的头。一个小时后，那人恢复了知觉，却无法行走。他们把他搬上一头骡子。当夜他死了。天亮时，人们把他埋在离营地一百米的沙地里。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军士在连队的登记簿上记下了他的姓名和日期。

在康翁波与埃德福之间，两名士兵为一个在集市上买的釉砂小像大打出手。一个声称自己比对方先看到，另一个却是付过钱的人。他们在军士长的帐篷前扭打起来。军士长走出来，把两人拉开，没收了小像，放进自己的

背囊。两人抗议。军士说，这东西现在归连队所有，谁再提起一次，就罚十天苦役。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几天之后，队伍穿过一座废弃的村庄。三十间土坯房，全是空的。没有战斗的痕迹。居民在军队到来之前就已离开。一名中尉命人搜查各家各户。在三个不同的院子里找到了埋在地下的陶罐。谷物，椰枣，油。这些陶罐被充作征用物资。在第四间屋子里，人们发现了一处地下的藏物。六只釉砂圣甲虫，三只铜手镯，一面青铜镜。中尉把圣甲虫交给了上尉，自己留下手镯，镜子则给了发现藏物的士兵。

傍晚时分，纵队接近埃尔卡布隘口，一名骑兵从前卫飞驰而来，坐骑满身白沫。他在找贝利亚尔将军。人们把他带到纵队的最前面。他语速很快。贝利亚尔示意军官们走近。

“路上设了路障。有持械的费拉，大约二十人。他们堵住了隘口。”

“他们提了什么要求吗？”

“他们不会说法语。翻译官没能走近他们。他们还朝天开了几枪。”

贝利亚尔思索了几秒钟。

“从东边绕过去呢？”

“不可能。那一带地形根本无法通行，得多绕整整三天的路程。”

“好。强行通过。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德农，您留在队伍中间，跟着骡队。”

队伍重新开拔。一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隘口。费拉们就在那里，拿着木棍、长矛和几支老旧的火绳枪。他们横在路上，一动不动。

贝利亚尔命骑兵缓步前进。费拉们纹丝不动。在五十米处，贝利亚尔举起手。骑兵停了下来。他示意哈桑走上前。

“告诉他们，我们只想通过。我们什么也不碰。在他们的村子里，我们什么也不征用。”

哈桑徒步向前，独自一人，双手摊开在身前。他用阿拉伯语说话。其中一个费拉作了回答。哈桑回来了。

“他们说，两个星期前军队拿走了他们所有的粮食。他们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要我们还粮，要不就付钱。”

“我们两个星期前什么也没拿过。那不是我们干的。”

“他们说那是法国士兵。他们分不清各支分遣队。”

贝利亚尔沉默了片刻。随后他从马鞍上取下一只钱袋，抛给哈桑。

“三十五个皮亚斯特。告诉他们，这是我身上的全部。他们若还想要更多，也得先让我们过去。”

哈桑拿着钱袋回去了。他对同一个人说话。那人接过钱袋，掂了掂分量，与另外两人商量了一阵。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从路上退到一旁。队伍通过了。费拉们默默地看着士兵一队队走过。最后一辆大车驶过之后，他们便回村子去了。

在赫尔蒙提斯，纵队停驻了两天。贝利亚尔想等候马穆鲁克人、麦加人以及分散在多处的其余军队的消息。营地扎在神庙脚下。士兵们睡在神庙墙垣的阴影里。有的爬上屋顶眺望尼罗河，另一些则待在帐篷里，累得不想动弹，靴子还穿在脚上。

抵达当晚，营地里发生了一起事端。第二连的一名士兵在分发时偷了另一名士兵的面包口粮。失主发觉后追上小偷，一拳打掉了他两颗牙。小偷还手，拔出了刀。四

名士兵把两人拉开。军士赶到，命人将两人铐起来关一夜。次日清晨，他们由上尉审判。小偷挨了二十棍。失主免于处分。

次日晚上，贝利亚尔召集军官们到他的帐篷里。他的探子刚刚回来。据说奥斯曼贝伊和麦加人即将在盖纳渡过尼罗河；他们有大炮，已经摧毁了尼罗河舰队，而去追击穆拉德贝伊的德塞又联系不上。波拿巴已率大部分军队前往叙利亚。必须尽快迎击敌人。贝利亚尔把手指按在地图上盖纳的位置。

“过了赫尔蒙提斯，不再停留。库斯，然后是盖纳。最多三天。”

“那底比斯呢？”一名中尉问，“学者们原本想……”

“直接过去。”

在场的德农没等别人让他开口。

“那么明天早上在这里停一下。赫尔蒙提斯神庙。六个小时。”

“不可能。”

“六个小时，将军。我别无所求。”

贝利亚尔久久地看着他，然后把地图折了起来。

“明天天一亮，在神庙待六个小时。多一个钟头也不行。您若是正午还没回来，我们就不等您了。”

次日天一亮，德农带着哈桑和两名护卫士兵前往神庙。他径直走向主廊道尽头那间半埋在沙中的后厅。沙子在他的鞋底下咯吱作响。西墙上是成排镌刻的王名圈，几十位君主的名字，一行行排成横列。

他在墙前站了两个小时，望着那些他读不懂的铭文。哈桑坐在门口附近的地上。两名士兵在外面掷骰子。

一个男人走进厅里，四十岁上下的费拉，白头巾，皮凉鞋，拿着一个粗布包裹。他走近德农，在他面前把布展开。那是一块边长四十厘米的石灰岩残片，上面有三个完整的王名圈。

那人指着残片。举起五根手指。

“五个皮亚斯特。”

德农抬眼望向墙的上部，那里先前被昏暗遮住，他一直没有看清。第十七行有一个新鲜的缺口，恰在这三个王名圈原先所在之处。石灰岩的边缘泛着白，是刚切下来的。那人是在夜里或清晨切下这块东西的。

德农从钱袋里取出五个皮亚斯特，递给他。残片进了他的皮挎包。那人收下钱，一言不发地走了。

德农没有再离开那间厅。十一点半，一名士兵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先生，将军已下令备马。”

他走出神庙。队伍已经列成行军队形。他上了马，策马疾驰回到队首，皮挎包在大腿旁来回拍打。贝利亚尔看着他从身边经过，没有作任何评论。队伍启程了。

纵队当天下午就穿过了底比斯，没有停留。德农望着卡尔纳克和卢克索的塔门在远处滑过，一座也没能测量，他在这里留下的遗憾比沿途任何地方都多。各种消息四处流传，互相矛盾。有人说，土耳其军队正在推进，英国人封锁了所有的港口；另一个人则发誓说情形恰好相反。

此后还有本努特之战，夺回盖纳，再赴丹德拉，以及五月底随贝利亚尔进军古塞尔。德农于 7 月 5 日离开上埃及，直到 20 日才又见到开罗。士兵们被安置在城堡的营房里。

他径直前往哈桑·卡希夫宫的北侧附属建筑，委员会的行李存放在那里。

仓库锁着门。他等了一个小时，一名总管才拿着钥匙赶来。里面有一股稻草和滚烫尘土的气味。他的十二只箱子都在，计入清单上的九十六只之中，沿南墙排成一列，上面是他亲手写的标签。他打开第一只，匆匆查看了里面的东西，又合上。什么也没少。他前往宫中。

统率开罗的迪加将军当即接见了德农。他站在一张铺满三角洲和阿布基尔海岸地图的桌旁，朝椅子做了个手势。

“您在上埃及的行动结束了？”

“是的。从丹德拉到阿斯旺。所有主要的古迹。”

“这些图可以用于*《埃及志》*吗？”

“可以。五十三张图页。神庙，陵墓，巨像，浅浮雕。”

“好。仔细听我说。总司令已出发去阻击刚在阿布基尔登陆的土耳其军队，不让他们打到这里来。他的命令不变。您留在开罗。您与蒙日和贝托莱一起协调研究院的工作。三角洲的考察继续。萨卡拉的发掘继续。*《埃及志》*的编纂继续。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英国人趁他不在时也登陆，您就把藏品撤往南方，撤往军队仍然控制着的上埃及。除了这些，您可以舍弃一切。清楚了吗？”

“清楚。”

“很好。现在出去吧。我还有事要做。”

德农关上门时，迪加已经俯身在他的地图上了。

波拿巴六月中旬从叙利亚返回，几天前又离开开罗前往海岸。德农留在开罗，和蒙日、贝托莱、傅里叶，以及留守的三十来位学者在一起。

波拿巴不在的日子里，德农组织研究院的工作。蒙日负责监督孟菲斯地区的考察。贝托莱撰写他关于泡碱的观察笔记。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继续在三角洲从事他的动物学研究。傅里叶则负责与各省分部的通信。

回来几天之后，德农召集了一次会议。所有在开罗的成员悉数到场。三十位学者和工程师挤在大厅里，窗户朝着酷热敞开。他在十点钟宣布开会。

“诸位先生，波拿巴在海岸，土耳其人已在那里登陆。我们没有确切的消息。英国人仍然控制着地中海。我建议我们准备一份运输方案，以备出现机会。”

蒙日举起手，不等别人让他发言就开了口。

“等波拿巴吧，得了！由他来决定，他向来都是自己拿主意，况且他喜欢别人等他……”

“要是他不回来呢？”傅里叶说，眼睛没有离开他那一列列数字。

无人作答。贝托莱摘下了眼镜。

“德农说得对。准备一个方案，从来没有让哪条船沉没过。哪天有了船，我们就有备无患。但愿有那一天。”

提议获得通过。会议于正午散会。

波拿巴从叙利亚带回的人不到一万，出发时是一万三千，其余的或死，或病，或染上了鼠疫。攻势失败了，研究院里人人都知道，只是没有人说出口。

几天之后，迪加召德农再次前往宫中。他面容憔悴，领巾松开，地图一直堆到了椅子上。没有问候。

“您的运输方案呢？”

“已经就绪，在纸面上。只缺船只。”

“那就只会停在纸面上。英国人仍然封锁着海岸。局势没变之前，不得运输。”

“明白。”

迪加已经回到他的地图前了。

接下来的几周很平静。考察继续。发掘也继续。*《埃及志》*的编纂缓慢地推进。夜晚，人们在平台上守望着海岸来的信使。

VI - 罗塞塔石碑

1799 年 7 月 15 日，一名叫布沙尔的工兵中尉在罗塞塔附近的朱利安堡监督拆除一堵旧墙。他的镐头碰到了什么东西。

布沙尔二十八岁，出身综合理工学院。他立刻明白这不是一块寻常的石头。那是一块黑色石碑，高一百一十二厘米，上面刻着三种并列的铭文。他命人把石碑搬进堡内妥善存放，通知了统辖该处的梅努将军；与他同出综合理工学院、当时正在罗塞塔的朗克雷，则写信告知开罗的埃及研究院。

堡垒远离日常的工地。石碑盖着一块帆布，靠着墙，在那里是安全的。

朗克雷的信一在研究院宣读，让-约瑟夫·马塞尔和雷米·雷热便被派往罗塞塔。马塞尔是东方学家，专攻闪米特语言。雷热是希腊学家，能流利地阅读古希腊文。从 8 月 1 日起，他们从各个角度审视了这块石碑。

希腊文位于石碑的下半部分，保存得相对完好。雷热高声朗读，马塞尔则在一旁做着笔记。

“这是一道褒扬年轻的托勒密五世的法令。免除神庙的赋税，向祭司阶层捐赠。这类东西总要用三种文字刻出来，以确保人人皆知。”

马塞尔把一张极薄的纸打湿，用一团蘸了稀释墨汁的棉球，将它轻轻按压在刻字的表面上。结果是每一个符号都得到一份精确的拓印，黑底白字。整块碑面拓完需要好几个小时。

朗克雷的信于 7 月 29 日在研究院宣读，信中提示这三段铭文是同一文本的三个版本，其中一种可以读懂。马塞尔和雷热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德农自一年前抵达亚历山大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狂热。倘若这块石碑能让象形文字得到破译，三千年的历史就将重新变得可读，连同两个世纪以来旅行者们抄录却不解其意的一切。

“诸位先生，”德农在宣读朗克雷来信的那个晚上对研究院说，“我们或许……不，我相信，我们正站在一场科学革命的黎明。”

蒙日提议向罗塞塔派出一支远征队。

“石膏模型！纸上拓片，能拓多少拓多少……还要快，朋友们，趁还没有人损坏它或把它搬走。”

若马尔与他们一同从开罗前来，在场看了最初的几次拓印。

罗塞塔石碑高一百一十二厘米，宽七十六厘米，厚二十八厘米。重量是根据体积和花岗闪长岩的已知密度估算的，约七百六十公斤。若马尔亲自量了这些尺寸，尽管它们一时还派不上用场，皮尺从一条棱拉到另一条棱，每个尺寸量了两遍。

石碑并不完整。上部缺失，在某个不确定的年代被人带走了。象形文字只剩下最后十四行，而且还有残损。象形文字部分大约有一半已经佚失，而世俗体几乎完整。这会给日后的破译者增添困难。但希腊文部分，尽管右下角有一处断裂，大体仍可辨读，这足以着手工作了。

“下面的希腊文，我们马上就能读，”马塞尔说，“这是孟菲斯祭司会议颁布的一道法令，时在托勒密五世埃庇法尼斯在位第九年。公元前 196 年。”

“那象形文字呢？”若马尔问道。

“多半是同一篇文字。我们也是这么期望的。”

“若真是如此，”若马尔说，“我们就可以着手建立对应关系了。每个希腊词都有它的象形对应物。比较符号组的长度，找出其中的重复……”

“我们要做的正是这件事。不过这项工作要花上好几年。”

若马尔拿起铅笔，在笔记本上开始记录象形文字带中某些符号组出现的频率。每一个符号都要找出来，数清楚，列入表中。分布并非随机的。

“您看。这一组符号被圈在王名圈里，在象形文字保存下来的部分中出现了六次。希腊文里托勒密这个词出现了十一次……但埃及文缺了一部分。”

马塞尔停下手头的工作，看了过去。

“有可能。甚至很可能。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对应未必是直接的。象形文字多半不是字母文字。”

“是的。但这是一个起点。”

若马尔在笔记本上把这个王名圈划了两道线。

若马尔帮马塞尔把最后一张拓印纸绷在世俗体部分上。夜已深了。油灯冒着黑烟。屋外，罗塞塔的港口沉睡着。

此后的几天里，若马尔在罗塞塔又来看了那块石头三次。第一次，他带来了皮尺，把凡是能量的都量了一遍。第二次，他带来了记录频率的笔记本，数着象形文字带中的符号组，制作了一张分布表。第三次，他什么也没带。他在石头对面的一只凳子上坐下。花岗闪长岩冰冷而黯淡。没有光泽，没有色彩。一块灰扑扑的石板，按通常

的说法，是丑的。他把双手平放在膝上，强迫自己不去计算。只是看。表面上，某些字母里还能看到凿子的痕迹。曾经有人把这些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刻出来，一刻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份劳作就在那里。它持续着。就像人望着一张地图，依旧不懂上面的文字，却看得出道路已被标绘其上。

他坐在那里，看出这块石头与委员会一年多来收集或试图收集的所有其他物品根本不同。*沙布提俑*，圣甲虫，纸草，浅浮雕的残块，人们拿走它们，因为它们美丽、稀有、古老。

石碑没有美感。它的价值全在于它所说的内容，即三种书写系统之间的一种对应，其中一种可以读懂，另外两种尚不能读。对于从事破译的人来说，一张尚且起皱的拓印纸，就抵得上这块石碑。

一尊*沙布提俑*一旦离开它的陵墓，便失去了与语境的联系。而这块石碑，取自一道防御工事的墙，却什么也没有失去。它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不再有语境了。

“您还在这儿，”马塞尔走进来说，“这是本周第三次了。”

“我在思考。被带走的东西总会失去些什么。这一块……我看不出它还能失去什么。”

马塞尔在他身旁坐下。

“除了被英国人拿走。”

“是的。除了这个。但即便如此，拓片还在。它所说的话还在。这也许是整个远征中唯一一件无法……真正偷走的东西。”

马塞尔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没有告诉任何人。

除了在罗塞塔制作的官方拓片之外，他又额外制作了三十份，不是为了研究院，也不是为了*《埃及志》*，而是为

了分发出去。他准备了其中五份给欧洲的通信者，一份寄往伦敦，两份寄往巴黎，一份寄往柏林，一份寄往哥本哈根，由一名返回法国的军官，也许是波拿巴的一名副官，带着穿越封锁线。五位研究古代语言的学者，也许能从中认出些什么。

另外二十五份他留作储备。倘若英国人拿走石碑，倘若破译要在伦敦完成，这些拓片也能让法国人同时开展工作。竞赛将势均力敌。

“您在打开锁之前，先把钥匙分发了出去，”德农得知此事后说。

“我分发的是钥匙的复制品。锁还留在这里。就算英国人拿走了锁，我们手里仍有复制的钥匙。”

这一发现的消息，继而马塞尔和雷热的归来，促成了研究院在 8 月 8 日召开的一次非常会议。所有在开罗的成员都赶来了。蒙日主持。德农展示了马塞尔的拓片和雷热关于希腊文的技术报告。

大厅里坐满了人。三十来位学者、工程师、博物学家。有些人已有数月没来参加过会议。罗塞塔石碑让他们离开了实验室，离开了工地，离开了在三角洲的考察任务。

报告结束后，贝托莱发了言。

“如果这块石头能使破译成为可能……我是说如果……我们就能读到三千年的档案。王表、战争的记述、宗教的典籍。我们一年多来所描绘的所有古迹上刻着的一切，都将变得可读。”

从不参与语文学争论的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举起了手。

“破译要花多长时间？大致说说。”

马塞尔从大厅后排回答。

“好几年。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象形文字不是字母文字。不能由一个符号直接得出一个字母。”

“但这是做得到的，”若马尔说，“我们有了对应关系。其余的就是工作了。”

一位桥路工程师沙布罗尔请求发言。

“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英国人登陆，这块石头会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他们知道它的价值。我们有对策吗？”

大厅里安静了下来。有人在后排咳嗽了一声。还没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得如此直截了当。

蒙日看着德农。

“拓片是可以带着走的，”德农说，“马塞尔已经为欧洲准备了五份。我们这里还有二十五份备用。如果英国人拿走石碑，破译就会在巴黎凭这些拓本来进行。”

“要是连拓片也丢了呢？”

“那我们就输了。”

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但这是唯一可能的回答。军事局势不在他们掌控之中。而蒙日已经把墨水瓶拉到了自己面前。

蒙日起草了一份正式决议，内容是罗塞塔石碑应尽快运往开罗，保存在研究院并受到长期看守，按需要随时拓印复制，并由马塞尔和雷热优先研究。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散会之后，德农留了下来。他正帮着收拾椅子，傅里叶拿着一叠文件走了进来。

“您看过最新的急报了吗？”

“没有。”

“亚历山大的克莱贝尔一直在要求增援。没有人回复他。自从叙利亚之后，所有人都装作……装作军队已经缓过来了。”

德农放下手里的椅子。

“而我们，我们却找到了象形文字的钥匙。”

“是啊。两条曲线。科学在上升，而远征在崩塌。”

傅里叶说这话并无苦涩，如同在念一份统计表。

德农回到拓片前。他把它们铺在研究院的大桌子上。上为象形文字，中为世俗体，下为希腊文。他用手指沿着象形符号的那一行划过。鸟、蛇、眼睛、手。这些形状他在丹德拉、底比斯、菲莱已经抄过上百遍，却从不知道它们说的是什么。

他想到了波拿巴。6 月已从叙利亚回来，也许已把目光转向法国，却不知道他的学者们刚刚找到了两千年来无人找到的东西。

8 月 9 日，若马尔整天都与拓片为伴。他带来了吉萨和萨卡拉的勘测笔记本，上面满是他前几个月画下的王名圈。他在这里重提早在罗塞塔就已记下的假设，即王名圈里写的是名字，这一假设自十八世纪起便在旅行者中流传。

这一次，他可以拿实物来验证了。

罗塞塔的统计依然成立，希腊文中十一个托勒密，残损的文字带里六个王名圈。他把这一对应整理誊清，记在笔记本中：“假设。王名圈等于专有名词。若得证实，则埃及各处古迹上的所有王名圈所载皆为法老或神祇之名。”

一年前，这个想法还散见于游记之中；如今它凭着一份统计，落在一页被煤烟熏污的笔记本纸上。

考察仍在继续。石碑并没有使其余的一切停下。

战争也没有停下。

8 月 10 日，一名军官来到研究院，宣布 7 月 25 日阿布基尔战役的正式战果。波拿巴在阿布基尔海滩上击溃了奥斯曼人的登陆部队。一万名耶尼切里被杀或溺亡，其余被俘。叙利亚失利之后，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东方军团守住了埃及。但阿布基尔无论多么辉煌，也改变不了这支军队的孤立处境。

德农是听克莱贝尔说起这个消息的，克莱贝尔当天专程从亚历山大赶来。

“波拿巴要回来了？”

“是的。几天之内。也许更快。他没有写下任何明确的东西。但军队已精疲力竭。这一点是确定的。”

“然后呢？”

“然后再看。要么他巩固埃及。要么他回法国去。”

克莱贝尔没有说出第三种可能。波拿巴也可以继续在无谓的战役中损兵折将，直到东方军团什么也不剩。

克莱贝尔看着摊在研究院桌子上的拓片。

“这就是你们的那块石头？”

“就是它。”

“它写的是什么？”

“一道关于神庙赋税的法令。与军事无关。”

克莱贝尔笑了。

“你们靠一篇讲赋税的文字，找到了古埃及的钥匙。我喜欢这个。”

他当晚便动身回亚历山大。德农再也没有见过他。

8月12日，罗塞塔传来消息，称石碑已准备好运输。布沙尔监督造了一只加固的木箱。军事车队已安排妥当。预定14日出发。

德农给布沙尔写了一张便条：“尽可能走水路。避免道路的颠簸。若必须陆运，须最大限度减震。石碑不得有丝毫裂缝。”

布沙尔次日回复：“水路不可行。所有的船只都被征用来运送阿布基尔的伤员。陆运，箱底加垫稻草。路程三天。预计8月17日抵达。”

8月17日晚，车队驶入研究院的院子。十五名护送士兵，三辆大车。石碑在第二辆车上，裹着帆布，缚在一层稻草上。

德农、马塞尔、若马尔和六名士兵把它卸了下来。七百六十公斤。要用撬棍、绳索，还有一道临时搭的斜坡，外加几句咒骂。整个过程花了一个小时。最后，石碑安放在研究院主厅东墙边的一个木座上。

马塞尔揭去帆布。黑色的花岗闪长岩显露出来，三条刻着文字的带子清晰可见。

“没有一道裂缝，”若马尔一边检查表面一边说。

人们把它安置在一盏长明的油灯下。两名卫兵日夜站岗。没有书面命令。人人都明白，这块石头不能消失。

次日清晨，德农又来看这块石头。他独自一人。研究院还在沉睡。灯在花岗闪长岩上投下昏黄的光。象形文字在凹槽里投下细小的阴影。

他把手放在冰凉的石面上。这个动作毫无用处。但他还是做了。

总有一天，会有人像读希腊文那样读懂这篇文字，法老的名字将从王名圈里走出来。

他收回了手。

VII - 谈判、胜利与克莱贝尔之死

8月18日晚上，德农偶然看见波拿巴独自穿过研究院的院子。没有副官，没有护卫。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是一本书，不是地图。他走得很快，像是不愿被人看见的人。

德农从一扇门的门框后面观察他。那个匆忙的身影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急迫，近乎逃跑，与其说是躲避危险，不如说是逃离一种对他而言已变得太过狭小的处境。

他在院子的拐角处转弯，消失了。

德农想到了波拿巴手中的那本书。想必与罗马有关，或者与亚历山大有关。

一个小时后，一名副官来找德农。波拿巴下午看过他的图稿，想带他一起走。德农把图稿卷进四只铜管，将自己箱子的钥匙交给若马尔，与蒙日和贝托莱一同坐进了四轮马车。那一夜，有几个人看见他们离去。另一些人听见马蹄声向北远去。

次日清晨，消息得到了证实。波拿巴已动身回法国。他派人给克莱贝尔送去一封信，把埃及军团的指挥权移交给他。蒙日、贝托莱和德农随他一同走了。他们将在8月22日至23日的夜里于亚历山大登上两艘护卫舰中的一艘，德农将于10月9日带着他的图稿在弗雷瑞斯登陆。几乎没有人事先得到通知。

那天早晨，若马尔最先想到的不是波拿巴，也不是法国。而是那些箱子。存放在哈桑·卡希夫宫附属建筑里的九十六只箱子。七十三只是官方登记的，二十三只没有标签，放在西北角，仍在那里，仍然没有名目。没有波拿巴下令军事运输，这些箱子便任凭日后任何一场谈判摆布。

他在日出之前把附属建筑巡视了一遍。箱子都在，堆叠着，钉好了，按他的体系贴了标签。一个字母，一个编号，一份简要的内容说明。

这些物品来自各处，萨卡拉，卡尔纳克，丹德拉，国王谷，孟菲斯的集市，吉萨。有些是依照既定程序取得的。另一些是在随军而行的集市上买来的。还有一些经由记录较少的途径而来。合在一起，它们代表着十三个月有组织的掠夺、偶然的掠夺、被容忍的掠夺以及科学的采集，而这几类事，从来没有人正式厘清过。

波拿巴走了，这些区分连在政治上也站不住脚了。随他一同烟消云散的，是那项国家计划所赋予的正当性，正是它让攫取显得合法。剩下的只是一些物品、一些士兵、一些学者。还有迟早要逼近的英国人。

他收好清单，在一只箱子上坐下。他周围，在半明半暗之中，是九十六只箱子。他一直坐到天光从门缝下透进来。

克莱贝尔如今统率埃及军团。波拿巴小心翼翼地避免当面告诉他自己要走。

马塞尔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他有他的拓片，波拿巴在不在，丝毫改变不了什么。科斯塔兹问傅里叶，委员会的工作是否继续。傅里叶说继续。科斯塔兹没有任何评论。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得知消息时正俯身于他的解剖，手中的解剖刀没有放下。“走了？随他吧，”他头也不抬地说。对他而言，案头那件东西胜过其余的一切。

“他利用了我们，”科斯塔兹那天早晨对每一个愿意听的人说，“我们的工作……不过是一块招牌，仅此而已。他得到了想要的，就走了。而我们，留下来了。”

宣布离去消息的当天下午，傅里叶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找到了独自一人的科斯塔兹。

“您在工作吗？”

“没有。”

“他本可以先知会我们一声，”科斯塔兹说，“我在巴黎有一家老小。我答应过他们只去几个月。如今已经十五个月了。而他自己倒是回去了，而当……”

他没有把话说完。嫉妒与此毫无关系。他曾相信科学为共和国服务，共和国为科学服务，如今他发现，自己不过是被当作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当晚，科学与艺术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无人召集。学者们仿佛出于某种集体的本能，不约而同地聚到了研究院。到场的有傅里叶、马塞尔、若马尔、科斯塔兹、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以及其他十来人。孔泰最后一个到。

局面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既然波拿巴已经离去，由克莱贝尔掌权，接下来会怎样？

克莱贝尔与委员会的关系，和前任不同。在叙利亚战役之前，若马尔曾就藏品的地位问题探过他的口风。克莱贝尔说他会研究一下。

“说研究，就是根本没放在心上。”若马尔说。

“克莱贝尔有三桩心事，”傅里叶一边说，一边掰着手指数，“一支军队要维持，奥斯曼人要提防，地中海上还有英国人。藏品嘛……排在后面。”

“那它们就必须是我们的，”若马尔答道，“否则，别人就会来决定它们的命运，而且不会依据清单。”

桌上摆着九十六只箱子的总清单，是若马尔传阅下去的。众人默默地读着。神庙的名称，器物的类别，重量的估算。委员会第一次在同一份文件里，看到了自己所收集的全部。

无人置评。科斯塔兹翻页比旁人更慢，手指停在重量那一栏上，如同在读一份掠夺的清算。

“我们必须确定运输的先后次序，”若马尔说，“一旦撤离，不可能全部带走。得有个轻重缓急。”

“纸莎草文献和抄录的铭文，”马塞尔说，“无可替代。”

傅里叶迟疑了一下，才提出那个问题。

“那么，仓库西北角那二十三只没有标签的箱子呢？”

若马尔和马塞尔对视了一眼。

“我记下了它们，”若马尔说，“但我不知道它们归谁。”

“我也不知道。”马塞尔说。

会议结束了，这一点上没有作出任何正式决定。学者们回去继续各自的工作。清单留在桌上。那二十三只无名的箱子仍留在仓库西北角的黑暗里。

克莱贝尔则认为，他的前任是为了逃避承担投降的责任而溜走的；在 1799 年 9 月 26 日呈给督政府的报告中，他责备前任没有在金库里留下一个苏。

从研究院看去，军事局势似乎已无出路。法军控制着埃及，却与法国断了一切联系。英国舰队封锁了地中海。克莱贝尔明白，他既无法无限期地坚守，也无从指望援兵。他作出了波拿巴不敢作出的决定，并开始谈判撤军。1799 年 12 月，克莱贝尔派出一名使者，前往驻扎在叙利亚的奥斯曼大维齐尔处。谈判在英国战舰“老虎号”上开始，地点在达米埃塔附近海域。英方谈判者是海军准将西德尼·史密斯，他自称是王室全权代表，这一职权不久便将遭到基思海军上将的否认。法方全权代表是德塞将军和行政官普塞尔格。法方的条件很明确，军队携带武器辎重，体面撤离。史密斯同意先处理紧迫事项，即撤

出伤员和学者，并在奥斯曼全权代表到来之前休战。谈判拖延不决。克莱贝尔催促他的谈判代表尽快达成协议，1800年1月24日，《阿里什协定》签署。协定规定，法军须在三个月内全部撤离埃及，可携带武器、辎重和科学藏品。法军将逐步放弃阵地，自三角洲以东开始，至亚历山大结束。开罗至迟须在第四十五天撤空。消息于1月28日传到开罗。当天，协定正式颁布。对学者们的影响立竿见影。

“诸位先生，”克莱贝尔在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说，“我已与奥斯曼人谈妥了我们的归程。三个月后，我们就会回到法国。打包你们的藏品。分拣吧。”

若卢瓦一连数日都在分拣、包装，手指被灰尘和稻草染得灰蒙蒙的。青铜雕像，彩绘木质和釉砂的小像，护身符，纸莎草文献，钱币，珠宝。每一件都编了目，作了描述，用亚麻布裹好。他干得很快，仿佛有人会把这段时间收回去。二十个月来第一次，归程变得真实。箱子从库房里搬了出来。标签也写好了。罗塞塔石碑用好几层帆布包了起来。傅里叶一直密切关注着谈判，他带着协定文本回到开罗，在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高声宣读。读到保障藏品的条款时，一阵如释重负的低语传遍了会场。

“这就是说，罗塞塔石碑、纸莎草文献、拓片，我们收集的一切，都能随我们回到法国？”马塞尔问。

“协定保证如此，”傅里叶说，“条款是……明确的。当然，前提是英国人接受其条款。”

傅里叶已编出一份完整的清单，登记在册的器物共二百一十七件，其中一百三十八件具有直接的博物馆价值，七十九件具有科学文献价值。这二百一十七件构成了九十六只箱子的核心。他按轻重缓急作了排序，因为他知

道，若运力有限，就必须取舍。第一优先，若马尔的测绘图稿，无法重做，至多二百公斤，装入防水箱。若卢瓦的笔记本，装在铜管里，另加五十公斤。第二优先，小件器物，*沙布提俑*、圣甲虫、护身符、纸莎草文献。体积轻，单位重量的价值高。第三优先，马塞尔的拓片。第四优先，若弗鲁瓦的博物学藏品，笨重，易碎，占地方。第五优先，研究院的大件，花岗岩雕像，中等大小的石棺。

希望持续了将近七个星期。1800年3月，消息传来。英国人拒绝批准协定。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乔治·基思·埃尔芬斯通海军上将宣称，西德尼·史密斯越权行事，协定无效。基思要求无条件投降。法军必须放下武器，成为战俘。克莱贝尔召集众将。他高声宣读了基思的信，然后把它放在桌上。

“诸位先生，对这样的狂妄，只能用胜利来回答。准备战斗吧。”

行李又拆开了。箱子重新搬回研究院的库房，若马尔又清点了一遍。有三十三只不见了，在军队辗转迁移的过程中遗失、毁坏或失散；剩下六十三只。标签仍贴在上面。这些东西不再启程，要等到下一次启程的机会，或者等到那场把它们送给英国人的投降。英国人和奥斯曼人都认为东方军团太弱，无力抵抗。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统率一支军队向开罗进发，据估计兵力在四万到八万之间。在开罗城内，居民应他的号召起事了。

纳西夫帕夏率奥斯曼先头部队，带着五六千名耶尼切里和数千骑兵占领了马塔里耶村，并以十六门火炮加固阵地。克莱贝尔只有一万人。1800年3月19日至20日夜间，他将部队推进到开罗前方，在河的右岸布阵，小小军队

的四个旅各自结成方阵。3月20日拂晓，法军在赫利奥波利斯废墟附近发起进攻，那里距开罗约十五公里。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法军方阵顶住了一切冲锋。法军炮火击溃了奥斯曼的阵线。下午将尽时，奥斯曼军队土崩瓦解。大维齐尔带着残部逃往叙利亚。法军死伤约六百人。奥斯曼人在战场上留下了九千具尸体。克莱贝尔回到开罗，镇压了叛乱。炮击持续了数日。数以百计的平民死于战斗。4月21日，该城投降。赫利奥波利斯的胜利巩固了法国人在埃及的地位。穆拉德贝伊在与奥斯曼人分道扬镳后转入沙漠，没有参加战斗；4 月，他与克莱贝尔签订协议，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上埃及总督。埃及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地掌握在法国人手中。克莱贝尔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在研究院，人们接着先前中断的地方继续工作，而箱子仍留在原处。

“趁着还能工作，我们就多做些，”傅里叶在随后的每周例会上一再说道，眼睛没有离开手中的纸页，“写下来的东西，是抹不掉的。”

克莱贝尔曾与奥斯曼人谈判，试图让军队回国，失败了，又重新开战。学者们很少见到他。他偶尔来研究院，听听汇报，便回他的司令部去了。

军事局势稳定了下来，却并未好转。军队守住了埃及，却既不能前进，也无法离开。英国人封锁着地中海。法国远在天边。这场远征，已变成了一支驻军。

1800 年 6 月 14 日清晨，克莱贝尔检阅了希腊军团，随后来到开罗，察看他在艾兹白基耶的总部埃尔菲贝伊宫的工程。在去视察之前，他出席了总参谋长、他的挚友达马将军家的午宴。研究院的成员和军官们都聚在这场午宴上。克莱贝尔比往常更为欢快。他的努力有了成效，法国人的各项机构蒸蒸日上，居民对他表达着爱戴，这

一切驱散了他平日的冷淡。他兴致勃勃，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知道，那是他的最后一餐。

下午两点，将军只由军队建筑师普罗坦陪同，前往他的宫殿。要到那里，他沿着一条长廊走去，廊上浓密的葡萄藤投下荫凉，长廊连接着总参谋长的住所和总司令的住所。他同普罗坦谈论着自己计划的美化工程，并下达命令，要修整总部和花园，抹去上一次暴乱留下的弹痕。

一个名叫苏莱曼·哈莱比的年轻叙利亚人，从早晨起就藏在宫殿的花园里。他二十四岁，在爱资哈尔清真寺研习神学，已经观察克莱贝尔的宫殿一个月了。他在吉萨弄到了一把匕首。他扮作乞丐，在一口废弃的蓄水池旁等候。

克莱贝尔和普罗坦走进长廊时，苏莱曼从藏身处钻出来，从背后走近，将匕首刺进了将军的心脏。

克莱贝尔倒下了，高喊“救命，我被人暗杀了！”

普罗坦举着手里的小手杖扑向刺客。他试图挡开刺击，自己身中六刀。苏莱曼任他昏死过去，转身回到已倒在地上的克莱贝尔身边，又刺了三下。第一刀便已致命。将军几分钟后死去，没能说出一句话。

警报传开了。卫兵，军官，几个小时前还与克莱贝尔一同为共和国举杯的那些人，都围拢在他身边，想从他口中听到只言片语。他们徒劳地询问着他。人们把遗体抬进总参谋长的住所。

士兵们在宫殿和花园里四处搜查。两名卫队骑兵带来一个年轻人，他们撞见他藏在一丛茂密的仙人掌下。普罗坦不顾伤势，已经苏醒，认出了刺客。苏莱曼被投入监狱，同时入狱的还有大清真寺的三位乌里玛，他们事先知道他的计划，却没有告发这次行刺。

全军陷入深深的惊愕，很快又转为愤怒。全城骚动。店铺关了门。法国士兵怒不可遏，失魂落魄，在街上游走，向四周投去威胁的目光。那一夜很难熬。

次日清晨，消息传到研究院。傅里叶立即召集会议。十六位学者在厅中聚齐。人们很少说话，也只是低声交谈。有人让通向院子的门开着，没有人起身去关。

傅里叶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

“克莱贝尔死了。梅努将军是资格最老的师长，接任指挥。我们对他了解不多……我是说，作为统帅。克莱贝尔以他自己的方式，尊重波拿巴关于我们工作的命令。梅努与我们没有这层联系。”

若马尔没有等待。

“我们的藏品已入库，我们的测绘图稿已归档。若梅努决定让它们留在埃及，或认为它们已不再具有军事意义，我们就白白损失了两年的心血。”

马塞尔这时缓缓说道。

“记录工作已近完成。如今要紧的，是把一切带回法国。要是这些东西在此地散失，被拿到市场上转卖，我们所做的一切……”

傅里叶站了起来。

“我们继续。能做完的，我们都做完。”

学者们回到各自的工作中，不知道梅努将作出怎样的决定。

苏莱曼·哈莱比在酷刑下受审。他供认，自己受到了奥斯曼军队耶尼切里长官的怂恿。他曾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四位乌里玛，他们劝阻过他，却没有告发。军事法庭判处他们全体有罪。苏莱曼的右手被火烧

灼，随后被活活穿刺而死。他痛苦了四个小时才断气。三位乌里玛被斩首。第四位被缺席判决。

葬礼很快举行。傅里叶代表研究院，为这位受人哀悼的英雄致悼词。

士兵们争相抛掷柏枝与桂冠编成的花圈。公开的葬礼结束后，一小群人，大多是军官，悄悄聚集在亡者的墓旁。他们是共济会“伊西斯”分会的成员，克莱贝尔曾是该分会的会长。委员会的一位学者也加入了他们。他虽不是军官，同样是共济会员，隶属于巴黎的“*完美联合*”分会。他是在场唯一的平民。蒙日本可以在场，但他已随波拿巴逃走了。他们取出围裙，翻到专用于丧礼的黑色一面。他们拍手三下，念出仪式的套语“悲叹吧！悲叹吧！悲叹吧！”紧接着便是传统的欢呼击掌，“但要怀抱希望！怀抱希望！怀抱希望！”一枝金合欢被放在墓上。他们的兄弟已归入了*永恒东方*。

雅克-弗朗索瓦·梅努将军，师长，资历仅次于克莱贝尔，正式接掌了埃及军团的指挥权。

第三章：学者的时代

I - 最后的几场战役

指挥权的更迭，丝毫没有改变研究院的工作。

考古勘察在整个三角洲和下埃及继续进行。藏品更加丰富，也整理得更有条理。发表在*《埃及旬刊》*上的科学论文仍按期刊出。

梅努将军的性情与前任截然不同。他自称以法阿联盟的名义治理埃及，而这种联盟在政治上并无任何现实基础。军官们对他的敬重不如对克莱贝尔，追随他出于纪律，而非信服。梅努已皈依伊斯兰教，取名阿卜杜拉，并娶了一位名叫佐贝伊达的埃及女子。学者们自 1798 年的战役起就认识他，却从未见过他以总司令的身份发号施令。

起初，对学者们来说，梅努比克莱贝尔更爱干涉，也更无用处。他想把他们的工作引向那些服务于他的政治的题目，而他的当务之急与他们的几乎毫无共通之处。

傅里叶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既能与梅努共处，又不使自己受牵连，即让他的名字与几项小的发现和出版物联系在一起，定期呈交技术性强到无法读懂的报告，同时不动声色地继续真正重要的工作，而不让总司令知情。

“这是外交手腕。”傅里叶向若马尔解释了他的策略后，若马尔说。

“这是求生。”傅里叶答道。

学者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勘察。

埃及研究院继续举行定期例会，只是气氛已不同于头几年。发言不再那么热情，辩论也不再那么活跃。学者们承受着久居异乡的重负，对这个国家，他们既没有掌握通行的语言，也没有领会文化上的微妙之处。

傅里叶竭力保持学术上的锐气。他提出供大家共同思考的题目，组织朗读古代文献，让同事们记起自己身处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些努力并非徒劳。在这些艰难岁月里提交研究院的好几篇报告，后来都成了重要的科学论文。

六月中旬的研究院例会，是自波拿巴离去、克莱贝尔身亡以来最热烈的一次。

傅里叶特意提出了一个抽象的题目——文明中的记忆观念——讨论很快便越出了学院的界限。

若马尔第一个发言。他二十二岁，带着那种年轻又总是有理的人所特有的、令人恼火的严谨。

“一个忘记了自己度量标准的文明，注定要从头再来。古埃及人三千年间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度量。整整三千年。这或许正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定义。不在于其纪念建筑的宏伟，而在于它能在多长的时间里传承知识而不使之走样。”

马塞尔提出了异议。

“纪念建筑恰恰是传承得以实现的凭借。没有卡尔纳克，没有金字塔，若马尔的那些测量什么也传不下来。物质的载体与它所承载的知识是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才来到这里，”若马尔反驳道，“就是要用一份更便于流传的文献来取代纪念建筑。”

傅里叶听着，没有插话。他在想，如果军队明天投降，他们的工作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如果我们不得不仓促撤离，您的测绘图稿是否处在可以复制的状态？”

“从亚历山大起，我就留着双份副本。船若沉了，至少还有一份存活。”

傅里叶看了他片刻。这个年轻人明白，在军事行动中，只存在一份的工作已经丢了一半。

“您应该把这话讲给别人听。”

“我讲过了。多数人觉得太过头了。”

“多数人错了。”

傅里叶想到了英国人。他不知道他们会派谁来，却知道他们必会派人来。对岸的某个人，同样在准备着自己的清单。

那天晚上，若马尔独自留下，誊抄他的测量笔记。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灯冒着烟。城市的喧嚣透过百叶窗传来。宣礼员在召唤祈祷。若马尔什么也没听见。他在抄写。他有时想，在这里，誊抄是他做的唯一可靠的事。绘图和测量可能出错，但忠实的誊抄不会错。一份准确的副本，能比原件活得更久。自亚历山大以来，每一项测量要么有两份，要么就等于不存在。第一份在野外笔记本上，站着写成，在风中。第二份在这里，在桌前，经过复读、核对，写得清晰可辨。

1800 年 6 月 25 日，若卢瓦与若马尔、若弗鲁瓦和两名绘图员再度出发，前往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勘察第二十一王朝法老古都的遗迹。

他们发现了一片辽阔的废墟。零散的土丘之下，沉睡着层层叠压的数个世纪的城市。花岗岩石块。雕像的碎片。上埃及的沙土保存下来的东西，在三角洲却被吞噬了。这里没有一处像卡尔纳克。没有一处像丹德拉。这是褪去了布景的埃及。只有物质本身，散落着，看不出秩序，却依照一种唯有发掘才能揭示的逻辑组织着。若卢瓦提醒说，斯特拉波提到过这个遗址，但自希腊人以来，还没有人尝试过对此地作系统的测绘。“那是因为谁也不知

道这里有这么多可看的东西。”若马尔补充道。若卢瓦一连画了三天，直到夜幕降临才停笔，并绘制了整个遗址的地图，标明每一块重要石块的位置。

遗址入口处，一名古董商背着褡裢在等候。那人名叫苏莱曼·盖巴尼，从开罗而来，听说委员会将前往塔尼斯，前一天便上了路。他并不特意等谁，只等一个懂得该买什么的人。

若卢瓦在那些物件前停下脚步。其中两件*沙布提俑*是真品，从包浆和铭文上看得出来。他买下了一件。

离开塔尼斯，探险队转向布巴斯提斯，向西南两天的路程。那是猫女神巴斯特的圣城。神庙遗迹的规模令人叹服。希罗多德曾把它描述为埃及最壮丽的神庙之一，每年的节庆吸引着大批人群，看到遗址之广阔，这话是可信的。

十米高的粉红色花岗岩柱横卧在沙地上，圆柱的柱身在坍塌时断成了数截。浮雕的残片散落一地，有祭司的行列，有节庆的场面，有程式化的神祇。晚期埃及的风格。

神庙四周，是一片圣猫的墓地。石灰岩的廊道里有数以千计的木乃伊。与对待人类一样精心，泡碱，裹布，木制或青铜的棺。

若弗鲁瓦打开其中一具木乃伊，发现遗体保存得极好，皮，毛，骨，筋腱，在埋葬两千年之后仍完好无损。是一只体型寻常的家猫。

盗墓者早已来过。墓坑被掏开，木乃伊四散，裹布的碎片撒在石灰质的地面上，宛如一层褐色的雪。

盗墓者在猫的墓地里要找的，是随木乃伊一同放入的釉砂或金制护身符，以及青铜的小棺——那是蹲坐的猫的形状，耳朵竖起，眼睛镶着玻璃。这些棺即刻就能卖出

价钱。亚历山大的商人们一个世纪以来都把它们转卖给欧洲的旅行者。盗墓者留下了木乃伊本身，护身符被剥去之后它们便一文不值；也留下了普通的石灰岩棺，太重也太常见，不值得搬运。

若弗鲁瓦挑了六具保存完好的猫木乃伊。他用干净的亚麻布把它们包好，作了标记。对他而言，这是动物学标本，是古代埃及的动物群，可与自然史博物馆动物园里的活体相比较。他想到居维叶见到它们时会说什么，他会从中看出物种固定不变的证据，猫在两千年里毫无改变。又想到另一位博物学家会说什么，那人敢于认为，两千年在变化的尺度上算不得什么。对留下它们的盗墓者来说，它们是取走护身符后的废物。对埋葬它们的巴斯特祭司来说，它们是献给女神的供品，注定要永远留在那里。

若卢瓦在墓地里发现了一具半埋在土中的小青铜棺，是蹲坐的猫的形状。高二十厘米。尾巴盘回到前爪上，是埃及猫特有的姿势。在傍晚的斜照下，面部的轮廓清晰浮现，锈蚀也遮不住它的精确，两颊的肌肉，鼻梁的棱线，紧闭双唇的线条。

棺是空的。若卢瓦把青铜在手里翻转。底座上用凿子刻着一行象形文字。大概是献祭者的名字，那位把这只猫献给巴斯特的女子或男子，或为求一份恩典，或出于寻常的虔诚。一个日后会有人读出的名字，倘若这件青铜器能到达巴黎的话。一个自第二十六王朝以来便一直在泥土中等待的名字。

他把它放进了挎包。它重三百克。在亚历山大，也许值二十皮亚斯特，前提是找到一个喜欢埃及青铜器的英国买家。对科学而言，它将无价，倘若这个名字有朝一日

能被读出。若卢瓦明白，这两笔账永远不会合拢，而他自己那只刚刚拾起青铜器的手，也于事无补。

傍晚，若弗鲁瓦带着装有六具木乃伊的箱子，回到营地与若卢瓦会合。夜幕降得很快。他们坐在火堆前，把各自的发现摆在两人之间。若弗鲁瓦在合上箱子之前又检查了一遍木乃伊。他一整天都在决定哪些可以带走，哪些必须留下。

“你打算拿它怎么办？”若弗鲁瓦望着青铜器问。

“带走。画下来。作描述。等卢浮宫有了埃及部，就交给它。”

“如果投降时英国人把它拿走呢？”

若卢瓦把青铜器放进挎包，压在他的笔记本下面。他没有回答。他们两人都知道。若投降真的来临，这件青铜器就会去伦敦。进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展柜。

探险队于 8 月 12 日回到开罗，在三角洲共待了七个星期，带回了塔尼斯、布巴斯提斯的图稿——这些遗址在考古上令人失望，却都已有了文献记录。

“孔泰把埃及变成了他的实验室，”若卢瓦对傅里叶说，“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观察、实验、改进到哪里。这次远征最持久的实际收益，或许要由他来获得。”

尼古拉-雅克·孔泰已成为远征军中公认的发明家。气球，磨坊，制造工场。这位前气球飞行员不画神庙，他解决的是勘察神庙时遇到的难题。

另一些学者，抵御沮丧的能力较弱，把活动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有几位病倒了。慢性痢疾、热病，以及沙尘和烈日引起的眼炎，在委员会的队伍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好几个人没等到回国就死在了埃及。

1800 年夏末，若卢瓦组织了新的勘察，前往东部沙漠。这些地点与他之前走过的各处不同。这一次，他想探访隐没在沙漠悬崖间、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科普特修道院。

1800 年 9 月 15 日，若卢瓦与若马尔和三十名骑兵护卫一同向东出发。东部沙漠干旱而多石，行了三天。

9月18日清晨，探险队抵达圣安东尼修道院，自四世纪起便有人居住于此。

科普特修士们带着戒备与好奇迎接来客。约五十名身着黑袍的隐修士，过着极度赤贫的生活，他们一言不发地打量着这些巴黎来的学者。

“神父，”若卢瓦通过委员会的译员哈桑对院长说，“我们不是来拿走你们的手稿的。我们只想看看它们，如果您允许，再抄录下来。”

院长听完，退下去一个小时。回来时带着一个条件。他们可以参观图书馆，但未经他的许可，修道院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得带出。

修道院的图书馆占着一间拱顶的小厅。科普特手稿——有些已有数百年之久——保存在木箱里。

“看这一份，”若马尔低声说，“一部双语的诗篇，左边是希腊文，右边是科普特文。一行对一行。若能对照这两栏，就开始能读了。”

他翻阅着手稿。科普特字母是圆形的，源自希腊文，另有七个从世俗体借来的符号。若马尔用指甲尖点着，数了两遍。

“您愿意把它卖给我们吗？”若卢瓦说，“或者允许我们抄录？”

院长摇了摇头。

“这份手稿属于我们修道院已有几个世纪了。我们的神父们世世代代把它保存下来。它不会离开这里。”

他没有提高嗓门。双手平放在木箱的盖子上。

若卢瓦接受了条件，花了三天抄录这部科普特文与希腊文对照的诗篇。工作细致入微，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而文本的两种语言，他只懂一种。他带着抄本离开，最后几页的墨迹还未干透，指望日后总有人知道该拿它做什么。

若卢瓦抄写诗篇的时候，若马尔在周围的悬崖间勘察。他发现了一些洞穴，曾是最初几个世纪隐修士的居所，洞壁上布满了用尖物刻出的涂鸦，有名字，有日期，有祈祷文。

“这些洞穴让我不安，”若马尔说，“有人在这里独自生活了好些年，只是祈祷。别的什么也没有。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观啊……”

他顿住了。他想着那些涂鸦，那些隐修士刻在岩石上的名字，他们并没指望有人来读。他自己花了两年记录测量数据。

“他们的苦修自有其一贯性，”他接着说。“那是对永恒的一次押注。我们的……总之，是对科学的押注。用的是别的手段。”

9月21日，探险队启程前往圣保罗修道院，在东面约三十公里处。图书馆更大。若卢瓦抄录。若马尔测量。

探险队于 9 月 29 日返回开罗，带回了科普特手稿的抄本，以及修士们同意出售的几件基督教艺术品。木板圣像，青铜十字架，银制香炉。若卢瓦将它们登记造册。

“这些科普特器物是缺失的一环。科普特人直接源自古代埃及人。他们的语言来自法老时代的埃及语。研究科普特语，就是从下面靠近象形文字。”

II - 三角洲与城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努对学者们显得更为友善。克莱贝尔之死，在宫殿的走廊里留下了一个空缺，学者们的忙碌至少在表面上填补了它。梅努提供护卫，拨付经费，偶尔还出席研究院的会议。

德塞在马伦哥阵亡的消息，十月初传到了开罗。若卢瓦是在办公室里得知的。三月已返回法国的德塞，曾是这次远征中最好的同伴。是他让学者们安心工作而不去催逼，也是他亲自带着一种若卢瓦在其他任何将军身上都没见过的专注，端详过那些神庙。

消息是由一名奥斯曼信使带来的，事发近四个月之后。德塞于 1800 年 6 月 14 日在马伦哥阵亡。与克莱贝尔同一天，相隔数千公里，他率领自己的师发起冲锋，要扭转一场波拿巴以为已经败了的战役。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他当场死去，年仅三十一岁。

若卢瓦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没有点灯。光线渐渐暗下去。他任它暗下去。窗外，开罗依旧传来傍晚时分的喧闹。小贩的吆喝，远处的宣礼员，园子里转动的萨基耶水车规律的声响。他在笔记本里翻找随德塞远征上埃及时记下的笔记。两本半笔记本，两面都写满了。丹德拉，底比斯，国王谷，菲莱。页边上，德塞偶尔也有批注。全是实际的问题。发掘这个遗址要多久，挪动这块石头要多少人，这种砂岩抗潮湿的能力如何。

这些批注当时曾惹恼过若卢瓦。一位将军站在丹德拉面前问的是后勤问题，他觉得这是把事情看窄了。他借着

渐暗的天光重读这几页，纸页在敞开的窗口吹来的穿堂风里微微作响。德塞的字迹很小，整齐，向右倾斜。如今他换了一种方式重读。德塞看的是和他同样的东西，用的是同样的眼睛，并且自问它们将来会怎样——如何保护它们，若什么也不做，它们还能撑多久。

他还想到了德塞的私人笔记本。将军自登船以来，一直写着一本战地日记。若卢瓦好几个晚上都见他在宿营之后，借着一盏提灯，手里拿着它。他不知道德塞在里面写了什么。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笔记本想必已随他的遗物回到了法国。或者留在了战场上。或者被某个人拿走了。若卢瓦自己的行李里，有一把德塞 1798 年 12 月借给他的折刀，他从没想过要还。一把普通的刀，木柄，短刃。近两年来，一直用它削铅笔。他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了。还给谁呢？他把它留在了行李里。

没有人知道，一个战死之人的笔记本会被如何处置。德塞没有收藏。没有装满*沙布提俑*和圣甲虫的挎包。只有军中的文书，那种会被人收回、遗失、卖掉或烧毁的东西。

若卢瓦继续筹划新的勘察。这一次是三角洲西部的遗址，与初夏时走过的各处不同。塞易斯，布托。平坦的土丘，几乎没有什么可见的遗迹。

10 月 15 日，他与若马尔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出发。十二天里穿行在耕作的平原上，寻找北方法老大城的遗迹，也寻找浮雕上所表现的动物物种。若弗鲁瓦有博物学家的方法——绝不在书斋里凭空假设，先看——从第一天起，就在水渠里的鸟名下写上它们的拉丁学名。

行了两天，他们抵达塞易斯。这里的空气不同，更湿，更重，带着被水淹的田野的气味，光线是白色的，没有沙漠的干燥。第二十六王朝法老们的大都城，已什么也

没有留下。几块花岗岩石块散落在田野里，被当地农民重新用作水渠的垫石。

“两平方公里，”若马尔说，“大致如此，明天得重新拉一遍测链。数千年层层叠压的居住，从未有人发掘。整座城市被压缩进了一座山丘。”

没有什么可画的。没有可见的纪念建筑，没有方尖碑。只有山丘的表面，它的尺寸，用气压计测得的高度。而在四周的田野里，水渠中，村舍的墙壁里，到处都是被重新利用的花岗岩石块。柱子的残片，雕花门楣的碎块，一段段的檐梁。

若马尔在一道水渠边停下，手掌抚过其中一块石头。石块是阿斯旺的粉红花岗岩，一面经过打磨，其余几面是粗糙的。

“这些石块我们带不走，”若卢瓦说，“它们是人家房子的墙。总不能为了取石头把一座村子拆了。”

“这些费拉才是塞易斯真正的守护者，”若马尔说。“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没有他们的房子，这些石块……”他轻拍着花岗岩，“早就消失了。”

若卢瓦看着自己的速写。墙里的石块。一行一行抄下的铭文。他做的和费拉们是一回事——从塞易斯取走他所能取的，装进适合他的载体。他们用的是花岗岩。他用的是纸。

探险队于 10 月 27 日回到开罗，途中经过布托的土丘，比塞易斯的更为荒秃。原地几乎没有留下石块，但测绘完整。

十一月和十二月，若卢瓦为藏品编目。两年间积累起数百件器物。雕像，护身符，纸莎草文献，钱币，珠宝，

自然标本。他制作卡片，核对描述，订正归属。数月野外工作之后，袖口上沾的已是墨水，而不再是尘土。

若卢瓦偶然发现旧开罗街区里有一间科普特抄写作坊，那里仍用手抄写礼仪书籍，并依阿拉伯书吏的技法加工纸张。一位老人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制作成册的纸本，卖给商人，商人再转售给委员会的学者。若卢瓦在那里买过好几批。

一天早晨，他请求留下来观看制作过程。

纸张的加工遵循一套熟练的工序。用淀粉浆给纸页上胶，晾干，再用石头或贝壳长时间打磨，好让芦笔在上面滑行而不吸墨。若卢瓦把手指按在一张完工的纸面上——光滑如皮肤，尚带清新之气，散发着他在别处从未闻到的淀粉与芦苇的气味。成品——一张柔韧的乳白色纸张——毫不逊色于欧洲最好的纸。这门技艺承袭自中世纪的阿拉伯与科普特书吏，据说数百年来未曾改变过一个动作。

他画着老工匠的双手。那双手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这项工作。是他父亲教的，他父亲又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学来的。石头在纸面上来回移动，眼睛并不跟随。

“他们做这个有多久了？”若卢瓦问翻译。

翻译转述了问题。老工匠没有抬眼，作了回答。

“他说是他父亲教他的。而他父亲是从一个自称得自古人的人那里学的。”

“在这里，您所说的古人，指的是法老吗？”

又一个问题。简短的回答。

“他说他不知道。他说这并不重要。”翻译顿了顿，找着措辞。“要紧的是，手知道该怎么做。”

若卢瓦记下了这句话。纸的发明者叫什么名字，这位工匠并不知道，也完全无须知道。若卢瓦望着自己的双手，指节褶皱里的墨渍，右拇指上多年握炭笔磨出的茧。

这是一种记忆，是*《埃及志》*无法复制的。雕版的图版能展现纸张与工具的形状。但手的动作——确切的压力，芦笔的角度，凭肉眼判断的打磨时长——这些哪儿也去不了。它们将随着这个人和他的儿子们一同消亡，除非他的儿子们也有愿意学艺的儿子。

他端详长子的双手。那双手做着与父亲的手完全相同的动作。

他带着三张新纸，以及那幅手的画离开了，日后他要把画装框，挂在圣多米尼克街的寓所里。他想起汗·哈利利那位老书法商人，进入开罗的那个晚上，曾卖给若弗鲁瓦三张纸，又送了第四张作为见面礼。这两个人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他们却有着同样的举动。

梅努的善意也有其反面。梅努对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以至于插手其组织安排，并自以为有权决定什么值得研究。

“梅努将军想要多一些清真寺，少一些法老，”若卢瓦向傅里叶转述。“伊斯兰的埃及在政治上更有意义。他说，是为了我们与居民的关系。”

“他也不是全无道理，”傅里叶头也不抬地看着演算纸说，“就实质而言。但我们的科学优先次序……”他放下笔，“该由我们来定。而不是由他。”

他们找到了折中的办法。包括沙布罗尔和朗克雷在内的几位学者，拿出一部分时间研究伊斯兰时期，记录开罗的中世纪清真寺和阿拉伯石匠的建筑技术。这些研究收入*《埃及志》*，使之成为欧洲最早一批严肃研究中东伊斯兰建筑的著作之一。

与此同时，若卢瓦继续记录法老时代的古迹。多年下来，他形成了一套精细的工作方法。先画一幅总体草图，把握大体比例，再对重要部分作详细测绘，最后抄录象形文字铭文，保留所有可见的瑕疵，以便日后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

“抄下你们所见的，”他一再对年轻的助手们说，“裂缝，缺损，一切。理想化的象形文字，不如有裂缝的象形文字。它本应是什么样子，那是你们的事，不是石头的事。”

十一月的一个早晨，若卢瓦走在旧开罗的伊斯兰区，描绘中世纪房屋的立面，看见了一个让他难忘的细节。一名法国士兵——二十来岁，军服已旧，枪斜挎在肩上——停在科普特区一户人家外墙的壁龛前。壁龛里是一尊青铜小像，大约二十厘米，一尊端坐的伊西斯。显然很古老。包浆厚而不均匀。

士兵看了看它。然后拿了起来。毫不犹豫，也没有四下张望。他把它塞进子弹盒，转身走进小巷。前后一共十五秒。壁龛空了。

若卢瓦待在原地，一言未发。他对这名士兵没有权威，身边也没有军官。即便有，又能说什么呢？说这件东西属于这座房子？说主人会回来？他不知道谁住在那里，也不知道这房子是否还有人住。他只知道，这尊小像在壁龛里放了足够久，以致它的底座在石面上留下了一圈比其余部分更干净的印痕。

他掏出笔记本，画下了空空的壁龛。缺席的轮廓。那圈较浅的痕迹，是小像的底座多年来所压之处。他所能做的只有这些。记录刚刚消失的东西。*《埃及志》*中也许会有一幅类似的伊西斯的图，取自委员会的藏品。但不会是这一尊。那一尊会在士兵的子弹盒里一直到海岸，然

后进入某个集市，再然后，若有人在港口买下它，就进入马赛的某间客厅。

他又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笔记本摊开在空壁龛的画上。随后他穿过科普特区的小巷回到宫中。尚未开门的铺子前，孩子们在门槛上玩耍。他一路走着，没有取出笔记本，没有画。

III - 农业与灌溉

1800 年至 1801 年的冬天，委员会的工程师和农学家们投入了对埃及农业的研究，这个领域此前一直被对古迹的迷恋所遮蔽。令他们震撼的，是这套体系运转得多么出色。孔泰在入冬后的第一次例会上，就向研究院提交了他的水利研究，腋下夹着一叠图纸。

“埃及的农业一句话就能说完。每年夏天，尼罗河的泛滥使田地肥沃。其余的一切——渠道，水池，机械装置——不过是对这一自然事实的有组织的管理。”

他描述了桔槔，一种带配重的简易杠杆，用来提水；萨基耶水车，由一头牛驱动的轮子，用于更大的水量。这两种机械，任何一位费拉都会用当地的木料和绳索制造和修理。

“它们看上去原始。那就请您试试，用本地的木材，植物纤维的绳索和黏土，造出更好的来。”

孔泰从经验中领悟到的是，一台设计得当的简单机器，胜过一百台不合用的复杂机器。埃及人在他之前数千年就已懂得了这一点。

他展示了渠网的技术图纸，这张渠网把尼罗河的水分送到整个可耕谷地。一棵在数百公里间分枝的水利之树，由数十个村庄共同维护。

“不清淤的渠道，三年就会死掉。淤泥会把它堵住。在这里，那是冬天的劳作。数百人腰部以下泡在水里。一个村子单独养护不了一条大渠。必须有一个权威来统率所有的村庄，无论是法老、哈里发还是贝伊。我并不是说水造出了君王；我是说，水离不开君王。”

在灌溉之外，好几位学者研究栽培植物和农业习俗。若卢瓦整日泡在田野里，观察季节的循环，耕作的技术，当地的品种，晚上回来时靴子上满是灰色的泥。

“同样的作物，同样的农具，同样的动作，”若卢瓦说。“这是古王国的农业。四千年下来，根本的东西丝毫未变。”

“埃及人不需要肥料，”孔泰说，“尼罗河每年都从埃塞俄比亚的群山中为他们送来。他们把水引向田地，等淤泥沉积下来，再让水在播种之前退去。”

马塞尔并不是工程师，却从这番解释中悟出了理解法老神庙建筑的一把钥匙。大神殿常常垂直于尼罗河而建，主轴或指向河流，或依农事历法指向四方基点。埃及的宗教天文学与农事历法密不可分，而农事历法本身又以尼罗河的涨落周期为准。

“您瞧……神庙并没有背对田野。它朝向河流，生命从那里而来。而太阳落在沙漠一侧，那里正是安葬死者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宗教，说到底，就是——怎么说呢——一种水利的宇宙论。这个词很难听，请原谅。”

“尼日尔河，印度河……任何一条多淤泥的河流，只要把这套体系移用过去，都会有相近的成效，”孔泰说。“这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性的东西。埃及人不过是有时间把它臻于完善罢了。”

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与梅努将军只有名字相同，担任吉萨运河的 *wakil* 已有十六年。他负责监督七公里长的主渠

及其支渠每年的疏浚，统筹十四个村庄的劳作，并在费拉之间裁断用水分配的纠纷。

那天早晨，委员会的两名工程师在他的主渠岸边安顿下来。一个是高瘦个子，那是若卢瓦，带着他的仪器，另一个埋头于图纸。他们画图，测量，彼此交谈。他们带来的翻译不太高明，只译得出字面，译不出意思。阿卜杜拉从他在技术术语上的迟疑便看得出来。

他从对岸的芦苇丛中隐身望着他们干活，看了一个钟头。他想弄明白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测量渠宽、堤高、渠底的坡度。他是从那高瘦个子摆弄瞄准仪器的动作看出来的。若是兵，会留意四周。这些人只看水渠。

那高瘦个子朝他走了过来。他通过翻译问每年疏浚需要多少个工日，多少人手，各村之间如何编组。那都是*wakil*会问的问题。

阿卜杜拉答得很仔细。他知道这些法国人什么都要记下来。那高瘦个子记录他的回答，速度之快，说明他听得懂人家说的话，哪怕翻译有些吃力。当阿卜杜拉讲到轮流疏浚的制度——每个村子负责一段，三年一轮——那高瘦个子点了点头，那是工程师们在某件事印证了自己早先的猜想时才有的点头。

让阿卜杜拉不安的，并不是法国人的好奇，而是他们把水渠当作一件物品。当作一样可以测量、描述、写进书里、然后便算是弄懂了的东西。阿卜杜拉用十六年学会的，恰恰是水渠不会被化约为它的数据。它有脾气。大水之年，它会在从未漫溢过的地方溢出水来；枯水之年，它又露出三十年来无人见过的险处。要驾驭这一切，靠的是记忆——父亲传给他、他又将传给儿子的记忆——而不是什么瞄准仪器。

他任他们干活。他们什么也不拿，什么也不动。上午将尽时，那高瘦个子给他看了自己画的水渠图，一幅精确的横剖面图，标满了数字。阿卜杜拉默默地看着。画得没错，那就是这条水渠。可图上说不出，为什么第三公里处的左岸比右岸更脆弱，也说不出怎样从水色里就觉出今年的淤泥是肥沃还是沙多。图画出了水渠，而他是懂得水渠的。

他通过翻译，给他们指了水渠上的两处地方，说在那里测量会更有意思。那是父亲带他看过的地方，其中的要紧之处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他只是感觉得到，如此而已。那高瘦个子毫不迟疑地去了。他想必有所发现，因为他在每一处都耗了两个钟头。

傍晚临走之前，那高瘦个子又问他——仍是通过翻译——学做一个 *wakil* 要多久。“一辈子，”阿卜杜拉回答。翻译照话译了。阿卜杜拉本想再补充一句，说学徒期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水渠也永远变个不停；而一个 *wakil* 的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仍不懂的，比自己所懂的更多。

若卢瓦带着七十二袋淤泥和几页水文记录回到了开罗。他想着那位运河的 *wakil*，想着他从对岸望着他们干活的神情，想着他回答问题时的精确，想着他指出的那两处地点。这不是一个任法国人摆布的人，而是一个在盘算的人。他想到了自己看待这个国家的方式。用数据，用标高，用横剖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不同。

“那位管了这条水渠十六年的人，他对您说了什么？”一天之后，在成果汇报会上，孔泰问道。

“学徒期是一辈子。其余的，他没有说。我想他心里认为，自己尚不知道的，比已知的更多。”

孔泰放下了铅笔。他望着桌上排成一行的淤泥袋。七十二份样本，取自渠道及其支渠沿线，贴了标签，编了号，

就要运往巴黎。埃及的泥土，装在法国的帆布袋里。他想象着若卢瓦跪在水渠边，手指插进尚且湿润的淤泥里，先用指头感受每一份样本的质地，然后才去测量。

“我们对他们的土地，和对他们的雕像做的是同一回事，”他说，“我们拿走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称之为科学。”

若卢瓦没有作答。取走淤泥与取走一尊*沙布提俑*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分明。两种情形里，都有东西离开了埃及。

“区别在于，”他终于说，“拿走淤泥，不会使田地变贫瘠。每年涨水都会补回来。可雕像，尼罗河是不会补回来的。”

“这条界线是实用的，不是道德的。”

他们沉默下来。屋外院子里，听得见埃及仆役们的声响，舂臼单调的捣击声，阿拉伯语的说话声，空气里还飘着孜然的气味。这些人也是从父辈那里学来的手艺。他们不会装在帆布袋里去巴黎。

主渠的疏浚在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若卢瓦问阿卜杜拉能否前去观看。阿卜杜拉答应了，脸上的神情什么也没透露。

各队按村子分工，每村负责分给自己的一段。人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用宽大的木锹从渠底铲起淤泥，装进编织的筐里，由另一些人抬到堤岸上。堆在堤岸上的淤泥随后将被分到各处田里，直到最后一筐。

若卢瓦一连看了五个钟头。他数着人数，测算每小时挖出的淤泥量，记下各段疏浚前后的深度。劳作的效率始终平稳，没有多余的动作，各队之间也不见混乱。这些人从小就干这个。没有一个人看着自己的木锹。

晌午时分，阿卜杜拉过来在他身旁的堤岸上坐下。他看着若卢瓦记录数字，几分钟里一言不发。随后他开了口，翻译用简短的句子转述。

“他说，他祖父曾带他看过下游的一处地方，那里的渠底是整块的岩石。渠底是岩石的话，遇上大水之年，水渠更经得住。他父亲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他想知道您是否知道。”

若卢瓦看了看翻译，又看了看阿卜杜拉。在这个问题背后，他听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们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测量的是什么？

“不，”他说，“我先前不知道。请带我去那个地方。”

阿卜杜拉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他们沿着水渠一同走了二十分钟。阿卜杜拉在一段渠底露出地面的地方停下。那是一块暗色的岩石，被世世代代的水流磨得光滑，上面布满矿物沉积的条纹。若卢瓦跪下身，掏出小刀，轻轻刮着岩面。是致密的石灰岩。水渠在这里是顺着天然的岩层露头开凿的。三千年前，曾有人正是出于这个缘故选定了这个位置。

若卢瓦记下了位置，又把带条纹的岩石画了一幅草图。阿卜杜拉看着他做。待若卢瓦完成，他说了句话，翻译过了好一会儿才译出来。

“他说，法国人把埃及人从来就在做的事写了下来。也许有用。但写下来，代替不了亲手做了一千年。”

若卢瓦收起了铅笔。这话说得对。他找不出话来回答。

傍晚，阿卜杜拉送若卢瓦回到法军纵队扎营的村边。两人并肩走着，一句话也没说，翻译在几步之后跟着。太阳低低地挂在西面的沙漠上，长长的黄色光线洒在已因退水而露出的田野上。

阿卜杜拉停了下来。他望着田野看了片刻，然后说了句话，翻译是这样转述的。最近的那块田角里——他伸手指了指——有一堆石灰岩块，是他去年冬天疏浚水渠时发现的。石块上刻着字。他不识得那些符号。他把它们堆在那里，只因为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

若卢瓦过去查看。四块白色的石灰岩，大小如甜瓜，堆在堤岸的一个角落里。每块上都刻着浮雕的象形文字，做工精良。多半是一段行政铭文，或是一条供奉的祝词，属于新王国时期。它们来自一座被拆毁的神庙，曾被重新砌进某道墙里，后来又掉进了水渠。

若卢瓦把它们画了下来。随后又把它们登记在册，写明确切的位置和对铭文符号的描述。他拿起四块中最小的一块——三公斤重，一面有铭文，另外三面是粗糙的毛面——放进了野外背包。

阿卜杜拉看着他做。他一言不发。他指出这些石块，是因为它们在他看来很重要，并不是指望有人把它们带走。不过，这个法国人是先画的图。他没有一上来就拿。

“即便石块丢了，图还会留下，”若卢瓦通过翻译说，“我带走石块，是为了到巴黎去研究它。我若不带走，明年水渠就会把它冲走，到那时石块和图都不会留下。”

阿卜杜拉听完翻译，耸了耸肩——那是一个并未被说服、却又没有力气争辩的人所共有的动作——然后转身朝村子走去。

IV - 时间渐紧

1801 年 3 月 8 日，约一万六千名英国士兵在阿布基尔登陆，向亚历山大进发。原以为已被阿里什协定了结的战争，又重新打响了。聚集在开罗的委员会学者们明白，他们能否离开埃及，此后将取决于一场军事上的投降。

梅努调集了他的部队。但他的人马分散在亚历山大、开罗和上埃及之间，要及时集结已不可能。3月21日，在亚历山大附近的卡诺普，发生了一场不幸的战役。法军打得很好。英国人兵力占优，还有战舰——而自1798年8月1日起，法军就一直缺少战舰。

东北方向不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一支奥斯曼大军正在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的统率下推进。两万奥斯曼士兵，又有马穆鲁克相助。投降变得不可避免。在研究院的走廊里，人们不再问会不会投降，而是问何时投降，以及藏品能在什么条件下保全下来。

3月14日晚，傅里叶召集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所有在开罗的学者都到了。二十来个人围坐在研究院图书馆的大桌旁。屋外传来商贩们收摊关铺的吆喝声。

“诸位先生，”傅里叶开口道，“我们必须为保护我们的藏品做好准备。投降条约通常规定，胜利者可以没收战败国国家所有的财物。倘若我们的藏品被视为法国国家的财产，英国人就有权提出索要。权利，我说的正是权利。”

一阵沉默。随后若马尔发了言。

“我们必须让它们被承认为科学财产……国际性的财产，而不是法国的军事财产。我们的成果属于普世的科学，而不属于某一个政府。”

“英国人也有博物学家，”若弗鲁瓦说，“他们也会有通晓古物的专员。他们会确切知道我们手里有什么。”

马塞尔插话了。

“一切都系于一项区分。机构的财产，个人的财产。凡是我们自掏腰包买下的，可以作为私人财物来辩护。而以委员会的名义收集的……就更难保护了。”

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学者们议定了策略的大纲。他们不会以武力对抗查没。他们既无此手段，也无此权力。但他们会在英国专员面前主张自己的权利。他们将陈述理由。必要的话，还会逐件交涉。

3 月 14 日至 15 日的夜里，他们都在编制一份平行的清单。一份是委员会所有物品的正式清单，另一份是每位学者以个人名义持有之物的私人清单。马塞尔一直工作到清晨五点。他翻开自己的登记簿，翻到第一百页，重读最近的几条记录。一尊青铜阿努比斯小像，高二十二厘米，1799 年 9 月 3 日在汗·哈利利以八皮亚斯特向商人优素福·伊本·哈利勒买下。一卷残缺的丧葬纸草，十五厘米乘二十厘米，1799 年 11 月 17 日以三皮亚斯特购自萨卡拉的一名费拉。一枚绿色皂石的圣甲虫，托勒密时代，1800 年 2 月 2 日在艾兹白基耶集市以一个半皮亚斯特购得。每一笔交易都可以核实，而他再没有别的保障。

他的购置登记簿共一百一十二页，一百六十二条记录，自将近三年前亚历山大的第一笔交易算起。凡以他个人名义购得的每件物品，都登记在册，注明日期、地点、所付价款，若知道卖主的姓名，也一并写上。这本簿子从一开始就以公证人般的严谨记录着，因为马塞尔一开始就明白，这一区分终有一天会变得要紧。

“这本簿子站得住脚吗？”傅里叶从他肩后看着问道。

“对确凿无疑的部分，站得住。至于其余的……只要英国专员不逼得太紧，也站得住。一个想把一切都拿走的专员，总能找到借口。一个愿意讲道理的专员，会接受这个作为充分的证据。”马塞尔轻轻拍了拍簿子的封皮，上面前一天写下的墨迹还没有完全干透。

“那么一切都取决于专员了。”

“一切都取决于专员，是的。”

罗塞塔石碑的问题尤其让学者们忧心。它是他们发现的最重要的物品。倘若它去了伦敦，破译象形文字就会成为英国人的胜利。不过，马塞尔已有防备。一年多前，他在开罗拓印了碑文，由迪加将军带往巴黎。拓片已经抵达。法国研究东方文献的大家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手里已经有了它们。即便石碑去了伦敦，拓片仍会留在巴黎。

“信息可以旅行，”马塞尔说，“实物……实物却不能。这一仗，我们也许已经赢了。”

在随后的几周里，学者们把此前零敲碎打的成果复制工作系统化了。研究院的图书馆变成了誊抄的作坊。沿墙摆开了桌子，每张桌子负责一类文件。一张用来描摹图稿。一张用来誊录地形测量数据。一张用来誊录科普特文献的转写稿。一张用来抄写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描述。

工作细致而又令人精疲力竭。若卢瓦监督着一百八十三张最重要图稿的描摹。上埃及的神庙，吉萨和萨卡拉的金字塔，国王谷的陵墓。他从军队里招来三个年轻的绘图员，会握笔，也会循着线条走。他给他们看一张原图，要他们快速描一张，只要轮廓，不要阴影，也不要多余的细节。足以传达建筑的要点。

这些摹本被卷进竹筒，交给一位希腊商人，他答应搭乘第一艘中立国船只把它们送往巴黎。若卢瓦预付了他五十皮亚斯特，并许诺竹筒若能送到，再付五十。

“您信得过他吗？”若马尔望着商队远去，问道。

“信不过。”若卢瓦望着尘土在牲畜身后落定。“没有别的办法。一批若是丢了，也许另一批会到。”

若马尔那边，则把最近的地形测量数据抄在第二套纸上。这活计花了他九天。他晚上干，借着灯光，逐个数字、逐个角度地誊抄。每一项测量都核对两遍。只要错一个

数字，就可能使一整组演算作废。他的笔记本上渐渐写满了一列列数字、几何草图和页边的批注。这些抄本将放进与原件不同的箱子，若马尔还在每一份抄本上注明了孪生箱子的编号。

若弗鲁瓦没法复制他那些装鱼的玻璃罐。泡在酒精里的标本是不可能有副本的。但他把每件标本都画了下来，精确到足以让博物学家仅凭图画就能辨认物种。两百四十个物种，一个接一个，附有关于产地、尺寸和区别性解剖特征的详细注释。这些画算不得艺术，是科学文献，冷静，精准，毫无表情。万一罐子被毁，图页仍会留下。

3月25日，一则更确切的消息传到了开罗。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的奥斯曼军队正从叙利亚推进，已逼近埃及边境。它迟早要与在阿布基尔登陆的英军会师，这似乎已不可避免。开罗很快就要两面受敌了。

傅里叶当晚就召集了学者们。

“诸位先生，我们必须加快复制的进度。凡是能抄的，都要尽快抄下来。往后……往后就太晚了。”

节奏加快了。人们从黎明干到午夜。油灯日夜不熄。墨水和纸张的气味充满了走廊。学者们两人一组，一个口述，一个书写。军中的文书被征调来，协助抄写行政文件。

4月8日，一桩意外打断了工作。若马尔正在誊抄在丹德拉测得的一组角度数据，手肘碰翻了墨水瓶。墨水泼在纸上。三个钟头的工夫白费了。他望着那页毁掉的纸，黑色吞没了数字。随后他取来一张新纸，重新开始。一行接着一行。邻桌的若弗鲁瓦抬起眼来，随即又俯身去看他的鱼。

图书馆里只听得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翻页的窸窣声，抄写员之间的低语声。有时，一团墨迹毁了一页快

要写完的纸，便会传来一声压低的咒骂。那就只得全部重来。

4 月间，若卢瓦通过一支开往海岸的商队寄出了第二批摹本。他又预付了商队首领五十皮亚斯特，那人把银币数了两遍，像是个深知船会沉、箱子会从车上掉下来、路上有盗贼出没的人。

在复制工作的同时，学者们也在为同英国专员的交锋制定法律策略。他们列出了一份将优先捍卫的物品清单。罗塞塔石碑居首，其后是大石棺、巨型雕像、若弗鲁瓦的博物学藏品、若马尔的地图测绘成果、若卢瓦的笔记本。针对每一类，他们都备好了论据，依据的是机构财产与个人财产之分，以及被搜集之物与被创造之作之别。

马塞尔提出了将指导他们辩护的原则。绘图簿并不是什么珍奇古玩，而是工作的工具。拓片并不是古物，而是学者们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纸和墨。科学仪器是专业人员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战争中的战利品。博物学标本属于自然界，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

“这类条约谈的是天然的和人造的珍奇之物，”马塞尔说，“很好。我们的成果不是珍奇之物，而是科学的产物。这就要我们去证明。”

“英国人会想把一切都拿走，”若马尔答道，“我不相信那些论据能……”

“灰色地带，”傅里叶打断道，“我们的论据会造出灰色地带。在灰色地带里，是可以谈判的。一个讲理的专员会同意留下某些东西。我们该把力气集中在那里。”

“要是专员不讲理呢？”若弗鲁瓦问。

“那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傅里叶含糊地摆了摆手。“我们总归试过了。副本会留下来。”

关于掠夺的道德问题，也被拿出来讨论过。4 月的一次会议上，若马尔提出了那个令所有人都忧心、却没有人敢明说的问题。

“我们收集的东西有三种不同的性质。首先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东西。测量、图画、笔记。我认为，这些无可争议地属于我们。其次是博物学标本。鱼类、植物、矿物。它们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的采集没有剥夺任何人。最后……是从陵墓、神庙、墓地中取出的物品。那些东西原本属于埃及。我们把它们拿走了。”

若弗鲁瓦插话了。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那些盗掘陵墓卖东西给我们的费拉，不管怎样都会去盗掘的。我们只是加速了一个原本就存在的过程。”

“这可以减轻罪责，”若马尔答道，“却不能证明任何事情是正当的。”

整场争论中一直沉默不语的若卢瓦，终于开口了。

“问题不单是道德上的，也是现实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东西属于埃及，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对英国人捍卫它们。如果我们主张它们是我们的，那就必须贯彻到底。我们拿了它们。我们会留着它们。我们会发表。”

傅里叶表示赞同。

“当初拿这些东西是对是错，”傅里叶说，“那是学院里的讨论。这些东西现在在我们手里。英国人会来索要。诸位之中，有谁认为我们应当以道德原则之名，主动把它们让给英国人吗？”

无人应声。这间屋子里没有一位学者愿意主动放弃多年的心血。若弗鲁瓦望着桌面，马塞尔望着自己的双手。

“那么我们意见一致了，”傅里叶说，“我们将捍卫我们的藏品。但要明白我们为何这样做。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这是当然——也因为我相信，法国的科学会比英国的军人更好地利用它们。”

马塞尔补充了一项保留意见。

“那要是英国人比我们用得更好呢？大英博物馆是一所严肃的机构。他们的学者也很称职。我们科学上更胜一筹的论点，只有在我们真正发表成果时才站得住脚。倘若我们的藏品在巴黎的箱子里一躺就是二十年，那英国人拿走它们便是拿对了。”

“说得对，”傅里叶沉默片刻后承认道，“必须出版。否则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无从辩护。”

5月12日，一名从三角洲某哨所逃出的军官带着消息来到开罗。英国人自4月底起控制了罗塞塔，正向俘虏和商人打听埃及研究院搜集了些什么。傅里叶让他把经过复述了两遍。英国专员们因此会带着明确的要求而来，而他们的清单很可能早已备好。

5月里，军事消息渐渐明朗。英国人正缓缓溯尼罗河而上。奥斯曼人从东北方向挺进。两军向开罗合围已不可避免。只是几个星期的事了。

学者们更是加倍用功。每一天都带来它那一份限制和必须作出的抉择。先抄什么？留下什么？纸、墨、时间，该怎样分配给那些看起来同样紧急的项目？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学者之间的差别显露了出来。有的人慌了神，想把一切都救下来，同时开了十个抄写项目，却没有一个干完。另一些人，比如若马尔，则保持着自己的方法，定下清晰的先后次序，并坚持到底。

傅里叶在一旁仔细观察着这一切。他做着笔记。记的不是物品，而是人。每个人如何应对压力。谁保持着清醒，谁失去了清醒。这些笔记永远不会用在《埃及志》的图版里。多年之后，它们将帮助他撰写该书的历史性序言。

5 月底，傅里叶在午夜之后走进了作坊。灯还亮着。三名抄写员默默地工作，伏在纸页上。一个在誊抄地形测量数据，一个在描摹一幅神庙的图，第三个在转录植物学的描述。傅里叶在门框里停住了脚步。倘若英国人把一切都拿走，这些副本便是留下的东西。他在那里站了片刻，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随后转身离去。

6 月中旬，最后一次会议被召集起来。敌人的军队离开罗只剩下几天的行程。学者们必须作出他们最后的安排。

6月20日，若卢瓦对他的图筒做了最后的清点。二十三个铜筒，装着两千零八十七幅图。两百三十七本笔记。第一批有一百八十三张摹本，第二批还有一些，都已寄出。他把清单列在一张纸上，折成四折，塞进外衣里。

“诸位先生，”傅里叶说，“我们已尽了所能。我们的成果已经复制。我们的清单已经齐全。我们的论据已经备好。英国人会带着他们的清单来，我们有我们的。接下来会怎样，取决于谈判。但我们的准备，已经做到了所能做到的最充分。”

若卢瓦发了言。

“一直到底。它们不会还没有为科学效力，就沉入某座英国博物馆的库房。”

无人再说什么。人们把纸页折起，掐灭了一盏灯。会议在午夜前散了。

6 月的最后几天，开罗的店铺开门晚，关门早。法军的巡逻队彼此擦肩而过，互不交谈。在研究院里，人们打包，然后又拆开检查。

V - 开罗的败局

1801 年 6 月 27 日，军事形势已无法维持。被困在亚历山大的梅努无力救援开罗。统率守军的贝利亚尔将军，几天前已与哈钦森将军及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展开了投降谈判。

一份协定当天签署。它规定了军队携带武器和行李撤离，却没有明确提及委员会的藏品。这份沉默只是一时的缓期。真正威胁到它们的那一条款，将于 9 月在亚历山大签署，编号为第十六条。

要紧的话只有一句。军队将带着武器和行李撤出开罗。这句话由傅里叶在 1801 年 6 月 28 日的紧急会议上高声宣读，随后是一阵沉默，若卢瓦后来在日记里把它比作医生刚刚住口时病房里的那种沉默。接着所有人同时开了口，若弗鲁瓦，马塞尔，若马尔，声音叠着声音，直到傅里叶举起手来。

“行李……这包括我的罐子吗？”若弗鲁瓦说，“三年的藏品。尼罗河完整的动物群。两百四十个还没有人描述过的物种。”

“还有我的笔记本，”若卢瓦说，“两百三十七本。那是有史以来对上埃及神庙仅有的完整测绘。”

“那罗塞塔石碑呢？”马塞尔说，“它在亚历山大，和梅努在一起。三千年来我们找到的唯一一把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它……”

傅里叶重读了那一条。军队将带着武器和行李撤离。他在措辞里寻找漏洞。行李显然不包括巨像和石棺。但纸草、钱币、若弗鲁瓦的罐子、植物标本集、骨骼呢？绘图簿是行李，还是为共和国所做的收藏？一位艺术家的工作笔记，在投降条约的意义上，难道还能被视为个人物品以外的东西吗？傅里叶放下文本，又拿了起来。

身在亚历山大的罗塞塔石碑，不受这份协定的约束。马塞尔的拓片——由他亲手制作的纸和墨——属于行李、收藏，还是智力成果？

“这个词含糊不清，”傅里叶说，“‘行李’。他们没有给这个词下定义。一个没有定义的词，就是……一个变量。该由我们来划定它的范围，看它涵盖什么，不涵盖什么。”

3 月的法律策略终于找到了可以施展的文本。军事抵抗已无可能，因为他们没有武器，也不会使用。剩下的是文本上的抵抗，也就是在协定的字句中找出缝隙，好让他们的藏品从中穿过。笔记本成了工作的工具，拓片成了文献，科学仪器成了职业用品。每一类物品都有了自己的防线。

协定宣读之后的日子里，研究院周围的小巷换了一批访客。汗·哈利利的商人们开始在门口附近转悠，不是那些卖布匹和香料的，而是多年来经营古物的人，他们能从欧洲顾客的举止里，在对方自己尚未明白之前就读出他想买什么。

苏莱曼·盖巴尼——就是一年前背着帆布挎包来到塔尼斯的那个人——6月30日早晨提着一只木箱出现在研究院门口。箱里有二十二尊彩绘石灰岩的*沙布提俑*，五枚蓝色釉砂的圣甲虫，三件晚期埃及的金护身符。他把箱子放在门房的桌上，通过一个充当翻译的男孩说：“照常价钱。趁英国人还没把东西都拿走。”

碰巧路过的马塞尔看了看箱里的东西。这些*沙布提俑*是真品，属底比斯时期，第十八或第十九王朝，彩绘石灰岩，颜料依然鲜亮。圣甲虫是上乘的釉砂。金护身符也是真的。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问。

男孩翻译了。苏莱曼·盖巴尼毫不迟疑地答道。来自底比斯，是去年冬天几个费拉为扩大地窖往下挖时发现的一座官吏墓。他买下了它们。现在他转手卖掉，因为他知道委员会就要离开埃及，而英国人不那么内行，出的价钱会更低。

马塞尔买下了整箱东西，付了四十皮亚斯特，并在自己的私人登记簿里写下一张注明 6 月 30 日的收据。这二十二尊*沙布提俑*就这样进了他个人的清单，而不是研究院的藏品，因此在理论上可以逃过针对后者的任何征用。当地的市场读条约，比外交官们还要快。

若弗鲁瓦的回应则不同。他不寻找法律上的缝隙，而是寻找一种力量的对比。

若弗鲁瓦写了一封致贝利亚尔将军的信，只有一页。克制，毫无抒情。他在信中说明，他的博物学藏品代表着无与伦比的实地工作，尼罗河与三角洲动物群中的两百四十个物种，欧洲科学界迄今尚未描述过；若英国专员们要查没它们，他准备将其销毁，也不愿交出。

“我不是在威胁他们，”他对正从他肩后看草稿的傅里叶说，“我是在预先告诉他们。如果把‘行李’一词照字面用到我的藏品上，就是这个结果。”

“他们会相信您吗？”

“在他们决定信不信我之前，我早已把它们烧了。”

傅里叶把草稿折了起来。若弗鲁瓦不是爱虚张声势的人。他在埃及逗留的日子里，一直膝行着从坑道里爬出来，双手沾满泥浆，亲自在酷热中搬运他那些盛酒精的罐子。这个威胁，他斟酌了很久才写下来。这是与他对自己工作的看法相一致的唯一回答，这工作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出资的那支军队。与其让这些罐子在伦敦某个地下室里沉睡，被某个不明白一条 *Polypterus bichir* 何以重要的人打开，还不如它们根本不存在。

“把信送出去吧，”傅里叶说。

再说，副本早就在路上了。自从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被焚毁击沉的那一夜起，学者们就知道自己已与巴黎隔绝。港口里没有法国的船。信使取道不可靠的陆路，从一支商队转到另一支商队，从一个港口转到另一个港口，要走六个月才能到。

早在 1799 年，就有人开始通过中立国的船只寄送包裹——丹麦、瑞典、美国的船，它们为粮食贸易在亚历山大停靠。这些船很少受到英国人的检查，英国人虽控制着海面，却对中立国多有顾忌。

傅里叶就曾在 1799 年 10 月，通过一艘丹麦双桅船寄出过一卷纸，里面有三十页关于科普特语的语言学笔记。那是他的第一篇语法尝试。1801 年他回到巴黎时，这三十页正在研究院等着他，略微发了霉，但仍可辨读。

马塞尔的做法则不同。早在 1799 至 1800 年的冬天，他就在自己主持的开罗印刷所里，亲手拉印了罗塞塔石碑的印样，那是真正的拓片，先给石面上墨，再覆上纸张。迪加将军于 1800 年春把这些纸页带往巴黎，研究院又将它们交给了东方学家，其中就有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欧洲已经可以着手阅读这篇军队并无把握保住的铭文了。

若卢瓦曾在 1800 年 1 月试着通过一艘美国船寄出一捆图稿。那艘船在克里特岛外海被一艘英国护卫舰截住并被搜查。若卢瓦的文稿被扣下、检查，随后又归还了。英国人断定那是不具军事价值的艺术性测绘。他走运了，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既然中立国的船只靠不住，若卢瓦采用了另一种办法。所有要紧的文件——他最重要的图稿、马塞尔的测绘、若马尔的测量数据——一律复制成双份。原件留在学者身边。副本搭第一个能搭上的机会寄走。副本若到了，很好。若被截获，原件还在。

若马尔为此给傅里叶写了一份便笺。委员会的处境，就像那些在战斗之前把弹药埋在几处不同地方的士兵。第一处储藏若被端掉，还剩下另一处。一次被截的代价，是损失一年的工作，而不是全部。

复制的办法对大部分邮件奏了效。但不是全部。若卢瓦有两本笔记，副本尚未完成，他因时间不够，只得把原件于 1800 年底通过一艘瑞典船寄出，结果始终没有到达巴黎。只有留在开罗的未完成的副本幸存了下来。原件的下落无人知晓。沉了海，被扣押，或是在黎凡特商贸的周转中遗失了。

这两本失落的笔记，约有两百幅三角洲地区的图。塞易斯、布巴斯提斯、塔尼斯这几处遗址，是若卢瓦在 1800 年夏秋两季走访过的，此后再也不会重见。它们的副本，虽然不那么精细，将出现在*《埃及志》*中，并附一句不显眼的说明“据副本绘制，原件已佚”。

这是这些损失仅有的公开痕迹。若卢瓦在他的回忆录里从未提起过。

傅里叶看得分明，法国人从埃及拿走的东西，与英国人将从法国人手中拿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

对称。法国人拿的是实物——石头、青铜器、纸草——以及这些实物的副本。英国人在投降之时将拿走实物，却会留下副本。纸和墨，无论在和约的清单里，还是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都没有价值。

这种不对称，傅里叶在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用三句话作过概括。

“他们会拿走原件。我们，副本。而副本……它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

他是站着、面对着那些箱子，毫不迟疑地说出这话的。他没有说出口的——几年后，他才在为*《埃及志》*所作的笔记中写下来——是这种不对称并非偶然。这是战败者的预防，在战败之前就已经施行。这也许是学者们自始至终真正运用过的唯一一种战略智慧。但随后坐下来时，他自问这是否真实，还是只是人们为了承受自己无力阻止的事而对自己讲的故事。

学者们有过十七天。

从协定签署到纵队出发，一天也不多。没有人说这太少了。

这些人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与他们所准备的并不相像。他们准备的是论据——清单、备忘录、关于珍奇之物与作品之间、个人财产与研究院藏品之间的法律区分。他们不说话地干活。很快就再没有会议了。每个人守在自己的库房里，守着自己的箱子。偶有的交谈也简短而技术，谈的是用哪种绳索，每个轮子承多少重量，罐子要裹几层布。

研究院里，只听得见锤声和稻草的窸窣。

一天晚上，傅里叶去找若卢瓦，同他谈起那条贯穿历史的长链。把埃及的方尖碑搬空的罗马人，劫掠拜占庭的

十字军，用珍奇之物填满自己陈列室的国王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由。而受害者，却始终如一。若卢瓦一直听到最后。“或许吧，”他说，随即回到自己的箱子旁。傅里叶走了。

然后，第十七天的早晨，当车辆备好之时，没有人下达命令。人们走到院子里，自己组织起来，无需任何人吩咐，就在纵队里站好了位置，像士兵一样，这是自土伦以来的头一回。

纵队开始在院中集结的时候，研究院的走廊里飘着木头、胶水和酒精的气味。若卢瓦最后一次走过各个厅室。墙上还留着三年来占据桌案的藏品的痕迹。罐子曾放过的地方，有一圈圈尘土的印子；若马尔曾钉过测量图纸的地方，有粉笔划的线。梁上留着钉孔，那里曾悬挂过木乃伊，以供解剖绘图。

若卢瓦走进院子。纵队在等候。车辆已经装好。驮畜在清晨的热气中喷着鼻息。

若卢瓦又一次检查，确认他的挎包已牢牢系在分给他的那匹马的侧腹上。

法国将保有的那个埃及，不过是一个人在马鞍上带得走的那么一点。它从埃及拿走的东西，正在他身后的车上辘辘前行，装在那些英国人两个月后将要打开的箱子里。他勒紧了肚带。不会有人发出信号，他也没有等。他第一个走出了院子。

VI - 下行至罗塞塔

7 月中旬，开罗的撤离开始了。一万三千人，其中五千人是病号或伤愈未复者，另有两百名平民，以及留在开罗的委员会学者，全都在达马将军的指挥下列成纵队走出城去。有几个人回头望。大多数人盯着前面那人的背影。

第一天傍晚时分，一支奥斯曼巡逻队拦住了纵队的去路。二十名身穿军服的土耳其骑兵，由一位会说法语的贝伊统率。他们来自大维齐尔的营地。

达马将军独自上前交涉。贝伊翻身下马。交谈持续了十分钟。聚在纵队中央的学者们听不见，却看得见手势。贝伊指着北方。达马出示一份文件，大概是与盟军诸将签署的撤离协定。

傅里叶走近到能听见的距离，听见了贝伊的话。

“你们离开开罗。这很好。但你们的箱子留在埃及。”

达马回答了句什么，傅里叶没听清。贝伊坚持。

“这些东西属于埃及。你们是从我们的神庙里、我们的陵墓里拿走的。它们不会离开。”

“先生，我们与盟军将领们签署了一项协定，其中就包括你们的大维齐尔。这些问题，您应当同他们去谈。”

贝伊朝自己的骑兵做了个手势。二十支长矛举了起来。达马纹丝不动。

“您若试图拦住这支纵队，就是在违反贵方首领亲自签署的协定。我想君士坦丁堡并没有这样命令过您。”

贝伊犹豫了。他望着车上的箱子，望着列成战斗队形的法国士兵，然后又望向身后空荡荡的地平线。看不到任何奥斯曼援军。

他重新上了马。

“我们陪你们一程。以便监视。”

“悉听尊便。”

土耳其巡逻队远远地跟在纵队后面，相距一百米，一连跟了两天。骑兵们不同任何人说话。第三天黎明，他们消失了。达马猜想，他们是回去向大维齐尔复命了。

第三天晚上，若卢瓦问傅里叶，并不抱太大希望。

“您认为他们还会回来吗？”

“奥斯曼人吗？不会。他们已握有这座城。他们想知道的是，我们是否真把它……搬空了。现在他们知道了。”

“然后呢？”

“然后他们会等着英国人拿走我们的箱子。之后，他们会向英国人讨要同样的东西。这比从我们手里夺要简单得多。”

若卢瓦想找个反驳的理由，没有找到，便用一根棍子的一端拨了拨火。

学者们走在纵队中间，行李放在车上。逃脱危险的宽慰，离开埃及的惆怅，在大多数人身上已让位于对藏品的忧虑。

队伍走得不快。一万三千名士兵带着大车在沙地里行进，本就缓慢，还要时时停下歇息，每当有牲口跛了脚、车轮陷进沙里，便得重新分配负载。

若卢瓦大部分时候步行，以免累着自己的马。每当那匹马在石头上或沙窝里绊一下，他便听见铜筒在挎包里发出沉闷的碰撞声，于是回过头去。

若弗鲁瓦最担心的，是酷热对那些盛酒精的罐子的影响。玻璃遇热膨胀，酒精也是，但两者的速率不同。倘若膨胀造成了细微的裂缝，酒精就会挥发，标本几天之内便会腐坏。他把每个罐子都裹了两层湿布，助手们每逢歇脚就换一次，用的是自己储备的水。

“您在浪费水，”一名发现了这一举动的军官对他说。

“水是可以替代的。这些标本，不能。”

军官没有坚持，走开了。七月的酷热里，士兵们正受着干渴的折磨，这个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但若弗鲁瓦继续这样做。

第四天，若马尔的一只箱子在越过一道堤坝时从车上滑落，在沙地里裂开了一道口子。人们停了下来。若马尔从马上跳下，推开想来帮忙的士兵，一卷一卷地检查。其中三卷的油布褶皱里沾了一点沙。没有任何东西渗进纸里。

若马尔把箱子重新钉好，让人换了种方式装上车，平放着，多加了一道绳子。

“您运气好，”一直看着这一切的傅里叶说。

“这不是什么运气，这是绳子的功劳。”

第五天黄昏，两名卫兵把一个逃兵带回了营地。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听口音是里昂人，在撤离开罗的三天前逃走的。他们发现他藏在一片棕榈林里，饥肠辘辘，双脚流着血。

达马将军让人把他带进帐中。傅里叶恰好路过，听到了审问。

“你为什么当逃兵？”

“我想留在埃及，将军。我不想回法国去。”

“留下来做什么？”

“干活。也许成个家。在这儿，我能活下去。在法国，我又得回工厂去。”

达马看了他很久，一言不发。

“你知道逃兵会有什么下场吗？”

“知道，将军。”

“你明明知道，却还是逃了吗？”

“我二十三岁。我在这里待了三年。我学会了阿拉伯语。如今我熟悉开罗，胜过熟悉里昂。回到法国，我能做什么呢？”

达马让逃兵退下，召来了副官。傅里叶听见了判决。不开军事法庭，不处决，离罗塞塔只有一周的路程了。逃兵将戴着脚镣一路走到罗塞塔，然后重新编回队伍。一名军士把脚镣铆在他的脚踝上。锤子敲了两下。那人没有叫喊。

第二天清晨，他随连队行进，脚踝被脚镣磨得皮开肉绽。懂些医术的若弗鲁瓦给了他一罐药膏。

“今晚敷上。这样可以防止感染。”

“谢谢您，先生。”

“您究竟为什么要逃跑？”

士兵迟疑了。

“因为……我不愿看到同英国人之间将要发生的事。我们要把自己的发现交给他们。我曾替若马尔先生把箱子扛到底比斯。我见过我们测量了什么，描绘了什么。而现在，一切都要交出去。所以我宁愿留在这里。”

若弗鲁瓦没有作答，把药膏罐重新盖好。士兵拖着脚镣，回到自己的连队去了。

当晚，若弗鲁瓦把这番交谈讲给了马塞尔听。

“这个小伙子明白了许多军官至今还没明白的事。我们不是作为胜利者回去的。我们回去的时候……怎么说呢。是被剥夺者。”

“他明白了。也为此戴上了脚镣。”

“是的，”若弗鲁瓦说，没有再添一句。

逃兵随纵队一路走到罗塞塔。傅里叶后来得知，他趁着抵达时的混乱，消失在了河岸边的一个村庄里。他再也没有回过法国。

第六天，纵队在三角洲的一个村庄停下歇脚，一场沙暴骤然袭来。士兵们能躲哪儿就躲哪儿，或钻进废弃的房屋，或蜷在翻倒的大车下。沙子并非来自一个方向，而是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绕着天边旋卷，搜寻每一道缝隙、每一张张开的嘴、每一双半睁的眼。人们用大衣蒙住脸，隔着布料呼吸。马匹把臀部转向风，紧闭双眼，鼻孔收拢。骆驼跪下身子等待，耐心而漠然，仿佛它们自古以来就一直在等沙暴过去——事实上，也差不多如此。

学者们用毯子和临时搭起的帐篷盖住箱子，花了好几个钟头顶着风维持这些遮护，去抓回被阵风扯脱的带子。沙子无孔不入。钻进衣服，钻进眼睛，钻进软木塞底下。若卢瓦一手牵着马，另一手按住盖在挎包上的毯子，脸贴着马颈，借此呼吸。

若弗鲁瓦在箱子之间来回奔走，喊出一道道指令，可还没传到该听的人耳中，就被风卷走了。这一回，危险已不再是酷热。若卢瓦的铜筒进了水，不过是图稿模糊；若马尔的卷轴落了沙，那些测量数据费些功夫尚可挽回；可一只玻璃罐在箱中碎裂，酒精淌到其他罐子上，再遇上一盏提灯，整个尼罗河动物群的收藏便要化为烟尘。他下令五十米之内的提灯一律熄灭。众人在绝对的黑暗中摸索着干活，凭箱子的形状，凭它们在拳头敲击下的回响来辨认。

他的两名助手——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两个年轻学生，一路上一直受不了沙漠的酷热——那一夜毫无怨言地干

活。每只箱子检查一遍，每条带子勒紧一次，每个瓶塞在黑暗中查验一回。凌晨四点左右，沙暴平息时，若弗鲁瓦的双手仍僵硬地攥着最后一只箱子的带子。

清晨，损失不过是若卢瓦的一只铜筒掉了塞子，三张纸上的墨迹略有晕开，一只装鱼的玻璃罐底部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标本被转移到备用罐中。

若弗鲁瓦把那只备用罐从开罗带来，就是为了这个，别无其他。

第七天正午前后，纵队遇上一队逃往海岸的科普特难民。约三十户人家，驴背上驮满包裹，孩子们赤脚走在沙地里，老人躺在临时扎成的担架上被人抬着。

他们的首领是一位会说法语的神甫，他走近达马。

“将军，我们是在逃避报复。自从法国人撤离开罗，奥斯曼民兵就在焚烧我们的教堂。我们去海岸，投靠英国人的保护。”

达马命人分发饮水。神甫谢绝了。

“请把水留给您的士兵。离这里两小时路程就有水井。不过请告诉我，你们走了以后，英国人会保护基督徒吗？”

“我不知道，神甫。这不是我的事。”

“1798 年你们向我们许诺宗教自由的时候，这就是你们的事。现在你们要走了，而我们留下。”

达马没有回答。神甫回到了他的队伍中。

马塞尔听完了这番对话。他转向傅里叶。

“我们刚来的时候许诺了许多事。埃及人的解放，马穆鲁克的终结……科普特人所受压迫的终结。国家的现代化。如今我们离去，留下的埃及与我们当初所见的一模一样。或许，还更糟。”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留下了些东西。若马尔的测量，若卢瓦的图稿……我们的成果将会出版。”

“是的。我们留下的是书。而他们，留下来承受报复。”

科普特难民继续向北走去。法军纵队则朝西北方向前进。两队人马在一处岔开的小路口分道扬镳。

整场交谈中一言未发的若马尔，在神甫走远之前问他：

“你们在开罗的教堂，圣塞尔吉教堂，被烧了吗？”

“没有，先生。还没有。但它会被烧的。”

“您怎么知道？”

“因为它总是会被烧。每二十年，每三十年。这就是埃及的历史。你们只是路过。”

行军第八天，他们穿过一座居民已逃散的村庄。房门紧闭，街道空无一人，一间才被遗弃几个钟头的面包铺里飘出热面包的气味。纵队没有停步。士兵们目不斜视地向前走。

几名士兵离开队列。两分钟后，他们从一座院子里走了出来。其中一人抱着一只一米高的陶罐。罐里传出金属物件的叮当声。一名军官把他们喊了回来。陶罐被丢弃在路边。

若卢瓦停下脚步。他拎起陶罐。里面有七枚托勒密时期的青铜币，三只釉砂圣甲虫，还有一件彩绘石灰岩的乌普瓦特护身符。这是一户人家的家底，他们逃走时，把带不走的东西都留下了。

“我们拿它怎么办？”若马尔问道。

若卢瓦把青铜币一枚枚细看，翻过来，在心里为它们断代。从侧面像判断，是托勒密四世或五世。圣甲虫做工精良。乌普瓦特护身符上，双眼是用红赭石勾勒的。

若卢瓦把它们放回罐中。罐子不能留在路上，否则第一个路过的人就会捡走。他将罐子放在最近一座房子的墙脚下的阴凉处，在一处他用靴跟轻轻踩出的凹坑里，好让陶罐不会滚动，放在主人归来时会发现它的地方，如果他还会回来的话。

“继续走。”

他们重新跟上纵队。陶罐留在了墙边。

第十天，他们几个月来第一次望见了大海。几名士兵喊叫起来。学者们默默地凝望。海面上的光与沙上的光不同。更冷，更灵动，是若卢瓦三年前从土伦启程时试图描绘、却始终调不出正确色彩的那种地中海蓝。

“海，”傅里叶说。

他没有再多说。他想说的是“而现在，轮到英国人了”。

第十一天清晨，在距罗塞塔二十来公里处，两名骑马的英国军官赶上了纵队。他们来自哈钦森将军的营地，带着一道签署过的任务令，命他们在法军进城之前检查其行李。

达马以冰冷的礼貌接待了他们。

“先生们，我们将带着封好的箱子进入罗塞塔。检查将在登船时进行，协定就是这样规定的，不会在此之前。”

英国中尉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名叫桑顿，他坚持。

“我们奉命核查你们是否携带弹药和军用物资。这只是例行手续。”

“这例行手续得等到登船的时候。在那之前，我的车不会打开。”

桑顿打量着车上排成一列的箱子。他看得见箱侧漆上的编号，从 I 到 LXIII。六十三只箱子，盖着帆布。

“将军，如果您拒绝检查，我们可以把你们登船的日期推迟好几天。”

“那就推迟吧。我们就在这里扎营等着。”

另一位年纪稍长的英国军官插话。

“中尉，算了。他们是学者，不是走私贩。他们的箱子里装的是石头和图稿。哈钦森将军清楚这一点。”

桑顿犹豫了一下，随后敬了礼，与同伴一起离去。

傅里叶转向达马。

“您认为他们真的会拦住我们吗？”

“不会。他们是想看看我们的反应。看我们是否有什么要隐瞒。现在他们知道了，我们会捍卫自己的箱子。”

“这是件好事吗？”

“看专员是什么人。是个谈判者，那就是。是个掠夺者……”

纵队继续行进。十一点钟，罗塞塔的棕榈树出现在地平线上，随后是河口。英国的护卫舰在外海下锚。它们厨房里的炊烟在无风的天空中笔直上升。

这一夜，他们在距罗塞塔两小时路程处扎营。地平线上可以望见城里的灯火。还看不出轮廓，只是一片低低的、弥散的亮光。在远征之初的头几周，地平线上出现这样的亮光，意味着一座有待攻取的城市，一幅有待绘制的地图，一份有待完成的工作。今夜，它预告着英国人。

傅里叶借着一盏压低的提灯，重读若马尔备忘录的头几页。论据是站得住脚的。让他无法入睡的，是英国专员的训令中是否留有解释的余地。一个训令严苛的外交官不会听取论据。他只会记录在案，转呈伦敦。一个有回旋余地的外交官则可能被说服。在与他当面对坐之前，傅里叶无从知晓。他把纸页折好，压低了灯芯。

若弗鲁瓦自从扎营以来已把箱子查验了两遍。瓶塞都很牢靠。除了睡觉，没有别的可做了。若马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份清单，列出他打算力争归入科学仪器的物件，而不是可供扣押的珍玩。共三十二项。随后他和衣睡着了。

营火熄灭之后，若卢瓦仍坐在帐外。天空晴朗。他把挎包抱在身边，里面装着最珍贵的笔记本。明天，是英国人，是他们的专员，是备忘录，是关于什么属于谁、依据哪一条款的种种争论。

纵队于 1801 年 7 月底抵达罗塞塔。自开罗起，行军十二天。贝利亚尔的部队在随后的几周里于阿布基尔登上英国船只。学者们则争取到了携带箱子由海路前往亚历山大，悬挂休战旗，以便在那里跟随研究院藏品的命运。梅努仍据守着这座城市，自春天起被英国人封锁，自 8 月 17 日起遭到围攻。学者们被安置在港口的仓库里，箱子堆在四周。关于收藏品的谈判，要等到梅努投降之后，等英国人有能力提出要求的时候才会进行。一个多月里，梅努在谈判，英国人在耐心等候，学者们守着自己的箱子。

第四章：溃败与归途

I - 大型古物

1801 年 9 月 3 日，亚历山大投降协定签署的次日，英国专员威廉·理查德·汉密尔顿来到法国学者们下榻的港口仓库，同行的还有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他是哈钦森将军指派来主持藏品实物勘验的古物学家。

汉密尔顿是埃尔金勋爵的秘书，年方二十四岁，在剑桥受过古典古物学训练，负责统筹外交谈判。克拉克则受命逐件辨认并登记法方的藏品。他们带着一名书记员和两名士兵前来，士兵们捧着空白的登记簿。

在这些谈判中，若卢瓦和傅里叶正式代表委员会。若马尔负责捍卫测绘图件和测量仪器。他已逐一预想到对方的论点。

与汉密尔顿首次会面的前一天，他把四月间起草的备忘录改写成了法律措辞。他通宵工作。在综合理工学院，人们教他在异议提出之前就预见到它。他在埃及一次次验证了这一点，每一项被质疑的测量都是一次验证，他看不出法律为何要遵循另一种逻辑。就若马尔负责的部分而言，新的版本把物品分为三类。

第一，严格意义上的古物，即远征之前就已存在、其在埃及的存放与法国人的任何工作都无关的物品。这一类可以扣押，无须争辩。

第二，智力成果，即委员会成员完成的测量、计算、观察和绘图。这些成果在被创作出来之前并不存在。不能将它们等同于拾得之物。

第三，灰色地带，即从法国带来的科学仪器。它们既非古物也非智力成果，而是工作工具，一旦被扣押，委员会日后的工作能力就会被剥夺。

“这份备忘录非常清晰，”傅里叶说，没有从最后一页纸上抬起眼睛，“问题在于，汉密尔顿是否对清晰敏感。这可不是一个容易测量的量。”

“如果他不为所动，”若马尔补充道，“那是因为他的训令要求他无视法律上的区分。那样的话，任何论据都不会奏效。”

“您太悲观了。”

“不。我只是精确。”

傅里叶笑了。

克拉克走进仓库的院子。他在院子中央站定，缓缓转身，目光环视一周，数着箱子。六十三只。外加未装箱的物件。雕像、石棺、靠北墙堆放的石柱。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约翰·马滕·克里普斯的剑桥青年，取出笔记本，开始记录。他什么都记。箱子的数目，它们的大致尺寸，箱上捆绳的状况。

若卢瓦观察着克拉克观察藏品的样子。这是第一次有英国人见到委员会三年来所汇集的全部成果。克拉克什么也没有流露。既不惊讶，也不满意。他在清点。

“先生们，”克拉克转向若卢瓦和傅里叶说道，“根据9月2日签署的投降协定第十六条，我奉命接收阿拉伯手稿、雕像以及为法兰西共和国所汇集的其他藏品，它们现已成为公共财产，由盟军将领处置。”

随后的沉默持续了三秒钟。若卢瓦缓缓放下手中的登记簿。

“全部吗，克拉克先生？您指的是我们三年来收集的每一件物品、每一幅图稿、每一件标本？”

“第十六条就是这么说的。”

“第十六条，”若卢瓦语气冷硬地答道，“说的是为共和国所汇集的藏品。不是我们的智力成果。不是我们的科学仪器。也不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用自己的钱购得的藏品。”

克拉克翻开自己的登记簿，停在第一页。稍稍退后站着的汉密尔顿，抢在克拉克开口之前插了话。

“先生们，”汉密尔顿说，“没有人否认你们工作过。没有人否认你们成果的价值。但投降条款是明确的。克拉克先生将逐件勘验你们的藏品。你们将有机会就每一类物品陈述你们的论据。我们会倾听。我们会公平裁断。”

傅里叶开了口。他的声音比若卢瓦的更沉稳，但同样坚定。

“既然如此，汉密尔顿先生，让我们确立一套工作方法。我们将提议把物品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您逐类审议我们的论据。我们不会拒绝任何检查。但我们要求每一次扣押都要有正当理由。”

汉密尔顿表示同意。

“这很合理。克拉克先生？”

克拉克合上了笔记本。

“我接受这一程序。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我的训令很严格。对于第十六条，我没有任何权限做出超出其明文规定的解释。”

若卢瓦纹丝不动。

“而我们，克拉克先生，不打算在没有逐件争辩的情况下，任由你们没收我们三年的生命。”

与克拉克和汉密尔顿对峙的十九天里，每当有争议的物品需要科学鉴定——一张地图、一份测绘、一件仪器——被叫来的总是若马尔。他话不多，出示自己的文件，答话极为简省，令习惯了法国人那些更富修辞色彩的论辩的克拉克颇为困惑。这个角色比他自己料想的更适合他。他发现，谈判与测量并没有那么不同。必须恪守事实，不让步于无法核实的东西，并且知道什么时候沉默胜过言辞。

“您的这位同事很难对付，”克拉克有天晚上对若卢瓦说，“他什么也不让步，也什么都不夸大。这在谈判中很少见。”

“他是数学家。”

“看得出来。”

9 月 4 日清晨，克拉克带着几名助手再度到来，开始勘验研究院的藏品。汉密尔顿以观察员的身份在场。

最先审查的一类，是纪念碑式的大型古物。花岗岩和玄武岩的石棺，巨型雕像，从神庙上剥离下来的浅浮雕。对于这些物品，法国学者们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个人所有权论据。这些纪念物早在委员会之前就已存在，委员会不过是发现了它们。

“我们并不质疑你们对这些大型古物的法律权利，”傅里叶说，目光落在汉密尔顿肩头上方的某一点。“我们只是希望历史记住，发现它们的是法国委员会。而不是英国军队。”

汉密尔顿表示同意。

“我向你们保证，大英博物馆会承认这些古物是由你们的委员会发现的。”

克拉克编制大型古物的清单，汉密尔顿逐条在登记簿上核准。若卢瓦站在他们身旁，看着每一件物品被带走。

罗塞塔石碑不在清点之列。

1799年7月，法国士兵在罗塞塔附近的朱利安堡加固防御工事时发现了它，它被嵌在那座旧马穆鲁克要塞的一堵墙里，被当作建筑材料重新利用。那是一道公元前196年的王室诏令，以三种文字刻成，上方是象形文字，中间是世俗体，下方是希腊文。希腊文，人们读得懂。其余的仍等待破译。但梅努将军声称它是自己的私人财产，而仓库里没有人知道它在何处。

克拉克仍把它记入登记簿，作为暂记，保留待石碑找回后补全该条目的权利。裁断的将是哈钦森将军，而人们知道，哈钦森不会裁断得偏袒梅努。

马塞尔看着克拉克在登记簿上书写。笔尖刮过纸面，发出干涩而决绝的声响。“罗塞塔石碑。黑色花岗岩。三语铭文。梅努将军声称其为私人财产。应依据 1801 年 9 月《亚历山大协定》第16条扣押。”

马塞尔什么也没说。石碑于 1799 年 7 月被发现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开罗曾整整两夜仰面躺着，双臂举过头顶，轻轻拍打湿纸以制作拓片。他的肩膀疼了一个星期。他的手指许久都还能闻到印刷油墨混着松脂的气味。那气味刺鼻而黏腻，即使洗了三遍手也不肯散去。

他还留有二十五份完整的拓片，存放在一只扁平的画夹里，夹在吸水纸之间，保护得很好。其余的已被寄往欧洲各地。每一个符号，每一道裂纹，每一处表面的不平，都被复制下来，其精确程度是最优秀的绘图师也无法企及的。克拉克可以拿走石碑。马塞尔决心保住文本。

若马尔在他身旁，纹丝不动。他没有看石碑。他看着克拉克。

傅里叶则在页边记着笔记，字迹细小而紧凑。他已经在盘算，作为对这第一次让步的交换，能谈下些什么。

若卢瓦注视着克拉克，不露声色。他早已接受石碑要被带走的事实。剩下的是抢救其余的东西。图稿。笔记本。马塞尔的拓片。若弗鲁瓦的收藏。

克拉克从登记簿上抬起眼来。

“石碑仍留在登记册上。哈钦森将军将作出裁断。”

马塞尔转过身去，把扁平的画夹夹在腋下。他不愿看见英国士兵在罗塞塔石碑前站岗。这未免有些小气。可他还是忍不住去想。

这块石头，他触摸过。他熟知它的每一处粗糙，表面的每一粒纹理。他知道它哪里略微光滑，那是古人的手摩挲过的地方，也许是两千年前诵读它的祭司。他知道它哪里粗糙，那是它被打碎、又被砌进马穆鲁克堡垒一堵墙里的地方。

若卢瓦闭上眼睛片刻。它是布沙尔的部下发现的，由马塞尔拓印，登录在委员会的册簿上。几天之后，英王陛下军队的炮兵就要把它吊上炮架。

这与法国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同。与罗马人在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也并无不同。这条链条很长。

克拉克随后在登记簿的页边添上一句“1799 年由法国远征军发现。”

若卢瓦看着。发现。不是夺取。不是从墙里抠出来。是发现。

接着是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他是埃及本土血统的最后一位法老，于公元前 360 年至 342 年在位。绿色角砾岩冰凉。若卢瓦初次来看时，曾把手伸进里面，伸到本该安放遗体的地方。棺底光滑平整，柔滑如金属。他的统治被波斯人的第二次入侵打断。无人知道他死于何处，遗体是否曾被运回。这具石棺大概是在他出逃之前备好的，从未派上用场。发现于亚历山大阿塔林清真寺的院子里，在那里被当作净礼用的水池。棺壁上的装饰，沿用了《阿姆杜阿特》的若干段落，即太阳穿越冥界十二时辰的夜间旅程。若卢瓦曾在国王谷临摹过同样的场景。他一眼就认出了它们。同样的诸神，同样的旅程，镌刻给一位还没来得及在这具石棺里死去的国王。

克拉克仔细查看。他问起重量。

“重达数吨。长三米多，”若马尔说。

“它的历史价值呢？”

“埃及最后一位本土法老的陵墓，”若卢瓦说，“它从未被使用过。”

克拉克在登记簿上记下，没有发表评论。

还有一尊灰色花岗岩的阿蒙大祭司像，与真人等身，双手在身前合拢，是神明仆人永恒的姿态，若卢瓦在上埃及的神庙里见过它被复制几十次。还有一只巨大的花岗岩拳头，是一尊王像的残片，其余部分从未被找到。若马尔估计，完整的雕像应有十二至十五米高。单是这只拳头，就已到一个站立的人的肩头。

随后是石碑，即石灰岩和玄武岩的纪念铭文，刻有王名圈和象形文字。克拉克当天只是清点了数目。铭文的勘验留待以后。总重量相当可观。

“这些物品，”汉密尔顿宣布，“将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向全世界的学者开放。你们的科学贡献将得到承认。标签上将注有‘由法国远征军发现，亚历山大投降时让与英国军队。’”

9 月 4 日的上午，大型古物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阿蒙大祭司像、石碑都已登记在册，罗塞塔石碑不久也将加入其中。剩下要捍卫的，是其余的一切。若卢瓦被过去几周耗得精疲力竭。他丝毫无意松手。

“我准备好讨论一切。但我要提醒你们，没有对每一类物品的事先讨论，我不会接受任何扣押。我们有的是时间。投降协定给了我们撤离之前的几个星期。”

一直默默听着这番交锋的汉密尔顿插话了。他宁愿谈判，也不要粗暴的对抗。克拉克负责勘验，有争议之处由他裁断。双方摆出各自最初的立场，辨明哪些方面一致、哪些方面分歧，并商定了一份工作日程，由克里普斯誊清。

当晚人们便得知了石碑的下落。一位军官，研究院的成员，领着克拉克、克里普斯和汉密尔顿走进梅努官邸后面的小巷。石碑就睡在那里，盖在地毯下，混在将军的行李之间。哈钦森立即得到了通报。一切在一天之内就定了下来。

9 月 4 日晚上，法国学者们聚在仓库旁的一间厅室里。屋子的天花板很低，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不成套的椅子。外面听得见英国士兵站岗的声响。武器碰着背带，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

傅里叶提出了那个没人愿意说出口的问题。

“大型古物已经丢了。罗塞塔石碑，石棺，雕像。现在必须保卫那些还保得住的东西。”

若卢瓦望着他，没有作答。马塞尔立刻开了口。

“我的拓片。这没得商量。我有二十五份罗塞塔石碑的完整拓片。”

“博物学的收藏也一样，”若弗鲁瓦补充道，“每一件标本我都是冒着性命得来的。每一条在沙漠里捉到的蛇。每一只在四十度高温下采集的昆虫。必要的话，我会躺在箱子前面。”

傅里叶叹了口气。他早料到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箱子辩护。

“先生们，”他字斟句酌地说，“让我们现实一点。大件已经被带走了。汉密尔顿有权利，也有实力。我们有耐心，也有计谋。我建议把力量集中在仍可守住的东西上——那些在智识上无可替代的东西。图稿。笔记。手稿。”

若卢瓦站起身。

“不。”

若卢瓦站着，双手平放在桌上。

“不，”他重复道，“我们什么都不牺牲。我们要捍卫一切。每一件物品，每一幅图稿，每一件标本。克拉克必须为每一次扣押说明理由。他必须为每一次拿取提出论证。我们要用细节、类别、法律上的例外把他淹没。他想要全部？那他就得把全部都谈一遍。一件一件地谈。”

若马尔表示赞同。

“若卢瓦说得对。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让步，就等于发出信号，表明我们接受扣押这一原则。之后，克拉克就会来

取走其余的一切。必须处处坚守，只有在再也无法抵抗的时候才让步。”

若弗鲁瓦盯着他看。

“具体说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加抵抗，任由克拉克拿走剩下的东西？”

“正是如此，”若卢瓦说，“我们为一切而战。该输的我们认输。但我们要让每一次让步都付出代价。汉密尔顿会记得，我们没有白白送出过任何东西。”

傅里叶望着若卢瓦，铅笔悬停在纸页上方。他们会输。但至少每一寸阵地都将被捍卫过。

“好吧，”傅里叶说，“我们捍卫一切。但我们要保持协调。谁也不许在角落里单独谈判。每一个论据，在送到汉密尔顿面前之前，都要先过这张桌子。”

其他人点头同意。马塞尔开了口，声音更轻柔了些。

“万一全输了呢？万一汉密尔顿连拓片也扣押了呢？”

若卢瓦重新坐下。他已恢复了平静。

“不会全输的。汉密尔顿不是掠夺者。他是个外交官。他有训令，但也有公平之心。凡是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他会让步。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的论据无可争辩。”

无人再说什么。窗外，换岗的卫兵从窗下走过。

II - 得以保全的收藏

学者们的个人科学仪器——天文望远镜、大地测量经纬仪、气压计、温度计、精密天平、显微镜——毫无争议地被认定为不可扣押的私人财产。汉密尔顿明白，这些仪器与古埃及毫无关系，是学者们的职业工具。至于其余的一切，英国人都将逐项细究。

9月9日，克拉克勘验了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博物学收藏。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先生，”克拉克说，“我奉命检查您的标本。请您行个方便，让我查看您的箱子。”

若弗鲁瓦的反应与若卢瓦和傅里叶不同。

“你们休想碰这些收藏，”他一边喊，一边挡在士兵和他的箱子之间，“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一切都烧掉。”

“您是以委员会正式成员的身份采集的，”克拉克说，“因此它们是法国的公共财产，因此也就是英国的战利品。逻辑链条就是这样。这不是我发明的。”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不肯听。

“你们想窃取我的劳动成果，去充实你们的博物馆。而你们自己连一点探索的努力都没付出过。你们爱怎么称呼都行。我称之为盗窃。”

“我不信，”克拉克说，“您不会毁掉三年的心血。”

若弗鲁瓦穿过房间，打开一只装干制标本的箱子，掏出一只火绒打火器，打了两下，点着了火。火苗离干燥的稻草只有十厘米。

“我不是虚张声势。再走一步，我就点火。历史会记住，你们也在亚历山大烧毁过一座图书馆。”

克拉克望着火苗。这位博物学家二十九岁，手很稳。与其带着一堆灰烬回伦敦，不如让若弗鲁瓦带着他的玻璃罐离开。他后退了一步。

“您的激情令我敬重，”克拉克一边后退一边说，“尽管您的手段颇具戏剧性。如果这些收藏能在法国保存下来，普世的科学将从中受益。我会向哈钦森将军为此事陈情。”

“守得好，”当晚若卢瓦对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说，“对于大型古物，或许本该像您那样做。”

“大型古物太显眼，太引人注目了。我那些装鱼的玻璃罐，英国军官们并不感兴趣。有时不被理解反而是一种优势。”

这件事对其他谈判产生了连带效应。学者们看到，坚定的抵抗是可以见效的，前提是选好自己的战场。

受这一榜样的鼓舞，若卢瓦在委员会图稿的出版问题上进一步施压。一封波拿巴的信于 9 月 10 日抵达亚历山大，距投降协定签署已过去八天。信是春天在巴黎写的，经外交邮路，通过奥斯曼的中间人，辗转了数月。傅里叶在临近中午时收到了它，当时克拉克正在查验石碑上的铭文。

信很短。波拿巴是以第一执政的身份写的，而不是以将军的身份。头衔变了，语气也变了。他在信中称赞了委员会的工作，表示相信委员会有能力抵御英国人的要求，保住收藏，并许诺其成果将在执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出版，最后一行还补了一句，说巴黎正等着他们回去。

巴黎正等着他们回去。傅里叶把这句话读了三遍。波拿巴并不知道，一边看着被英国人看守的罗塞塔石碑，一边读到“巴黎在等待”，是什么滋味。这既不是残忍，也不是漠然，只是巴黎已经望见了后来的事。波拿巴没有写“为你们失去的收藏，我深感遗憾”，也没有写“我本会换一种做法”。他写的是“巴黎在等待”。仿佛这里发生的一切——这三年，这些死者，克拉克刚刚记入登记簿的罗塞塔石碑——都只是某件将在那边开始的事情的序曲。

傅里叶把信折好，塞进了马塞尔装拓片的文件夹里。它将与他同行。他不确定到了巴黎之后该拿它怎么办。多半什么也不会做。没有人会回复第一执政的来信，对他说您的措辞在我看来有些轻率。

他回到谈判中。克拉克已查验完石碑。若卢瓦要求不受限制地在法国出版委员会的图稿，这等于要求汉密尔顿放弃英国对埃及古物图像传播的一切控制。

汉密尔顿犹豫了。这样的让步幅度太大。但他同时也明白，拒绝委员会出版自己图稿的权利，在法理和道义上都站不住脚。他答应了，唯一的条件是，每一幅已出版的图版都要寄一份副本给大英博物馆存档。

“每一幅图版寄一份副本，”若卢瓦说，“这不成问题。无论如何，为了商业发行，我们都需要多份印本。”

这项协议保证了集体编撰的《埃及志》得以出版，同时也为德农的《上下埃及游记》开辟了道路。德农 1799 年便已回到法国，他将于 1802 年让这部书问世，那时《埃及志》尚未完成，而这部《游记》将成为关于古埃及的第一部大获成功的出版物。

植物标本集的问题引发了一场附带的争论，没有博物学收藏之争那么戏剧化，却也揭示了这场谈判的利害所在。委员会的植物学家们汇编了收有数千件埃及植物标本的标本集。沙漠植物，尼罗河植物，开罗园圃里栽培的品种。

克拉克想扣押其中的一半。植物学家们辩称，这些标本集构成连贯的系列，将其拆分会大大降低其科学价值。一份被拆散的标本集，无法进行完整标本集才能开展的比较研究。

汉密尔顿坚持己见。学者们只能接受。

克拉克接着转向最含糊的一类，即法国学者们声称是用自己的钱从费拉或古董商那里购得、而非由委员会正式发现的小型古物。

这样的东西有数百件。彩绘木质和施釉釉砂质的丧葬俑，半宝石质的护身符，刻纹圣甲虫，纸草残片，小型青铜像，陶器，珠宝，古代工具，纺织品残片。法国学者们辩称，这些物件是他们在当地市场上自行购得的，属个人的商业购买，而不是官方的考古发现。

克拉克仍持怀疑态度。

“要证明每一件东西是买来的而不是挖出来的，根本不可能，”他说，“想必诸位并没有留着在集市上购物的全部收据。”

傅里叶承认这确有困难。

“我们并非始终都有严谨的账册。但要把这些藏品逐件分开，得耗上好几个星期。我提议折中一下。由我们挑选一半，我们留下。另一半归大英博物馆。”

汉密尔顿接受了。

“合理。而且更快。我们就这样办。”

接下来的几天里，法国学者们忙着挑选要留下的物品，优先选取科学文献价值最高或历史意义最重大的那些。他们尤其留下了几份写有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的纸草文献，出自同一座墓葬的成套随葬俑，以及刻有不同法老王名圈的圣甲虫藏品。

汉密尔顿这边，则挑选了视觉上最为惊人、足以打动大英博物馆观众的物品。有埃及神祇的青铜像，金银首饰，以青金石和红玉髓精雕细琢的护身符，还有品质上乘的彩绘陶器。

这一划分虽然让法国失去了许多珍贵的物品，但毕竟保住了相当大一部分小件古物，它们日后将充实 1827 年落成的卢浮宫埃及博物馆的馆藏。

木乃伊带来了一个特别的问题。汉密尔顿主张，木乃伊显然属于可以扣押的埃及古物。法国学者则坚持认为，木乃伊主要具有解剖学上的科学价值，而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博物馆价值；留在能够研究它们的法国博物学家手中，更有益于科学。

汉密尔顿经过思量，同意了一项安排。法国学者可保留几具动物木乃伊和一具品相平平的人类木乃伊，供解剖研究之用；英方则取走保存最完好的王室或贵族木乃伊，用于公开展览。

“这样我很满意，”汉密尔顿说，“每一类物品，我们都找到了可以接受的办法。”

傅里叶回答时语气干涩而不失礼数。

“一个办法……我们一直很有建设性，汉密尔顿先生，因为强权在你们一边。我只请求你们允许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在案，我们认为这次扣押是不公正的掠夺。三年的劳作。还有苦难。”

汉密尔顿没有反驳。这样的抗议他已听过多次，也知道它会被送往巴黎，写进回忆录，或许有朝一日还会被公之于众。他并不想抹去法国人的怨愤，只求执行自己的训令，同时把不必要的损害降到最低。

此后几天都用于小件古物的实际清点。每件物品同时登记在两份清单上，一份由一名英方秘书记录，另一份由马塞尔记录。每日傍晚，人们在灯下逐行核对两份清单，以确保没有物品被遗漏，也没有未经双方同意就被挪动。这套规程繁琐。此后再无任何争议。

象形文字铭文拓片的问题，事实证明争议稍多一些。汉密尔顿主张，这些拓片是埃及铭文的复制品，因此可以被视为属于第十六条所提到的“其他藏品”一类。

马塞尔早已周密准备好了自己的辩护，他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扩大化的解释。

“这些拓片不过是纸和墨，”他说，“不是可供展出的古物，只是语文学家的工作文件。大英博物馆也不知道拿它们做什么。留给我们吧。”

汉密尔顿思索片刻才作答。

“你们的笔记是你们的笔记。我在这里要找的不是这个。”

他干脆利落地搁下了笔。

“留着吧。原件在我们手里。”

拓片将留给法国人。马塞尔从第一天起就料到了。

委员会保住了最要紧的东西，而最要紧的东西并不在那些大木箱里。它在铜管和皮夹之中。它们在船舱里分量不重，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分量却要重得多。

手稿和科学笔记的问题，解决得对法国人更为有利。汉密尔顿毫不费力地承认，这些文件属于个人的智力成果，与实物性的埃及古物截然不同，因此不能作为战利品扣押。

9月15日，汉密尔顿要求查看若卢瓦及其画家同僚在远征期间绘制的全部图稿。若卢瓦呈上了他的速写本。

“汉密尔顿先生。法老的雕像没有我也存在。这些画却不是。在我落笔之前，它们并不存在。没收一件个人作品，不是征用，而是盗窃。”

汉密尔顿久久地审视着那些画。

“您的画是您的作品，不是古物。请留着。我只要求五十来份摹本，送往大英博物馆。原件仍归您。”

要交出的摹本由若卢瓦亲自挑选。随后他停了片刻，一只手仍按在速写本上。

古钱币的问题险些重新点燃一场原以为已经平息的冲突。委员会的学者们合计拥有数百枚希腊、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钱币，采自三角洲和尼罗河谷的各处遗址。汉密尔顿主张这些是可以扣押的古物。学者们则辩称，这是他们为自己的钱币收藏而进行的个人购买。

“每一枚钱币都是某位学者买的，”马塞尔说着拿出一本笔记，他曾以无人要求过的先见之明，在上面记下了每一次购买的价格、日期和卖主姓名，“这就是登记册。”

汉密尔顿仔细查看了那本笔记。这份记录显然早于谈判就已开始。它不可能是为了眼下的需要而伪造的文件。他接受了这一论据，把钱币留给了学者们，只有十五枚左右的珍品除外，马塞尔同意让给他，条件是为最庞大的那些箱子提供额外的运输便利。

汉密尔顿就是这样行事的，对训令的大原则毫不松动，对细节则灵活变通。

若卢瓦得知此事，心存感激，却没有表露出来。谈判之初，他曾担心对方是个没收者。

“我宁可放过几件东西，也不愿开创任意妄为的先例，”汉密尔顿说，“若是法国人怀疑我们在规则之外没收财物，往后我们就得不到他们的合作了。”

III - 掠夺的伦理

9 月 17 日清晨，若卢瓦独自走出门，来到亚历山大的街上。他没有什么特别要画的，只想走一走。谈判持续了十四天。会议记录几天后就要签署。此后，便再没有什么需要捍卫的了。

他穿过商人区，没有停步。城市依旧。最让他触动的正是这一点，城市依旧，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井边的妇人，窄巷里的骡子，热面包和茉莉花的气味。

他在一家装订匠的铺子前停下。那人坐在门口干活，缝着一帖帖书页，动作缓慢而细致，那是一双从小就熟知这一动作的手。他抬眼看了看若卢瓦，又低下头去继续手上的活，并无特别的好奇。又一个法国人。三年里他见过不少。往后还会见到别的人。奥斯曼人，英国人，马穆鲁克。针又在书帖里穿行起来。

若卢瓦看他干活。磨旧的工具，不假思索的动作，被岁月的摩擦磨得光亮的工作台。罐里加热的胶散发的气味飘在街上，甜甜的，微微有些呛。

若卢瓦没有同他说话。没有翻译在旁，他只是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向港口。英国舰船就停在锚地，静静等候。码头上箱子越堆越多。大件古物几天后启运。他自己稍后也将乘其中一艘船离开。挎包里是他的速写本。英国人的箱子里，则是罗塞塔石碑和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

他想到了那位装订匠。装订匠做簿册，他则把簿册填满。簿册将去巴黎，箱子将去伦敦。一百年后，两百年后，会有人翻开这些簿册，看到 1801 年的埃及。神庙的石柱和王室的陵墓，却没有装订匠，也没有那条街。那是若卢瓦自己选择描绘的。而他舍弃的东西——日常的城市，普通的人们，双手的劳作——将无处可寻。

他画下了港口、码头和锚地里的船。随后，在纸页的一角，凭着记忆，画下了装订匠按在书帖上的双手。他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因为那双手哪里也不会去。它们将留在这里，留在这条街上，继续做簿册。

他端详着这幅画。那双手，敏捷而稳当，老茧长在恰当的位置。那双手从未离开过这条街，也无须离开。这手艺学得那么早，已经成了身体本身。他想到自己那双沾满墨迹的手。想到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他懂运河，靠的不是测量数据。想到那位科普特工匠，他的手懂得纸张。

当晚，汉密尔顿派人送来一张便条，请求次日来和他们共进晚餐，不带秘书。若卢瓦把便条拿给傅里叶看。

“他一个人来，”傅里叶说，目光没有离开便条，“不带秘书。”

“那就是作为个人来的，”若卢瓦说，“不是作为专员。”

傅里叶放下便条，翻到背面，找一个并不存在的日期。到对手这边来，不带秘书，不讲礼仪，是想说些任何报告里都不会有的话。他会代表众人应下。

9月18日晚，汉密尔顿如约来到法国人的住处。他是一个人来的。

桌子是一扇架在木架上的门板。面包，山羊奶酪，还有一瓶本地产的葡萄酒，谁也没有去评头论足。傅里叶在座，若弗鲁瓦在座，马塞尔也在座。屋外，士兵们正把箱子搬上大车。能听见木头擦着木头的声响。

他们默默地吃了一阵。要求登门的是汉密尔顿。他们在等着知道原因。

“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他终于开口，“就是你们在亚历山大研究过的那一具。明天启运去港口。我想当面告诉你们。”

若卢瓦慢慢放下酒杯。奈科坦尼布的石棺是绿色角砾岩的，长逾三米，通体刻满《阿姆杜阿特》的铭文。他曾

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描绘它。他记得光线落在角砾岩上的样子。不是反光，而是吸收，仿佛石头为自己留住了光。那些象形文字刻得极为精准，历经二十个世纪，仍能分辨出鸟的羽毛和蛇的关节。

“这具石棺，”傅里叶说，“在我们之前就在亚历山大了。阿拉伯人把它改作净礼用的水池。是我们把它从那里弄出来的。是我们研究了它。”

“我知道。我们在波科克的旅行记述里也见过对它的提及。这正是我想当面告诉你们的原因之一。移动过它的，你们不是头一批。”

屋外，一只箱子撞上了另一只。有人用英语骂了一句。

“让我不安的……”若卢瓦说，“不是你们拿走它。一百年后，一个埃及人要想看到自己某位法老的石棺，就得来伦敦。”

汉密尔顿望着自己的酒杯。傅里叶则望着那个望着酒杯的汉密尔顿。

“如果一百年后有个埃及人想看这具石棺，”汉密尔顿说，“那是因为有人教过他这是什么。而那个人多半是依据你们的图稿和测绘来研究的，而不是依据石头。”

“这是一种辩解。”

“是的。我们对自己在这里所做之事给出的一切回答，都是如此。”

一时之间，没有人动筷。马塞尔给自己斟满酒，那份精确，一如他做每件事时的样子。

“这具石棺，”马塞尔头也不抬地说，“在阿拉伯人之前就已经几度易手了。它从未盛放过奈科坦尼布的遗体，最后流落到亚历山大。有人把它改成了水池。后来，阿拉伯人把它安放在阿塔林清真寺的院子里，供净礼之用。

我们测量了它，描绘了它。你们要把它展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占有埃及的方式。”

“而埃及自己，却没有说话的份。”

若弗鲁瓦望着天花板。

“又不是埃及邀请我们来的。”

谈话刚刚触及了汉密尔顿未曾预料的东西。他想到自己的指令。扣押古物，维护公平。指令里没有提到埃及人。没有人想过把他们写进去。他没有回答若弗鲁瓦。

“如果有朝一日埃及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傅里叶接着说，“并索要它的财物，大英博物馆会如何回答？”

“回答的不会是我。会是另一个人，在另一种情势之下。我无法为下个世纪作出承诺。”

傅里叶记下了这个回答。它是诚实的，也是不充分的。但那天晚上，处在汉密尔顿这个位置上的人，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几年之后，在为*《埃及志》*撰写序言的笔记中，他会重新找到这句话。他不会把它写进去。它过于私人，与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见证人的夜晚联系得太紧。但写下它时，他会想起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第一个起身。他为这顿晚餐道了谢。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脚步。

“如果哪位法国学者想到伦敦查看这具石棺，我会为他提供方便。”

若卢瓦目送他离去。屋外，士兵们仍在装货。亚历山大的夜色从窗口涌进来。阿拉伯语的人声，一条狗，港口的气味。

“我们对他说的每一件事，他都认了我们有理，”马塞尔说，“可石棺他还是拿走了。”

第二天早晨，若卢瓦穿过院子时，奈科坦尼布的石棺已经不在那里了。原地只剩沙地上一道长方形的印痕。

9月22日一大早，一位埃及商人来到仓库门前，请求面见汉密尔顿。

他名叫马哈茂德·塔维勒。他在亚历山大的科普特区开着一家古董店，离港口只隔两条街。他十五岁的儿子陪着他，充当翻译。若卢瓦恰好从院子里经过，见他们到来，便停住了脚步。

汉密尔顿在充作办公室的那间屋子里接见了他们。一张桌子，四把椅子，还有秘书两个星期来一直在整理的成堆会议记录。马哈茂德·塔维勒把一张折起的纸放在桌上，等儿子翻译完毕。

他声称，英方那批小件古物中的几尊小雕像，是 1798 年被法国士兵从他那里偷走的。他要求归还。

“他说，他父亲是从自己的父亲手里得到这些东西的，”儿子翻译道，“它们在家里已经传了三代。占领的第一个星期，士兵们从店里把它们拿走了。他有证人。”

汉密尔顿听着。他看了看那张折起的纸。上面是用阿拉伯文描述的八件物品的清单，旁边标注着皮亚斯特的数额，那是他父亲当年购入时付的价钱。他要求见证人。儿子出去，领回来两个同街区的男人，他们证实，在法国人到来之前，马哈茂德·塔维勒确实拥有这些东西。

若卢瓦已走近门口。他认出了其中一尊小雕像的描述，一尊青铜小像，是站立的奥西里斯，双臂交叉，高约二十厘米。他画过它。不是在这个人家里，而是在 1798 年最初那几天，宿营地一只敞开的箱子里。他当时没有问它从哪里来。

“这些东西我无法还给您，”汉密尔顿说，“它们属于一次经投降条约认可的正式扣押。在这样的背景下，逐件归还的程序在法律上是一团乱麻，无从理清。”

儿子翻译了。马哈茂德·塔维勒听着，神色没有变化。他问了一个简短的问题。

“他问，这些东西现在归谁？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英国人。它们在英方扣押的箱子里。”

又是一个简短的问题。

“那他问，既然东西在英国人手里，英国人为什么不能归还？”

汉密尔顿花了些时间斟酌措辞。这并非强词夺理。这是一套本不是为此类问题而设计的制度所能给出的实话。

“因为这些东西如今已是国家扣押物的一部分，受国际条约规范。个人权利，即便正当，也无法在这一框架内处理。那将开启一个没有尽头的程序。”

儿子翻译了。马哈茂德·塔维勒听完，点了一下头，说了句什么。

“他说他明白。他还说，无论如何，请记下我的名字。”

汉密尔顿记下了。他写下姓名、地址、八件物品的描述，以及两名证人的名字。他在那一页上签了字，把一份副本交给马哈茂德·塔维勒。

商人接过纸，仔细折好，塞进长袍里。他道了谢，语气并无暖意，随后和儿子一起出去。在院子里，他停了片刻，望着靠墙堆放的箱子。随后他朝城里走去，儿子跟在他身后一步远。

若卢瓦仍站在门框里。他想着那尊奥西里斯青铜小像。想着自己速写本里画下它的那一页。小像将去伦敦。画将去巴黎。马哈茂德·塔维勒的名字，将留在一份英国人

的登记册里，多半永远不会有人再去翻找。这一切都已记录在案。这一切，没有一样会被归还。

被剥夺财产的物主，正当的诉求，而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能力公平地回应。

9月22日晚，最终的会议记录在仓库的院子里签署了。

院子里摆好了一张桌子，位置与前几个星期相同，仍在那顶帆布遮棚下，只是九月的阳光已把遮棚的下沿晒得褪了色。汉密尔顿的秘书把文件的两份副本并排放好，一份用法文写成，一份用英文写成，各附有编号的附件。每份二十二页。秘书把羽毛笔、墨水瓶和火漆印章都排列整齐。他做这一切时，带着那种明白自己的工作将被存档的人所特有的一丝不苟。

汉密尔顿最先到场，带着两名军官作见证人。傅里叶与若卢瓦代表法方。若马尔也在，站在后面，没有任何正式身份，却执意要亲眼看看。

汉密尔顿第一个签字。礼仪如此要求。强加条件的一方先签。他毫不迟疑地签了，那动作出自一个已在许多国家签过许多文件的人。

傅里叶拿起笔。他握着笔停了片刻，没有落下。决定早已作出，别无选择。剩下的只是手去接受心智早已接受之事所需的那一点时间。他签了字。墨迹在傍晚的暑气里很快就干了。

随后是若卢瓦签字。秘书用双方各自的火漆给两份副本盖印，英方用红色，法方用蓝色。每个印章都在柔软的蜡上留下清晰的印痕，伴着一声闷响。

若马尔下意识地数了数附件。共四十四页。这些纸页里，有英方扣押的大件古物清单，有认定归法方所有的科学藏品清单，有互相查阅的条款，有运输的保证。这些纸

页中，没有一处写明奈科坦尼布的石棺有多重，也没有写明若卢瓦描绘它的那一天有多漫长。

两份副本分别交给了双方。汉密尔顿把自己的那份塞进公文包，没有再看一眼。傅里叶把他的那份在手里托了一会儿，仿佛在掂量它的分量。伦敦在一边，巴黎在另一边。仍留在那些小巷、集市和发掘工地里的，并不属于桌边的任何一个人。

几秒钟里谁也没有开口。随后一名英国军官轻咳了一声，所有人同时动了起来。

汉密尔顿最后又说了一句话，若卢瓦觉得措辞恰如其分。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后世自会评判。未必对我们有利。我们至少尝试过……某种公平。”

若卢瓦没有回答。他累得没有力气谈哲学。但当晚他就把这句话记进了速写本，连同日期和情境。它不会出现在任何出版的著作里。

IV - 告别

藏品分配敲定之后，法国学者与英国专员在九月的最后几天里，把各自要运往目的地的物品打包。

英方的大件古物自 9 月 4 日起便已登记在册。克拉克的人只需把它们装箱，并检查绑带和封印。仓库的院子里，箱子、其他石棺，以及装在大车上的雕像，都等着装船，不会再有人去打开它们。

若卢瓦默默地看着这些准备工作，心中既有苦涩，也有无奈。这些东西将去往伦敦。他再也不会见到它们了。他还剩下自己的画稿，它们将保存那些已为法国所失的古迹的记忆。

9月24日，汉密尔顿前来感谢若卢瓦和傅里叶在谈判期间所给予的有限合作。

法国学者这边，则把他们设法保住的藏品装箱。

每位学者都为自己带走的一切编制了详细的清单，一件件列明每件物品、每份手稿、每幅图画。

9月25日，在一名英国军官与傅里叶的共同监督下，进行了初步检查。每只箱子都被打开，按清单核对内容，然后重新封好。

9月26日晚，所有的打包准备工作均已完成。法国学者们已准备就绪，一俟英国船只可用，便登船返回法国。

9月26日那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若卢瓦召集助手做最后的核对。他让人把每一只装图稿的金属管都打开重新检查，查看管塞是否严密，管身有无裂缝。成捆的文稿、成箱的笔记、成夹的拓片，他也都照此办理。委员会要带回法国的一切，装在几只箱子和几卷铜管里就够了。

“我们没有落下什么吧？”

“没有什么要紧的。测量仪器在三号箱。建筑测绘笔记在四号箱。您的画稿在一号至二十三号管里。马塞尔的拓片在夹子里。研究院的日志在五号箱。”

若卢瓦看着那些金属管。管子里，卷起来，用棉纸垫稳，放着的是那些图版，它们呈现了军队所走过的整个古埃及，化为厚纸上的线条与排线。如今这些纸比古迹本身更珍贵，因为它们可以通过雕版无限复制，而且比任何石头都更能穿越时间与空间。铜在他的掌心下冰凉。

9月26日至27日夜里，若卢瓦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金属管沿着他左手边的墙排成一列，他整理着自己画稿的索引，一份按字母和主题编排的清单，列出所有已记录的古迹，按遗址、时代和建筑类型分类。

这份索引，他在凌晨四点左右完成，将成为日后那部《埃及志》的第一份目录。它列出了两千零八十七幅画，涵盖一百八十六处不同的遗址，南起菲莱岛，北至亚历山大。对每一幅画，他都注明了它是全景、建筑细部、铭文，还是人物形象。

黎明时，他卷起索引，把它放进一号管，连同他最珍贵的几本速写本，并用手掌把管塞按紧。

箱子的最终封印于 9 月 27 日上午十点加盖。一名英国军官，两名法国见证人，还有一名为此临时充任的军中公证人。这些箱子将渡过地中海，汇入法国的国家藏品。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这是一场局部的胜利。公证人吹了吹封蜡。

若马尔打算日后在回忆录里描写这一幕，因为它封存了一个时期。二十三岁的他，身后留下的是生命中一段与其他任何时期都不相像的岁月。

而若卢瓦想的不是未来。他想的是那些只匆匆瞥见过的南方遗址。是所有他没来得及画下的东西。

9月29日，法国学者们得知，用于送他们回法国的英国船只，一个多月之内都无法接载乘客。只能等待。

10 月 31 日上午，法国学者们接到正式命令，要他们做好准备，次日登上英国的运输船，经由马耳他返回法国。

登船之前，汉密尔顿最后一次拜访了法国学者。他带来了官方通行证，凭此可让他们的箱子通过英国的港口检查。这份文件签了字、盖了章，是正式的保证，确保最后一刻不会有人试图扣押他们的物品。

“这是你们的通行证。祝你们归途顺利。”

他把那叠文件递给若卢瓦。若卢瓦接了过去。

“我也祝您善用您带走的东西。”

汉密尔顿短促地笑了笑。他明白了。所谓善用他们带走的东西，就是出版那些图版，向各国学者开放，从中得出不会被锁在巴黎的知识。这将是他对自己在此所作所为所能给出的唯一辩解。

“我们会尽力的。”

仅此而已。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最后一晚，学者们聚在一起，没有汉密尔顿，也没有英国军官。他们吃得很少，谈得很久。人人都有遗憾，一处错过的遗址，一段没有抄录的铭文，一座再多一年便可测绘的神庙。谁也没有大声说出这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二次，但人人心里都这么想。

10月31日至11月1日夜里，若卢瓦躺在仓库的草垫上，听着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这三年的光阴纷乱地涌回心头。在亚历山大登陆，穿越沙漠的行军，初见金字塔，上埃及的神庙，开罗的暴动，罗塞塔石碑，克莱贝尔之死，与汉密尔顿的谈判。这一切在他看来，仿佛都属于另一种人生，由一个比如今的他更年轻的人度过。

黎明时他起身，最后一次去查看那些金属管，然后走到码头上。海面在尚显昏暗的天空下平静无波。西边还留着几颗星。锚地的船上亮着灯笼。几个小时后，他就在船上了。几个星期后，就到巴黎了。

11月1日早晨，各人依性情，告别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若卢瓦最后一次拜访了亚历山大的一位谢赫。那位谢赫曾在爱资哈尔求学，两人此前常就法老时代的古迹交换看法。他是个年迈的饱学之士，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却不懂法语，曾久久端详若卢瓦拿给他看的那些画。

“他说，法老们是巨人，”翻译转述道，“是为永恒而建造的巨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在那里生活。”

“他也许没有说错。这些古迹比占领过这片土地的所有帝国都活得长久。它们也将比我们的帝国活得更久。”

谢赫又说了句别的话。翻译迟疑了一下才译出来。

“他说你们看这些石头，仿佛它们有灵魂。这很好。这个区别很重要，即便你们已经离去。”

若卢瓦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紧接在 wakil 阿卜杜拉的那句话之后。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相隔一年，却谁也没有把这种投向他们国家的目光看作无足轻重。

上午将尽时开始登船。英国船只在离码头几百米处抛了锚。几艘小艇在码头与船只之间往返接驳。法国人的箱子最先装船，这是汉密尔顿应允的，他知道学者们心中的不安。

那些是英国的运输船和战舰。锚地里还停着“埃及女人”号（l’Égyptienne），原是法国护卫舰，在亚历山大港被俘后改挂英国旗，英国人沿用了它的名字；罗塞塔石碑就预定装在这艘船上。

“小心，”若弗鲁瓦对一名水手说，那人正抓着他一只标本瓶箱子的一侧往上提，“全是瓶子。易碎。”

水手双手重新抓起箱子，掂量它是否平衡，然后把它与其他箱子一起放进了小艇。若弗鲁瓦没有再说什么。

让他放心不下的是舱内的位置。货舱昏暗、潮湿、通风不良，还要承受船身颠簸和海浪的撞击。装酒精的标本瓶是最严重的问题。若是风暴中有箱子在舱里翻倒，若是木板在撞击下裂开，标本瓶就会破碎，酒精就会流淌出来，而一旦附近有盏灯笼，货舱里便有起火的危险。他已向英国船长指出了这一风险，船长允许把最易碎的几只箱子放在下层甲板上一处便于看管的地方。

若卢瓦最后一个登上小艇。他从水面的高度最后看了一眼亚历山大。平顶露台的白色房屋，修长的宣礼塔，建在古代灯塔废墟上的城堡，而在这一切之后，沙漠已然开始，尼罗河谷向南消失，还有军队只是匆匆经过的所有那些古迹。

“要看的东西还那么多，”他喃喃道。

“永远都会有的，”同乘一艘小艇的若马尔说。

小艇离开了码头。若卢瓦没有回头。他眼前留着那天早晨亚历山大的模样，在十一月干燥的空气里，清晰而明亮。

上船安顿下来之后，他拒绝把自己的铜管留在货舱里。他把它们带进自己的舱房。那是位于下级军官舱的一个两米乘一米五的小隔间，里面有一张帆布铺和一只悬在顶上的挂钩。二十三根管子，约五十公斤。他把它们卡放在铺位上方的搁板上，再用绳子系在挂钩上。

头一夜他几乎没有睡。船每动一下，绳子便绷紧一下，管子轻轻磕在舱壁上。他在黑暗中听着它们。

若马尔把自己那几箱测绘资料，经与大副商定，用绳索固定在舱壁上，如同固定炮械一般。这是军中防颠簸的法子。

“您以前运送过这样珍贵的地图吗？”大副问他。

“没有。不过我见过你们是怎么固定火炮的。”

大副点了点头。这合乎情理。

船上，法国乘客，无论学者还是士兵，与英国船员混杂在一处，而这里原本只为他们人数的三分之二设计。两派依旧泾渭分明，法国人在船头和左舷，英国人在中部和右舷。可在狭窄的过道、舱廊和梯子上，他们一天要擦肩而过二十回，彼此却不交一语。

学者们在其中看到的，主要是荒谬。他们乘着刚刚夺走罗塞塔石碑和奈科坦尼布二世石棺的那些人的船，返回法国。还是那支舰队，当年在阿布基尔击沉了他们自己的舰队。

若卢瓦在当晚的信里就是这样写的。这封信他没有写完。

“我们乘着战胜者的船回到法国，口袋里装着他们的通行证，而罗塞塔石碑正等着“埃及女人”号的货舱。我们从埃及人手中夺取了埃及，他们又从我们手中夺了回去。石头将去往伦敦。我们的画稿驶向巴黎，装在我放在铺位上的铜管里。我想，从长远看，这是一个要紧的区别。”

他重读了一遍，把信纸揉成一团扔掉了。字句不在那里。他将试着在《埃及志》里找到它们。

V - 横渡

十一月的地中海自有它的脾气。到第二天，东北风骤起，海面汹涌。船开始剧烈摇晃。好几位不惯航海的学者，头几天都躺在舱房里，唯独若马尔下到货舱去查看自己的箱子，另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每隔两小时就上去检查一遍。

若卢瓦留在甲板上。去程时他没有任何不适，在埃及的那些月份里，他与大海建立起一种平和的关系。他观察着浪涛、云朵、变幻的光线，目光与他注视古迹时一般无二，专注而不加评判。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走过来同他说话。

“您那些管子里究竟装着什么？”

“古埃及。”

军官看着他，没有听懂。

“是画稿，”若卢瓦解释道，“古迹的测绘图。铭文的摹本。三年多来我能记录下的一切。足够填满整整几大卷。”

“像百科全书那样吗？”

“带插图的，”若卢瓦说。

军官似乎满意了，走开了。若卢瓦又在甲板上待了一个小时，手扶着被浪沫打湿的栏杆。在地平线之后的某处，金字塔依然在那里。

第五天，风势减弱。海面恢复了规律的起伏。学者们重新出现在甲板上，脸色仍旧苍白，却已能站立。还没望见马耳他，每个人便已回到自己的位置，重新拿起笔记本，用手肘或茶杯压住，免得被船身的摇晃掀开。

若马尔在整理他的测量笔记，追查其中的矛盾。有几处能够化解。有两处怎么也解不开。

“看，”他说着把笔记本放在船舷的栏杆上，一只拇指按住书页以抗风，“哈夫拉金字塔的底边，东西向比南北向略长一些。不多。两百一十五米里差二十厘米。但吉萨三座大金字塔都有同样的情况。”

“是您测量的误差吗？”

“有可能。我想到过。但每一边我都用测链量过三遍，三次都……”

“那么呢？”

“那么这个差别是有意为之的。建造者们当是把地球的尺度考虑在内了。比人们……比理论的出现早了好几个世纪，总之。”

若卢瓦久久地望着他。

“把这个发表出来。”

“现在不行。这只是一个假说，仅此而已。得让蒙日重新演算一遍。在巴黎。”

蒙日早在 1799 年 8 月就随波拿巴回了法国。而测量数据与若马尔同行，装在他的一根管子里。这一成果刊载于《埃及志》的各卷之中，将被讨论、重提达数十年之久。而在那个晚上的甲板上，若马尔只是一个睡不着觉的年轻人。

若马尔没有说出口的——自离开亚历山大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曾说起的——是这一假说让他既兴奋，又害怕。如果金字塔的建造者知道地球的尺度，那就意味着有什么东西曾经失落了——不是被遗忘，而是被毁灭，被散佚，变得无从触及。二十个世纪的征服、劫掠与火灾。亚历山大图书馆。恺撒的士兵不加阅读就烧掉的纸草。历代占领者对墙壁所载内容的漫长漠视。

他从外套里取出十七号笔记本，那是他专门留给未经证实的假说的。几个月来，他在里面记下了那些抗拒立即解释的观察。神庙的天文朝向。卡尔纳克的阿蒙大神庙在五百米长度上比例毫无差错。大金字塔内部诸室与长廊的布局，其轴线在他看来，对应着某种他尚未完全重构出来的演算。

金字塔不仅仅是坟墓。也许根本不是坟墓，至少不是法国人通常理解这个词的那种意义。它们是仪器。是测量世界的机器，是把天空固定在石头里的机器，是把纸草无法保证的知识传给后来者的机器。因为纸草会燃烧。石头则不然，至少不那么容易。

他把笔记本放回外套里，重新扣好领口。这个假说太宏大，放不进一条脚注。至少要十年的工夫。他才二十三岁。

夜幕降临。地中海上的星星不如沙漠上空的明亮。他寻找猎户座，找到了，它低低地悬在地平线上，腰带的三颗星略微朝南倾斜。他一直望着，直到寒冷逼得他回舱。

他的一根管子里，在两卷油纸之间，他塞进了一张折成四折的小纸，上面抄着他在吉萨量得的底边精确数据。

后甲板上，傅里叶在写作。好几天来，他一直在寻找《*埃及志*》历史导论的开篇。那句能让读者明白，为什么埃及比其他一切古代文明都更重要的话。问题不在素材，而在语调。若采用学者的语调，他将失去那些想被打动的有教养的读者。若采用演说家的语调，他又将辜负研究院对他严谨的期待。

他已写满并撕掉了十一张开头的稿纸。这十一次尝试都栽在同一个错误上。他总是从远征写起。“1798 年 5 月 19 日，法国军队从土伦启航。”或者“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由一百六十七名成员组成。”这些措辞无可挑剔，却向读者许诺了一份报告，而他想给予的是完全另一种东西。

他所寻找而找不到的，是那个能让读者明白埃及为什么与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词。不是更美，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更古老。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古老。古老，如同空气、石头、河流的一种物理属性。他要把三千年的历史装进一篇序言。而还没有人找到过书写三千年的办法。

“从哪里开始呢？”他高声说道，既是自言自语，也是说给听着他的若马尔听。

“从不变的东西开始。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季节。其余的一切，法老，王朝，征服，与这些相比都是转瞬即逝的。从地理开始。其余的自然会跟上来。”

傅里叶记了下来。他终于找到了入口。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地理，不是纬度和子午线。而是作为世界的形态、对人构成约束的那种意义上的地理。涨落的尼罗河。夹在两片沙漠之间的河谷。文明作为对物理约束的回应。这些，他写得出来。

他开始写第十二页。这一次，他没有撕掉。他写了三行，又重读一遍。这几行立得住。第三行断言，尼罗河穿越了数个世纪，而世纪却无法穿越它。这并不完美，但它是活的。这是一个开端。他继续写了下去。

就在这几天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在整理笔记，这些笔记日后将成为他关于尼罗河动物群的最初几篇文章。他在自己的舱室里工作，四周是用绳索固定以防船身摇晃的标本瓶。用来保存动物标本的酒精气味，在狭小的空间里飘荡不散。

“您写这些描述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一天晚上，若马尔问他。

“我想着五十年后读到它们的人。我希望他们看见我所见到的，不多也不少。鳞片，鱼鳍，浸入酒精之前的颜色。只是实情。”

不经意间，他刚刚说出了自己的信条。

11 月 10 日清晨，船驶入瓦莱塔港。学者们上了岸，三三两两地漫步在这座设防城市的街巷中。自法国守军迫于英国压力撤离该岛，至今才一年多一点，米字旗已在堡垒上飘扬，而 1798 年 6 月途经此地时，若卢瓦曾在这些堡垒上见过三色旗。

“拿下它只用了三天，”傅里叶说，目光落在瓦莱塔的防御工事上，“丢掉它却围了两年。其余的一切也差不多，大致就是这个比例。”

若卢瓦在圣约翰修道院教堂前坐下，迅速画下它朴素的正面。这不是为了只涉及埃及的《埃及志》，而是为了他自己，如同他那只面对出色建筑便再也无法闲着的手所做出的一个本能的动作。这幅画花了二十分钟。当他抬起眼睛时，若马尔正站在他身后。

“您还在画啊，”若马尔说。

“一直都是。我不会用别的方式去看。”

晚上，学者们在客栈里聚餐。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每个人回到巴黎后的打算。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想回到自然史博物馆的岗位。傅里叶想着他在综合理工学院的讲席。马塞尔则满怀眷恋地说起国家印刷所。

“那您呢，若卢瓦？”若弗鲁瓦·圣伊莱尔问。

“我吗？我要工作。这些画可不会自己去上版刻印。”

11 月 11 日拂晓，船起锚，继续向西北航行。西部地中海比东部的海面更清凉，也更汹涌，那灰绿的色调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当年离开的法国海岸。

在航程的最后这一段——从马耳他出发共八天——学者们每天都聚在大舱里讨论*《埃及志》*。谁写什么。按什么顺序。共多少卷。

“这部《埃及志》必须是一部百科全书，”傅里叶说，“不是几张图版配上若干说明，而是我们所见、所测、所察的一切。古迹、地理、博物学、当代社会。至少二十卷。”

“这些图版要么完美，要么就不必有，”若卢瓦说，“要请巴黎最好的雕版师，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多少时间。一处瑕疵，就重来。”

若马尔想要一部完整的地理图集，要有整个尼罗河谷的第一批精确地图。若弗鲁瓦要求给博物学留出显要的位置。马塞尔想到的是罗塞塔石碑的拓片。

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身后会留下什么。若马尔站在船头，从笔记本上抬起眼睛。海岸还看不见。他想到了自己管子里的那些测量数据，一百年后，会有人使用它们，而

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舔了舔铅笔，又接着写他那一列数字。

11 月 17 日，一个澄澈的秋日午后，法国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先是一道低矮的暗线，随着渐渐靠近，显出海岬与丘陵的轮廓。法国。他们没有说话。

11 月 18 日黎明，船驶入普罗旺斯的近海水域。海上的秋光，与东地中海的光截然不同。更淡，更散，没有它在埃及时的那种浓稠。

“这光，”若卢瓦对若马尔说，“这就是法国。”

海岸越来越近。现在已能分辨出石灰岩的峭壁、小海湾，以及最初的几间渔民的房屋。

“我们回来了，”若卢瓦说。

这个词里有如释重负，有惆怅，还有等待着他们的全部工作。若马尔没有回答。两人谁也不相信埃及只是一段就此合上的插曲。

VI - 回到法国

船于 1801 年 11 月 19 日抵达土伦，距 1798 年 5 月法国舰队从这同一座港口出发，已过去三年零六个月。归来的情形与出发时形成鲜明对照。当年是四百艘船的舰队，载着三万八千名士兵；如今，只有几艘英国船只，载回一支战败之军的残部。

他们先得度过对来自黎凡特的船只所规定的检疫期，这一次期限缩短了。随后，学者们在土伦登岸。法国变了。他们变得更甚。

若卢瓦离开检疫所，踏上了土伦的码头。潮湿的石头，冰凉。海盐与焦油的气味。海鸥在港口上空鸣叫。

若卢瓦停住脚步，任由其他人从身边走过。他没有俯身亲吻大地。他望着码头，望着建筑，望着城市上方的山丘，望着灰色的天空。空气冰冷而潮湿。那是十一月地中海的寒意，不同于埃及干燥的冷。他将它吸进肺里，等待自己的身体将它记起。

那些箱子——若卢瓦的画稿、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标本、马塞尔的拓片、仪器、手稿——在他们的监督下被卸下了船。

晚上，他们在港口的一家客栈里聚在一起。

“敬埃及，”若卢瓦说。

傅里叶举起了酒杯。

“敬那些没能回来的人。”

他们喝了酒。谁也没有再说什么，大家早早睡下了。

次日清晨，土伦港口当局派来一名军官，办理箱子的正式登记。这名军官很年轻，对埃及远征一无所知，只知道巴黎的报纸上说过些什么。他逐行查验了运输清单，把箱子清点了两遍，指定了码头附近的一座仓库。

“这些物品是共和国的科学遗产，”傅里叶对他说，语气里带着不容置辩的权威，“它们将尽快在护送下运往巴黎。请务必让仓库保持干燥，并妥善上锁。”

军官躬身行礼，照办了。傅里叶不假思索地找回了巴黎官员的腔调，它在三年的尘土之下依然完好。

下午，几位学者来到海事长官公署的一间办公室，坐在一幅油彩犹新的第一执政肖像下，起草呈交内政部的第一批正式报告。这些报告须说明，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已完成使命，其藏品中得以保全的部分完好无损，出版工作可以开始。傅里叶以沉稳的笔迹撰写了主报告，对英

国人造成的损失，只在附录的一则事实性说明中提及，别无他言。

“政治，就留给那些将会用到它的人吧，”他没有抬笔，说道，“我们陈述我们做了什么、带回了什么。其余的，属于历史学家。还有外交家。”

若马尔从他肩后读着，点头称是。他才二十三岁，对附录里的一则说明没有任何异议。

在土伦的最后几个小时，都花在了表格、签名和盖章上，埃及远征被执政府官僚体系的日常运转吞没了。

那位登记委员会箱子的办事员，把它们当作一批面粉或羊毛来对待。木箱，他看到的就是这个。若卢瓦观察了他片刻，然后转向傅里叶。

“文明就是这样保存自己的记忆的，”他说，“保存在没人读的登记册里。”

傅里叶笑了。这话是真的，而这也正是他的希望所依凭的原则，即《埃及志》将比政权与战争活得更久。它会被编目，被登记，被一代代学者查阅，他们永远不会听说傅里叶或若马尔，却会读到他们的文字。

第二天清晨，他们踏上了前往巴黎的路。

旅程将近两周，中途停留也计算在内，走的是主干道，穿过罗讷河谷，再向北经勃艮第而去。学者们乘坐公共驿车，珍贵的行李则装在有护送的大车上随后跟进。

他们从亚历山大起就知道法国换了政体。一路上，他们看到了种种迹象。驿站里的告示如今都印着执政府的抬头，再没有人提起督政府。

在阿维尼翁，一群人守候在驿车前。人们打听儿子、兄弟、丈夫的消息，三年来他们杳无音信。傅里叶下了车，耐心地一一作答。他并非对每个人都知情。

这一幕给他留下的印象，比金字塔还要深。等待的人群中，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手里握着一幅微型肖像。她什么也没有问。她只是看着那些走下车来的士兵的面孔。傅里叶移开了目光。

途经里昂时，他们停留了两天。好几位学者在这一带有家人或朋友，趁机举行了临时的团聚。傅里叶的旧日恩师博纳尔住在欧塞尔，稍稍偏离大路，他只是从里昂给他写了封信，说自己无法前去拜访，不久就会到巴黎。

而若卢瓦则利用在里昂的这两天，拜访了一位著名的雕版师，远征之前他就见过此人的作品。他想评估这位雕版师能否参与*《埃及志》*图版的制作。

“这是一些样稿，”若卢瓦说着，在作坊的桌上摊开了几本速写簿。

雕版师手持放大镜，久久地审视这些图画，用指甲顺着某些线条描过去。象形文字的线条要求极度的精确，浮雕有深浅层次的细微差别，用平面雕版很难表现，神庙的全景则需要对透视的掌握，并非所有雕版师都具备。

“这是正经的活儿。我做得了。不过我需要时间。很多时间。”

若卢瓦看着雕版师的手。宽大，稳定，老茧长在只有刻刀才会磨出的确切位置。这双手与他自己的不同。他的手作画，这双手将镌刻。从一种动作过渡到另一种动作，这一点他至今仍理解得不够透彻。他们需要一起学习。

“我们有时间。我们没有的，是敷衍了事的权利。”

他们就原则性的条件达成了一致。若卢瓦把这个名字记在笔记本上，并在下面画了线。这位里昂的雕版师，正是他要找的人。

晚上回客栈时，若卢瓦在公共大厅里遇见了傅里叶。

“波拿巴抛弃了我们，”他说，“而现在……现在他要利用我们的工作，来成就他的荣耀。”

傅里叶等到酒端上桌，才开口回答。

“没有他，我们就不会去那边。而且他有财力资助*《埃及志》*。把这两件事都记在心里吧。”

在里昂，若卢瓦在一家书店里买到了一册他自己与研究院的通信集，那是在他离开期间出版的。书商没有认出他。在法国读自己从埃及寄出的信，给他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是另一个人经历了那一切，从远处向他汇报。他认得那些字句，却不完全认得那声音。他的文字变了。变得更直接，不那么在意效果。

“我已不是 1798 年 5 月从土伦出发的那个人了，”他在路上对若马尔说。

“不是了，”若马尔停了片刻说，“谁都不是了。”

他们是在暮色中经圣安托万郊区进入巴黎的。这座城市在他的记忆里比实际上要大。在埃及的那些月份里，他把巴黎理想化了，直至把它当成了自己所缺失的一切的象征。而现实中的城市，以其平淡而一以贯之的样子令他震动。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气味，同样的大车碾过石板路的声响。

“巴黎还是巴黎，”若卢瓦下驿车时喃喃道。

“先生，您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的吧？”车夫问。

“从埃及。”

“啊，”车夫说，“听说那儿很美。”

“远不止是美。只是那个……要回来之后，才知道它值多少。”

那天是 12 月 8 日，抵达巴黎的场面比某些人所期望的要低调得多。没有游行，没有官方的欢迎，没有演说。东

方军团是战败而归的，执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去庆祝一场投降。波拿巴早已在没有埃及的情况下重建了自己的传奇。在官方言论中，这场远征成了一段慷慨的插曲，一桩出于科学兴趣的举动，只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中止，而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军事失败。

若卢瓦任同伴们各自散去，独自回到了圣多米尼克街的家。他的家人已由土伦寄出的信件得到通知，让人重新打开了百叶窗。他走进屋，放下外套，坐进他惯常读书的那把扶手椅。壁炉里生着火。火焰的热度烘着他的脸，柔和，稳定，是木柴燃烧的暖意，与埃及的热毫无相似之处。

一切都在原来的位置。书架，画作，书桌。埃及三年，而巴黎纹丝未动。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空白笔记本，是随手拿到的第一本，在第一页的页首写下“1801 年 12 月——工作开始。”然后合上笔记本，上床睡觉去了。

家人的团聚在随后几天里陆续进行，消息在亲友之间渐渐传开。父母，朋友，昔日的同事。每个人都想听故事。金字塔真的像旅行家们所说的那样高大吗？炎热能忍受吗？当时真的像信里所暗示的那样害怕过吗？

若卢瓦耐心地回答，依听者的不同来调整自己的叙述。对父母，他避开战斗与疾病的细节。对学者朋友，他详述那些古迹。对大众，他保持惊奇与奇妙的口吻。这种依听众调节叙事的本领，他在自己身上认出是一门艺术，而此前他并不以为自己拥有。它将对*《埃及志》*有用。

“还要更大，”他回答那些向他打听金字塔的人，“凡是无法想象的东西，传闻总会把它说小。”

这句话引来了几道不敢置信的目光，也引来了几份晚宴的邀请，那些好奇的巴黎人想听听他的历险。他接受了，

讲述了，但总觉得言语背叛了经历。而埃及，则在堆靠在他书房墙边的铜管里等待着，管塞上了蜡，等着被译成镌刻的图版。

在那些夜晚的某一夜，他带着这个念头入睡。真正的事业尚未开始。它将持续近三十年。

重逢的热闹过去之后，学者们着手组织起来。

12 月 15 日，傅里叶在杜伊勒里宫受到波拿巴的接见。走廊宽大而冰冷，壁炉的暖意传不到前厅。波拿巴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一如既往地站着。傅里叶呈上了出版计划。波拿巴明白，尽管军事上失败，颂扬他的埃及远征仍有政治上的好处，因此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

“好。出版吧，”波拿巴说，“我把它定为国家工程。”

事情会进展得很快，比傅里叶那天所期望的还要快。1802 年 2 月 6 日的一项执政官令将决定，由国家全额出资承担*《埃及志》*的筹备与印刷，并将其定为优先的国家工程。2月18日，部长夏普塔尔将任命一个编纂委员会，成员有贝托莱、蒙日、孔泰、傅里叶、科斯塔兹、德热内特、吉拉尔和朗克雷，各自负责一个部分，傅里叶留给自己的是历史序言。孔泰将出任政府总专员；若马尔、若卢瓦和德维利耶不久也将加入。傅里叶同年被任命为伊泽尔省省长，春天将前往格勒诺布尔。

与此同时，学者们在巴黎的一幢政府大楼里分得了办公室，并获得经费以雇用专业雕版师、辅助绘图员和抄写秘书。

若卢瓦用 12 月的下半月整理他成千上万幅画稿，这是雕版之前的第一步。他因桌子不够大，把画稿摊在地上，按古迹和类型分类。全景，建筑细部，浮雕，象形文字铭文，平面图，剖面图。

“没有这样的分类，”他向助手们解释道，“我们将白白浪费数周去寻找需要的那幅画稿。”

他与孔泰——众人都已视孔泰为未来的总专员——一道，开始遴选巴黎最优秀的铜版雕刻师，把复制他画稿的精细工作交给他们。他会见了每一位可能的雕版师，审视他们以往作品的样品，长时间地讨论他将要求的质量标准。

与雕版师的最初接触，暴露出一个意料之外的困难。这些训练精良的技师，能以任何传统风格复制一幅原作。但若卢瓦和他同伴们的画稿不属于任何传统风格。它们有一种笔触的自由，一种紧迫感，一种富有成效的含混，是学院派雕版所无法转录的。

“你们得训练自己的眼睛，”若卢瓦对其中一人说，那人刚刚把一个法老的侧面像改直了。“这些惯例并非笨拙。一个不明白埃及人的面孔为何这样画的雕版师，就会去改动它。而且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这将比预料的更漫长。若卢瓦把图版还给雕版师，毫不让步。

傅里叶这边，则在推进历史序言的撰写。他采用了一种学者审议般的口吻，每一句话都掂量再三，又划掉了许多。他不愿*《埃及志》*只是一部带插图的目录。他要它成为一桩可与*《百科全书》*相比的思想之举，向后世讲述法国对埃及理解了什么，以及埃及对法国说了什么。

1801 年 12 月就在这些办公室和作坊里过去了。当时没有一位学者能预知，全部二十三卷*对开本*的*《埃及志》*要到 1829 年才会完成。

12 月 19 日在法兰西研究院举行的会议，是科学与艺术委员会自回国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傅里叶精心安排了召集事宜，给每一位仍在世的成员——有三十来人已在

埃及殒命——都亲笔去信，邀请他们到研究院的大厅里重聚。

到场的约有六十人，来自法国各地。有些人自亚历山大之后就再没见过面。人们握手时都握得久了一点，目光在人群中寻找那些缺席的人。

傅里叶主持了会议，回顾已完成的工作，克服的困难，蒙受的损失，宣读已故同僚的名字，随后介绍了*《埃及志》*的出版计划、第一执政许诺的资金，以及预定的日程。

“这项工作需要时间。也许十年。也许更久——这笔账很难算准，我已重算过好几遍。你们每个人都将被请去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我们在埃及开始的事业，我们将在这里，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图书馆里完成它。”

若卢瓦坐在听众席中，想着他的铜管，想着所有等待着被镌刻的画稿。他在埃及所做的工作，至多不过是一半。

12 月的最后一周，用来撰写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呈交内政部长的第一份总报告。这份长达九十二页的报告，清点了委员会已完成的工作，所带回的东西，以及打算出版的内容。

傅里叶撰写了报告的主要部分，科斯塔兹负责古物部分，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负责博物学部分，马塞尔负责有关语言与手稿的部分。这份文件朴素而精确，给部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附上一份赞许的批注，把它转呈给了波拿巴。

波拿巴自两年前回到法国以来，一直关注着各项藏品的进展，他召见傅里叶，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他希望*《埃及志》*不仅是一座科学的丰碑，同时也是一座颂扬他东方战役的政治丰碑。这两个目标并非不相容，但它们的并存，要求学者们小心翼翼地周旋。

“我们为科学服务，”傅里叶出来时对孔泰说，“并且让第一执政相信我们在为他的荣耀服务。这是伟大事业的通常代价，相差无几。”

孔泰笑了。自远征之初以来，他还没有听到过比这更中肯的、关于他们处境的话。

波拿巴接过报告，兴趣并非装出来的。远征的某些东西确实打动了他，金字塔，罗塞塔石碑，底比斯那些巨大的神庙。几个月之后，他将满怀热情地读德农的《游记》，并向朋友们谈起它。

“您的德农文笔很好，”蒙日对他说，“这在学者中很少见——我就是头一个，我乐于承认。他谈金字塔的那些篇章，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而天知道我读过多少！”

“他看见自己所描述的东西，”波拿巴打断道，“一位艺术家。和学者一样。”

此后一年内，波拿巴让德农知道，自己为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却没有细说。

对于留下来继续编写*《埃及志》*的学者们来说，德农有可能谋得高位，是个好消息。这一前景保证了他们在政府中有一位身居高位、理解他们又消息灵通的对话者。

资金慷慨，但并非没有限度。学者们很快就必须面对一部巨著出版的经济现实。雕版师价格昂贵，大幅图版的印刷更贵，优质纸张也所费不菲。

孔泰此时已出任政府总专员，他在雕版这一环节本身寻求节省。他设想了一台机器，由它来刻制古迹的背景、天空和大块的体面，而把精细的工作留给雕版师。这既能控制成本，又能节省可观的时间。

德农这边，则与一家巴黎出版商谈妥，将他的*《上下埃及游记》*作为独立的一卷出版，先于集体编撰的*《埃及*

志》。这一迅速的出版，早在 1802 年，就能维持公众对古埃及的兴趣，并为*《埃及志》*问世时营造一个有利于它被接受的氛围。

“我们分两步出版，”德农解释道，“先出我的《游记》，面向大众。*《埃及志》*随后，面向学者。若是它肯的话，也面向永恒。”

德农被任命为中央艺术博物馆总馆长，1802 年 11 月由执政官令宣布，这使他与委员会的同僚们同样感到意外。波拿巴是在读过*《上下埃及游记》*、并与德农就艺术和藏品谈过几次之后做出这一决定的。

这个职位，他并未谋求，它将使德农置身于一个矛盾的中心。作为博物馆馆长，他将监督来自拿破仑帝国所征服各国的艺术品的征集。他将成为一项系统性掠夺政策的核心枢纽，而这项政策，他在埃及曾以批判而又无力阻止的见证者身份亲眼目睹。

然而他接受了。他认为，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影响藏品的构成与陈列方式，强调科学的一面，而非凯旋的一面。

这一矛盾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把它记在日记里，寥寥三行，干巴巴的。然后，他转向了别的事情。

此后的十三年，将是他一生中最富成效的十三年，比他刚刚度过的岁月更为伏案，也更偏行政，但同样苛求。执掌法国的博物馆，需要与远征相当的耐力。他拿起帽子，出门沿着河岸漫步。

VII - 工作开始

自回国以来，若马尔一直住在克鲁瓦-福班街。一间冬天冰冷、朝北的屋子，但有一张大桌子，他把测量图纸铺在上面。

他回来已有一年。这一年里，他不断地誊写、比对、修正。他的地形测绘如今铺满了两百张方格纸，从三角洲直到阿斯旺的瀑布。那是有史以来绘制的最精确的埃及地图。

他在计算大金字塔的高度，一百四十六点五米。建造者们使用的是一种精确的度量单位，他相信，如今这一单位可以被重新找回。他将于 1817 年公布这个数值，每肘尺 0.462 米。埃及学家们将不得不对它加以修正。王室肘尺为0.5236米，而大金字塔约合二百八十个这样的肘尺。

他还想到了苏伊士运河。波拿巴曾设想过它。

总工程师勒佩尔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得出结论，认为红海比地中海高出近十米，因此没有船闸，运河就不可能修成。

若马尔已经对这些数字心存怀疑，却无法加以证明。勒佩尔的报告将刊载于《埃及志》之中。

这个错误将耗去近半个世纪，直到 1847 年布尔达卢重新测量，证明两海几乎处于同一水平，之后费迪南·德·勒塞普斯才在十年间开凿了这条运河。

那天晚上，若马尔望着他的尼罗河地图。每一道河湾都是以罗盘和经纬仪测得。每一个村庄。每一座神庙。尼罗河谷自北向南铺展在十张图纸上，其精确程度，足以让一位工程师预知，若是修建一座水坝，水将流向何处。

一个世纪之后，修建第一座阿斯旺大坝的英国工程师们，仍将查阅若马尔的测绘资料。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只写下了一句话。“这一切的工作，是为了让下个世纪的工程师，能够管理一个我们未能治理的民族的水。”

在这两百张图纸中，还有一百一十张有待誊清，委员会才能开始印刷*《埃及志》*的第一卷。

十月带来了工作中最初的真正阻力。

最深的一重在于象形文字。

若卢瓦每天晚上重读当天的笔记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与德维利耶在卡尔纳克、卢克索、国王谷画下了数百列铭文。他们以雕版师般的精确一个符号一个符号地临摹下来，却一个也不懂。*《埃及志》*将刊出这些铭文列。成千上万的读者会看着它们。没有人会知道它们说的是什么。

对此无能为力。目前还不行。

马塞尔在十月的一次会议上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我们读不懂它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抄录它们——一丝不差地——其余的部分，采用严格描述性的风格。我们所见的。至于它意味着什么……会有别人去发现的。”

起初，*《埃及志》*几乎就是傅里叶的一个构想。克莱贝尔曾鼓励这一计划，波拿巴下令出版，孔泰主持实施，绘图员们提供图像。但最先明白这部书应当是什么的，是傅里叶，一部关于整个文明的百科全书，一如人们发现它时的模样。

他将在格勒诺布尔的伊泽尔省长官公署里撰写历史序言，历时数年。那是一篇密集的综合，囊括自希腊人以来人们所知的关于埃及的一切。

图像的数量令人眩晕。若卢瓦和德维利耶有他们的笔记本，迪泰特尔、德农和塞西尔也各有各的。若马尔有二百张测绘图纸。若弗鲁瓦有数百张动物学和植物学图版。工程师们为所到访的每一座古迹都画有建筑平面图。总计八百九十四幅图版，其中约六十幅为彩色。约四百名雕版师，历时二十年。数十名绘图员，其中许多人参加过远征。

图版之大，巴黎没有一台印刷机能够印制。孔泰——就是在埃及制造过铅笔的那位孔泰——在 1805 年去世之前，设计了一台刻制背景和天空的机器，由他的继任者付诸实施。新的印刷机被造了出来。有些图版近一平方米。必须专门定制纸张。有些图版单是一幅就花了两年工夫。

第一卷于 1809 年问世。最后一卷于 1829 年。共二十三卷，印在平纹纸上。庞库克商业版将自 1820 年起出版，共三十七卷。

傅里叶将看到最初几卷问世，随后是全部完成的巨著。他将于 1830 年去世。

《*埃及志*》创立了埃及学这门学科。它记录了此后已被毁掉的古迹，已被抹去的色彩，已被劫掠的遗址。它使一位法国学者得以构建他的释读方法。法国真正从埃及留住的，是一百六十七个头脑，以及他们所创作的八百九十四幅图版。至于它曾夺走的东西——这个词是准确的，无论辩解如何——则在伦敦。雕像在伦敦。知识在巴黎。

这份慰藉并不微薄。

其余的难题——不同艺术家所作图版之间的一致性，古迹名称的标准化——委员会依傅里叶一贯的方法制订了工作程序，由此一一解决，那方法清晰，实用，立即可行。每一幅图版都对照尺寸测绘数据核查。他们采用现

代阿拉伯语名称作为正式名称，古希腊名称置于括号之中。

若马尔提出了命名的规则。委员会采纳了它。

11 月，若卢瓦和德维利耶开始撰写说明文字。每幅图版都须附有一段文字，写明位置，尺寸，保存状况，可能所属的王朝。

若卢瓦撰写了他与德维利耶一起勘测过的底比斯主要神庙的说明。他的行文多少受益于新兴的浪漫主义，在测量数据之间，仍夹杂着一些段落，透露出他面对这些古迹时所感受到的一切。

他为卡尔纳克写的说明以尺寸开头。阿蒙圣域占地约二十五公顷，多柱厅内有一百三十四根圆柱，中央十二根圆柱高二十一米。然后是一句话。“这片圆柱的森林所产生的效果，犹如一处人的伟大与神的伟大浑然交融的空间。”

傅里叶划掉了这句话。若卢瓦又把它恢复了。

傅里叶在格勒诺布尔审读邮差送来的说明文字，把其中的抒情段落划去。若卢瓦又将它们恢复。傅里叶再次划去。

“我们做的是科学，”傅里叶在页边写道，目光已落在下一页上，“不是文学。”

“什么科学？”若卢瓦随回程的邮班答道，“这些建筑当初建造，就是为了产生某种效果。对观看者产生的效果。没有这种效果，我们不过是在给石头编目。”

两人谁也没有让步，两种口吻都留在了*《埃及志》*里，并肩而立，有时就在同一页上。

傅里叶住在格勒诺布尔的伊泽尔省长官公署，离委员会有好几天的驿车路程。

他想到了波拿巴，撇开虚荣与野心不谈，对这两样东西，他早已不再去反对。这个人发动了一场远征，改变了欧洲看待埃及的方式，改变了傅里叶自己看待历史的方式，而他对此想必所知不多。对波拿巴而言，埃及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误，被一场成功的政变所弥补。对傅里叶而言，埃及将终其一生都是他所经历过的最为浓烈的时期。

创造历史的人，他想，和理解历史的人……他寻找一个比例，却没有找到。

他在伊泽尔河畔的堤岸上停下。一个年轻人在寒冷中卖报纸。他买了一份，没有看，继续往前走。

若马尔在克鲁瓦-福班街，仍在工作。描图纸终于铺满了整张大桌子，笔记本在地上堆成了堆。那天晚上，他在为雅科坦准备图纸，雅科坦是军事地理工程师的负责人，将为*《埃及志》*的地图集绘制那幅地图。尼罗河谷纵跨八个纬度，宽度却从未超过二十公里。这幅地图所采用的邦纳投影保持面积，并且在中央子午线附近几乎不使距离变形。它适合这条狭长的沃土。

他画出了本初子午线。接着是纬线。接着是北面的尼罗河口，在罗塞塔。接着是河流向南的走向，那些河湾，他曾花三年时间逐一测量，早已烂熟于心。

地图渐渐成形。天冷，墨水干得很慢。

午夜，若马尔放下了笔。他吹灭了灯，而不是任由它燃尽——这是埃及留下的习惯，那里的油很贵——然后在黑暗中待了一会儿。二十四岁。他见过金字塔，见过底比斯的神庙，见过沙漠，经历过一场战斗、一次投降，测量过在他之前无人测量过的东西。

而现在，他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画地图。

他并不为此感到遗憾。他想起了阿卜杜拉，那位运河的*wakil*，对他来说，学习永无止境，因为运河也永远在变。收割已经完成。剩下的是打谷，在夜里，慢慢地打。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在自然史博物馆的书房里给居维叶写信。他们是朋友，日后才会成为对手。信里只是如实写下他所认为真实的东西。

信中他向居维叶描述了萨卡拉的木乃伊朱鹭，尼罗河的鳄鱼，布巴斯提斯的猫。他还向他吐露了自己在埃及那几个月里的所见。这些有三千年历史的动物，与它们存活至今的后代毫无差别。在这一点上，居维叶与他仍然意见一致。

若弗鲁瓦日后会改变看法，而居维叶将与他针锋相对。他们的争论将于 1830 年在科学院面前公开爆发。它将成为欧洲博物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战之一。但在 1802 年 12 月，在自然史博物馆的书房里，面对一封写给他所爱、日后却要与之为敌的人的信，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

他封好信，第二天早晨把它寄了出去。

埃及仍在远处，作用于那些曾走过它的人。

12 月，内政部通知孔泰，开支超出了预算。雕版师占去了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优质纸张，百分之二十。要削减而不牺牲质量，不可能。孔泰对部长这样说了。部长说他会考虑。

他考虑了。资金保住了。*《埃及志》*继续进行。

另一个晚上，若马尔取出了他的法尤姆笔记。那是些灌溉测量记录，他还没来得及为*《埃及志》*誊写。渠道，流量，水车的轮转次序。他曾在那里花了两周，测量费拉们心中有数却从未写下来的东西。一套与法老同样古

老的水利系统，整套完整地存在于那些自幼便操持它的人的头脑里。他把它记录下来，换算成分钟和流量，整理成形，好让下个世纪的工程师能够读懂。这或许是挽救它的唯一办法。

他久久地坐着，笔记本摊开在膝上。在法尤姆，想必还是那些牛，在各自的圈子里转着。

12 月底，该书四个部分——古物篇、现状篇、博物篇和地理篇——的论文正在同时筹备。方向已经确定，各个班子也已各就各位。

1802 年 12 月 31 日晚，若卢瓦放下铅笔，望着靠在书房墙边排成一列的铜管。二十三根铜管，用黑漆编了号。一号管里，是他最早的笔记本，亚历山大，穿越沙漠的行军，金字塔的最初几幅画。二号管里存着旅程的后续，三号管里是底比斯与国王谷的测绘。最后一根管里，是最后的画稿，作于 9 月的亚历山大。他起身，取下一号管，旋开管塞。抽出第一本笔记本。它翻开在一幅速写上。一艘船的甲板，背景是风帆与舰队，画于 1798 年 5 月的航渡途中。四年前。他合上笔记本，旋紧管塞。把铜管重新靠回墙边。

屋外，巴黎在一座大城市寻常的喧响中走完了这一年。钟声，人语，车轮碾过结了冰的石板路。几小时之后，1802 年将变成 1803 年。*《埃及志》*将满一岁。还需要二十六年。

他任火焰熄灭，走到街上。他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周遭是巴黎夜晚的干冷。在格勒奈尔街的拐角处，他停下脚步，抬起头来。天空晴朗。猎户座就在那里，在屋顶之上，恰恰就在他 1798 年冬天于金字塔上空见到它的地方。

他一直仰着头，直到寒冷冻僵了他的手指。

他回到家，在桌前坐下，打开一本空白笔记本。在第一页的页首，他写下日期。然后，在下面。“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中央圆柱，21 米。直径，3 米 50。纸莎草花苞式柱头。”

他接着写那篇说明。

而波拿巴则并未等待。共和八年雾月起任第一执政，1802 年任终身执政，1804 年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这个曾对开罗的学者们说过他们的工作将在他身后延续的人，正在建造某种更宏大也更脆弱的东西，一个政权。*《埃及志》将在帝国治下问世。*这场远征在事实上曾是什么样子——岌岌可危，残缺不全，代价高昂——在官方叙事中正逐渐成为国家荣耀的奠基。

对在卢浮宫的德农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战事即将重启。1805 年是奥地利，1806 年是普鲁士。而随着战事而来的，是藏品。

第二卷完